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52

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责任编辑:刘昌亮 汪 新**

**中共党史资料(第 52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百善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 6.625 印张 150 千字**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册**

---

**ISBN 7-80023-671-4/K·624**

**定 价:4.50 元**

# 目 录

## 回 忆 录

### 忆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中召开的小河会议

..... 习仲勋( 1 )

### 1965 年中央组织部关于党的建设的三个 报告的形成过程

..... 赵生晖(12 )

## 专 题 资 料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 ..... 梁秀峰(22 )

建国初期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概述 ... 于武真(48 )

建国初期党关于就业问题的政策 ..... 武 力(66 )

## 人 物 介 绍

阿合提买提江·卡斯米传略 ..... 谢 敏(81)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传略

..... 孟宪典 谢 敏(96)



## 大事记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

大事记(之二)..... 编写组(114)

## 民国史·现代史

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 肖 牲(181)

## 史实考订

历史见证者的自述和辩正

——老同志谈陕北建党时间述评 ..... 生 德等(198)

《烽火忆抗战》征文启事..... (206)

# 忆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中 召开的小河会议

习 仲 勋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我解放区的计划遭到严重挫折后，被迫改取对山东和陕甘宁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3月13日，集结在西北的10倍于我的敌胡宗南集团和宁青马鸿逵、马步芳集团，分由南、北、西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主力直取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陕甘宁边区各野战兵团和一切部队，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同时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为副政委。中共中央决心利用陕北的复杂地形和老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的有利条件，诱敌深入，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我军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又相继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前敌委员会，代表中央，继续留在

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率领转至晋西北的部分中央和军委工作机构统筹后方工作。小河会议，就是中央前委转战至陕北靖边县小河村时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的最初主题，是准备商讨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纵队到陕北战场配合作战问题。敌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我西北野战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案，采取“敲核桃”和“打西瓜”的战法，积极歼敌。即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各点上立足未稳的小股敌军，这叫“敲核桃”战术。一口吃掉，吃了就走，再捕捉下次战机，通过这么几个回合，疲劳敌军，消磨敌军士气，而我军则就地隐蔽，以逸待劳，就可以抓住战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大股敌军，积小胜为大胜，这叫“打西瓜”战术，从而使敌我力量对比由量变到质变。从3月底至5月初，我军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奠定了粉碎胡宗南集团重点进攻的基础。为加强西北战场我军的力量，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陈谢纵队在结束晋南反攻战役后就地待命，准备西渡黄河至陕北，受彭、习指挥，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6月中旬，毛泽东主席电告陈赓，要他于二十五、六日动身来中央商量作战方针。这时，我西北野战兵团刚刚胜利结束陇东战役，为策应陈谢纵队西渡黄河，彭总和我向中央军委提出，准备乘胜北进，收复被宁夏马鸿逵部占

领的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分区。6月20日,毛主席复电:陈谢纵队准备7月初由曲(沃)翼(城)地区出发,约7月15日在绥德集结完毕,20日左右开始向榆林方向出击,约一个月完成任务,然后向南作战。你们边区野战军月底开始执行歼灭宁马十八师,收复三边之任务甚为适当。胜利后并望向西扩大战果。指出,依西北之敌情、地形、补给等条件来看,边区野战军与陈谢集团在数月内似宜分开行动,而不宜集中行动。并提出在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谢来中央集会。

正当我西北野战军收复三边的过程中,山东战场的战局发生了变化。6月30日,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迅速控制了黄河南岸的广阔地区,与陈粟野战军形成夹运河东西呼应作战的态势。中央军委对于整个战略部署有了新的考虑。7月4日,我们刚到被收复的定边地区驻扎下来,就收到毛主席给彭总和我的电报,提出:“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



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并通知我们在收复盐池后到小河开会。7月7日，我军攻克盐池，三边全境收复。11日，毛主席又明确电告彭总和我：陈赓19日到小河，请你们亦于此时到达或提早数日先来。

7月16日，我和彭总从野司驻地张家畔（靖边）出发，跃马扬鞭，前往靖边小河村。一到中央驻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与我们及随后到达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一起研究磋商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两个方案。还向我们介绍了为正确解决陈赓纵队作用方向这个带战略性问题。此前不久，中央领导同志曾召见绥德分区负责干部，商讨筹集粮食问题。绥德分区的同志说，要2万兵不成问题，要2万石粮食可是大问题。毛主席还为此组织调查组在农村进行了调查，了解一个区一年收成多少，交公粮多少，敌人破坏了多少。调查结果证实，由于敌人的破坏，群众存粮很少。毛主席认为在陕北打这么多人的仗是不可能了。所以，中央鉴于刘邓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决心改变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腹地，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集团的进攻。7月19日，陈赓带领部分侦察人员到达小河村，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了他关于部队准备情况的汇报后，向他说明了上述情况和中央的决策，并最

后与大家一起研究决定：“（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关）、洛（阳）、郑（州）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二）提议赵基梅纵队（五师主力），秦基伟纵队及孔（从周）汪（锋）三十八军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二十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八月十九日以前渡河。”

接着，中央领导同志又同我们一起进一步全面地研究和讨论了军事形势。认为这时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在这一年中，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确地执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内线歼敌百余万，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敌人在解放区东西两翼发动的重点进攻还没有被粉碎，但它的主力已深深地陷了解放区腹地。敌人的战线之长和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在全国战场上已经没有进行战略进攻的能力。根据军事形势的新变化，人民解放军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我军在各战场的局部反攻和刘邓野战军兵出鲁西南，转入外线作战的胜利，这些都显示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召开一次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如何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



问题。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准备，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于7月21日至23日正式举行。会议是在小河村中间的一座大院里召开的。简陋的会场设在一顶用树枝、草席搭成的天棚下面，桌椅是临时从乡亲们家里借来的。三天的会议都在这同一地点进行。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同志。

会议的第一天，首先由毛泽东主席就军事计划、战争形势作了讲话。他说，原先计划边区、陈赓两部集中打，现在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毛主席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解决。这个计划，看过去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实现的。山东战场局面最近可以转变，陕北战场还不可能，但基本上停止了胡宗南的进攻，这就打下了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有主力军90万，地方军60万，如能把主力军发展到150万，就足够解决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中分析了战争形势。指出，现在，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就是群众更加不信仰他，他更加众叛亲离。当然他还没有达到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日本投降后的国共和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希望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没有达到，然而蒋介石的确是更加孤立了。我们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来解决，这也用不着讲出去，还是要作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而不要象蒋介石那样先说

三个月要解决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毛主席还向我们分析了统一战线的形势。他说，现在是一部分减少了，一部分增加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要土地革命，不象抗日期间仅仅减租减息。但南方的地主却因征兵征粮首先与蒋介石闹翻，与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日时期相信蒋介石，现在则与我们共同抵抗蒋介石。坚持土地革命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如不坚持土地革命，则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丧失了民族资本家。在城市，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毛主席说，蒋介石最近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解决了一个极大问题，即人民要和平，现在人民弄清了谁要战争。全国人民的同情，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土地革命，这些因素是经常起作用的，而军队的优势，突然的袭击，这些因素是临时起作用的。总之，蒋介石是在走向众叛亲离：众叛，是群众不要他；亲离，是他的内部不和，美帝国主义和他之间也不和。毛泽东主席讲话之后，周恩来同志接着在会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他说，过去一年内敌军有了极大变化。从建制、人员、武器来说，都损失了1/3，若从质量说，则不止降低1/3。他说，到今年3月至6月，敌军攻势已成强弩之末，仅在山东、陕北两处进攻，在其他各处我军均转入反攻。敌正规军由190万降为150万，明年仍照此推算，则我正规军数量上亦将超过敌人。我军去年停战时，主力、地方部队共为140万，复员中减掉一些，7月大打后又陆续增加，连后方机关现已达195万

人。但解放区能实际负担的人口不足1亿，负担脱离生产人员以1.5%计，已经超过负担能力。所以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而主力的发展则须求之于地方部队之升级。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讲话，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使我们加深了对战争全局的了解，增强了对党中央提出的军事计划和战略决策的认识和信心。但同时也感到要实现中央的计划和决策还需要我们作出艰苦的努力。为了保证后方对前线的支援，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会议从第二天起，认真研究了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西北局的工作。彭德怀、贺龙同志和我以及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分别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在土改中的问题和财政经济、后勤供应上的种种矛盾和不良现象作了发言。任弼时在会上介绍了陕北土改的一些情况，提出要保护中农以及如何斗争地主和加强群众团体的问题。

贺龙同志在会上提出，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党和军队早就统一，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如果不统一，就很难支持目前的战争。并就两个边区的统一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对此表示，边区在军事上与财政上均以依靠晋绥为主，今后更加如此。现决定由贺龙同志以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和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彭德怀同志在发言中谈到陕甘宁、晋绥两区统一和财政与粮食问题时说，拥护两个区统一，这很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他认为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人口



减少了,因此精简节约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财政工作中存在从财政而不从经济出发,从干部而不从人民出发的错误偏向。他指出团以上干部生活标准同下级过于悬殊,应该纠正;战士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群众负担不起,亦不能太低,影响体力。指战员的生活只能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对于战争,他说有人对胜利仍抱着侥幸心理,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寄希望于陈赓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根据194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结合西北野战军的实际,彭德怀同志还在会上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中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执行战略任务。对于彭总的建议,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

我在会上对西北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

最后,毛泽东同志作了会议结论。他说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关于财政和粮食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句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进行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实行军民兼顾。土地政策今天可以

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更进了一步。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但对共产党员则不应例外。中农土地应该不动，在群众大潮流中，如中农同意，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但不能正式写在文件上。军队打出去时，在新区与其没收地主土地，不如按阶级路线摊派缴税，利用旧机构有时也是需要的。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成为强迫群众。西北局领导上应加强。这个区域有几个有利条件便于团结群众，坚持斗争：第一，有本地的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老区工作作风至今是好的。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战胜的。

根据会议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及华东局，作出军事部署：“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我们已令陈赓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共七万余人，八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纵队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

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小河会议决定加强西北战场的一些措施，在会后也迅速落实。7月底，中央军委即批准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和刘景范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彭为书记。将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为副政委。将抗日战争胜利后，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分出来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武装。贺龙同志还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主任，以他为核心，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以加强陕北作战的后勤支援。由于会议确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工作，会后我和彭总分开，与贺龙同志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会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于8月中旬在沙家店战役中，一举歼敌整编第36师主力共约6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将我军歼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此战即成为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小河会议形成的指导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和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把中央的决心与前线指挥员的见解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战争指导艺术。对我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 1965 年中央组织部关于党的建设 的三个报告的形成过程

赵 生 晖

1965 年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报送了三个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这三个报告是:《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关于目前党员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的三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后,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看后,认为《报告》很好,提交 9—10 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期间,毛主席见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高兴地同他握了握手说:“安子文同志你也管起整党来了,党管党就好!”11 月 17 日中央将这三个报告批发各地执行。中央批示认为:《报告》是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提出的,是目前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批示说:多年来,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再三指示,党要管党,要加强党的建设,要克服党委不抓紧管党的工作的错误。党不管党,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现在必须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各地党委召开适当会议讨论,制定规划,认真贯彻执行。

三个《报告》从酝酿到中央批发执行，有约两年的时间，后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自行废止。但其中体现的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仍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具有借鉴意义。我有幸自始至终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有责任对文件的形成过程，作一历史的交代，以飨后人。

## 一、三个报告的形成过程

1965年3月16日，安子文部长在部务会议讨论本年度部的工作安排时说：“主席现在在抓计划、财贸工作。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可能倒出手来抓党的工作。现在我们要作准备工作。”并说，5月他从山西洪洞“四清”蹲点回来，要亲自抓这项工作。他提出要抓三个方面的问题：党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基层、干部），工会、青年团工作。他说，这是部的一件大事，一切工作要围绕它进行。会议决定由副部长赵汉主持进行这一工作。此后，我也就全力参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工作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们广泛汇集了材料，草拟了报告。报告数易其稿，形成三个报告草案，但都不令人满意，只能说有了个大致框架和基本思想。最后，部决定召开大区组织部长会议，专门就农村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一次研究。一个大区再来一个省委组织部长、一个蹲点“四清”搞得好的同志。会议于7月10日在京召开，到会30余人。15日，会议移到北戴河继续召开。我作为文件起草人之一，也参加

了会议。会议期间，就三个《报告》草稿，广泛征求了意见。25日，会议结束。赵汉副部长主持对文件作了最后修改。回北京后，由安子文部长定稿并提交部务会议通过，于1965年8月21日报送中央。

## 二、三个报告提出的主要问题

这三个《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都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都是当时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关注的大问题。因此，我着重介绍问题提出的缘由和基本措施，以使后人能够历史地理解和看待《报告》中所阐述的各项问题。

### （一）关于提拔新生力量

1963年上半年，赵汉同志到福建调查，发现干部队伍中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地、县领导干部中，一是年龄较大，二是本地干部所占比例很小。这反映了对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干部培养不够，实质上是个培养提拔新生力量问题。中组部为此作了全面调查后，向中央作了报告。经毛主席批示，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报告是正确的，目前干部有一个更新的问题，是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执行办法和意见。为此，中组部于1964年3月上旬召开了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传达讨论了中央指示精神。3月3日，安子文在会上作了关于提拔新生力量问题报告。说提拔新生力量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大问题。不把革命接班人培养出来，革命事业就

会中断，革命成果就会丧失。当前最大的障碍是保守思想，习惯势力。主要表现为论资格，排辈数，比级别，套框框。他提出，要用革命精神打破这些旧思想，大胆地、积极地、破格地提拔各方面新生力量。他提出了八条具体措施，主要是：把年轻、有前途，但缺少经验的，下放到县社锻炼；年轻有前途，理论低的，下决心抽到党校学习；年轻有前途，文化低的，先学文化；今后几年内，要提拔40岁左右的人参加省部领导；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几十人，施以短期训练，下放任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成长为成熟的领导干部。这就是实行特殊的选拔人才，进行特殊的培养，用于特殊的用途的“三特殊”政策。会后，向中央作了《关于提拔新生力量的报告》。

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毛主席长期思考的百年大计。1964年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第一懂得马列，第二为大多数人服务，第三团结多数人，第四民主作风，第五自我批评。7月14日，在“九评”<sup>①</sup>中把这五条正式写了进去，成为接班人的五个“必须”。在北戴河起草《报告》时，赵汉对这五条倍加赞赏之余又说：“主席这五条，好倒是好，如再有一条业务要求，就更好了。”万没有想到一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的这一句老实话，竟被人以“反毛泽东思想”罪名揭发出

---

<sup>①</sup> 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来,同其他“莫须有”的罪名连在一起,终导致他自杀身亡,酿成历史悲剧。

《报告》分析了干部队伍的状况,认为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是党的宝贵财富。但是,现在确有不少老同志体力越来越不能适应繁重的工作,而现在担负省、地、县及其他领导职务的年轻力壮的干部数量太少。这种情况,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变,并由老干部抓紧,把大批年轻优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亲自帮助他们锻炼成长,一步一步地接班,那末,对我们革命事业是不利的。《报告》提出了若干具体有力的措施。

从1963年底到1964年初提出提拔新生力量后,到1965年所形成的这个《报告》,提拔新生力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按照中央选拔一批40岁左右干部参加省部级领导工作的要求,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余名地以上的领导干部,其中数十名是省部级干部。中央组织部带头在部内提拔了4名副部级干部,2名年轻的副局级干部。在这批新提的省地级干部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把年轻优秀的领导干部源源不断培养出来,中央和省委组织部采取“三特殊”的办法,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1100名优秀分子进行重点培养,由老干部带领他们到农村参加“四清”和基层工作锻炼。其中中央组织部直接带领培养的有60人。后来这批知识分子相当大的多数被提拔为各方面的领导干部。

在起草提拔新生力量报告过程中,闻听毛主席在华东局一次谈话中批评说:“解放15年了,南方几省还是南

下干部当领导干部，本地干部培养不起来。”为此，赵汉又为部起草了一个《调回南下干部提拔新生力量问题报告》。对这个报告，彭真提示，要防止对南下干部形成压力。后因种种原因，这个报告未能得到实施。

## （二）关于接收新党员

1961年以来，全国基本上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几年来，新党员只增加了60万人，这些新党员都是解放军复员转入地方的。对此，毛主席有所批评。在1964年12月制定《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上，当有人讲到农村党员很少生产队长党员很少时，主席插话说：“小队长多数不是党员，这岂有此理！农村党员这样少，生产队不象连队，没小组，没党员，是怎么弄的？为什么几年不发展？是不是老的不让发展？老党员多了，他搞久了，搞出味道了，不让位，搞垄断！这不行！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没法。不整党，没有希望。”又有一次，主席提出农村党员要占到农村人口的5%。当主席的话传下来后，我们都很震惊，特别是对5%，感到太高了。当时农村党员1056万，只占农村人口的1.7%。达到5%要发展多少？全国农村生产队556万个，1/4生产队没有党员，2/3生产队长不是党员。生产队长全是党员，生产队建立党小组，这要发展多少党员？不但我们办事人员思想不通，连部长们也想不通。可是，这是主席说的，我们从战略高度出发，还是全力投入大发展的研究工作中了。不久，又传来了刘少奇“工厂中应有20—25%党员”的指示。发展党的工作已停止了四年，原来设想“四清”“五反”以后再发展，现在不能等了。



《报告》认为,当时“许多方面党员数量很少,党员的构成和分布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是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2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占党员总数的24.6%,到1964年则下降为7.2%;现有130万青年党员中有一半是在军队中,在地方的一半中,只占党员总数的4.3%。农村第一线的556万个生产队中,只有党员962万,平均每个生产队只有党员1.7人,有1/4的生产队没有党员,而生产队长则有2/3不是党员。工交财贸企业的工人、营业员中党员也很少。1/3班组中没有党员,2/3独立核算的商业企业中,不能独立建立支部。特别是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太少,全国大学生中只有党员1.5万人,只占大学生的2.2%。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报告》认为,为了使党的组织状况,同新的形势相适应,应在高标准的前提下,在今后6年,积极地、较多地接收一些新党员。《报告》要求农村党员,经过发展可由目前的1000万人达到25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5%。工业企业可以达到20—25%。财贸基层单位达到20%或更多一点。高等学校学生中要经常保持有15%的党员。但是,《报告》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存有严重的错误观点,认为在他们中发展党员,必须解决世界观问题。这是一个附加的难以衡量的条件,而《报告》认为,没有这个条件,不能接收他们入党。这样,就把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拒之于党的门外。

《报告》批发各地后，发展党员工作受到全党普遍重视，1965年全国即发展新党员94.3万人。但是1966年接收党员工作又失去控制，出现了第二次大发展高潮。这一年共接收党员319万人，略少于1956年的322.9万人。这些新入党的党员，大多是“四清”、“五反”中的积极分子，思想上免不了有更多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烙印，这就加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时，重新教育党员的任务。这个计划也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停止执行。

### （三）关于加强农村党的建设

1965年初，中央组织部开始考虑“四清”后如何加强农村党的建设问题。当时汇集了全国报送来的材料进行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独特见解的好意见，都太一般，没有抓住要领。这时传来了安子文部长在山西晋南政治工作会议和山西省委组织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这两次讲话是专门讲农村党的建设的，内容新颖、有特色，很完整。他说：“要以毛主席的三大作风来建设支部。一个支部好坏，主要是看学习好不好，联系群众好不好，批评自我批评开展得好不好。为此，就要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三个制度。”他的一席话，使我们顿开茅塞。他回部后，多次讲话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于是，关于加强农村党的建设报告的主导思想明确了。在起草报告前，为了更稳妥地把握这一主导思想，于6月10日，安子文指定赵汉副部长邀请了中央几个部门的八位下放蹲点的负责同志，专门开了一次农村党的建设座

谈会。赵汉转述了安部长的意见，大家展开了议论。大家普遍反映，蹲点感受最深的是党员不起作用。农民的缺点，党员都有。主要是缺乏教育，缺乏监督，没有批评自我批评。对安部长的意见，大家深表赞同，说是抓住了要领。《报告》的基调就这样定下来了。

《报告》提出了农村党的建设的三个问题是：如何按照先锋队的标准整好党的问题；如何抓住要领建设好农村党支部的问题；建立农村政治工作系统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中具有长远意义的是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加强支部自身建设，使农村每个党支部都能过得硬，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报告》认为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主要应该是抓毛主席提出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抓三大作风，即抓住了支部建设要领。《报告》指出当时支部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三条：一是学习不好；二是联系群众不好，威信不高，没有把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三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有了缺点和错误自己不能纠正。这三个问题，就是三大作风不好。为此，树立三大作风就成为支部建设的最重要、最经常的工作。

《报告》认为要树立三大作风，就必须建立三方面的制度：一是学习制度。学习时事政策，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还要学习文化技术知识，而最根本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建立联系群众的制度。三是建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强调要建立党的生活会议制度。

在经历了数年来“左”的折腾后，重提三大作风，并认

识到必须以三大作风建设支部，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今天看起来只提以三大作风来建设支部，显然是不够的，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根本问题应当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来建设党。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时能够提出以三大作风建设党，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还应指出的是，《报告》强调建立三方面的制度，说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进行制度建设，把党的生活制度化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这不能不说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突破”。

各地对中央批发的中央组织部的这三个《报告》十分重视，先后都召开了会议，进行传达讨论，认为“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大计”，“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各地都制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规划。但是，这些规划都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被迫停止执行。



#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

梁 秀 峰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提出和实施,有深厚的社会原因、经济原因和军事原因,并且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以保证人民解放战争尽快在全国取得胜利,在各大解放区内逐步实行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从历史进程来看,这种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实质上是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前奏和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取得全国政权,并且实现政治、军事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和稳定市场物价,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就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之一。

## 一、建国前夕解放区财经工作状况

194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性转折。战争主要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了。夺取

全国政权已是胜利在望<sup>①</sup>。这时,大兵团作战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主要形式。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由过去的那种独自地、分散地进行财政经济工作,逐步转向集中地、统一地进行管理。这个时期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是在各大解放区范围进行的,后来又发展到几个大解放区的联合和统一,它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统管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机关,为统一管理关内各大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奠定组织基础。**

在各大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逐步走向统一的进程中,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首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统一管理华北地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其主要任务是:(1)制定华北解放区国民经济建设方针;(2)审查各解放区的生产、贸易和金融计划,并及时进行必要的管理与调剂;(3)掌握各大解放区的货币发行;(4)指导各解放区对敌经济斗争;(5)筹建中央财政和中央银行;(6)审查各解放区的人民负担;(7)审查各解放区的脱离生产人数、编制与供给情况;(8)审查各解放区的财政预算,并进行必要的调剂;(9)统一军工生产计划,统一交通运输<sup>②</sup>。

根据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要求,特别是适应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需要,1948年10月6日,在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为统一领导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机关。为此,中共中央批准董必武任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黄敬任副主任(均兼委员),方毅任委员兼秘书长,曾山、贾拓夫、姚依林、南汉宸、戎

---

①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

② 南汉宸:《关于财经工作几个基本方针》的报告,见华东《斗争》第1—8期合订本。



子和、杨秀峰、宋劭文、武竞天、赵尔陆任委员。华东和西北地区各设财政经济委员会分会，受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sup>①</sup>。

**(二)在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逐步统一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实行大区的联合统一。**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地域迅速扩大并且逐步联结成片，军事斗争的形式由“各自为战”迅速转变为大兵团作战或大兵团联合作战，这时自我封闭型的区域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地区间互通有无的贸易经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一，要求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这种统一只能采取逐步前进和稳步实施的方针。除了东北地区暂时保留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经济体系，在本地区内实行财政经济工作统一外，关内财政经济工作统一是经历过若干步骤的。

首先是 1947 年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对晋察冀地区实行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sup>②</sup>。

第二步是 1948 年 5 月对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实行合并，为扩展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sup>③</sup>。

第三步是，根据 1948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交通和军事工业等财政经济工作均与华北统一的决定，1949 年 1 月 1 日，西北地区和华北地区首先在财政工作上实行完全统一，并且实行统收统支<sup>④</sup>。

---

① 见《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第一卷。

② 南汉宸：《关于财经工作几个基本方针》的报告，见华东《斗争》第 1—8 期合订本。

③ 见中央财政经济部编《金融贸易会议文献》之五。

④ 见《华北财经委员会关于西北、华北两区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统一问题的决定》（1948 年 10 月 5 日），华北财经委员会档案 1948 年第 6 号卷。

第四步是后方勤务工作和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在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新形势下,筹措巨额的军费以保证部队打胜仗的需要,成为当时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对此,1949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对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又作出新的部署。这个部署的主要内容是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的统一,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需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对二百多万野战军进军的军需供给负担问题,中共中央作出如下决定:东北和中原地区合力供给东北野战军;西北地区全力及华北地区主要部分供给西北野战军和华北各兵团;华东地区全力供给华东和中南两野战军,不足时经过中央从华北地区、东北地区调剂<sup>①</sup>。

**(三)在相对固定解放区各种货币比值的基础上,逐步实行货币的统一这是实现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重要环节。**

第一步是开放两个解放区的货币可以在同一市场相互流通,进而发展到几个解放区的货币在同一市场可以流通的“混合市场”。

第二步是在货币流通过程中,根据各种货币比值相对趋向稳定的实际状况,人民政府对各种货币的比值予以相对固定,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使货币流通范围逐步扩大。据有关资料记载,1948年5—10月间各种货币的比值是:冀南钞与北海币为1:1,边区币与北海币为10:1,冀南钞与西北农币为1:20,边区币与西北农币为1:2。

第三步是以统一的货币广泛发行为基础,各地停止单独发行

---

<sup>①</sup> 见《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1949年3月20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档案1949年第1号卷。

货币,并逐步收回各地区的货币。对此华北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个地区的货币,并发行人民币。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是:①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②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③人民币发行之后,原有货币可继续流通,但必须定期收回。原有货币未回收前,可与人民币按固定比价进行流通<sup>①</sup>。

**(四)统一税收工作和统一财政收支,是实现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中心问题。**

1948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工作的集中统一,力求华中更多的力量用于人民解放战争。为此决定实行财政制度的统一,粮款收支调度有计划地进行。对于人民负担、脱离生产人数、供给标准、各级编制、税收法令、预决算制度、金库和仓库管理办法等,均由华北人民政府统一制定,省(行署)、市(直属市)和县不得变更。一切税收均归作华北收入。为了发挥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华北人民政府还决定对某些税收采取按省市全年预算、提成留用的办法。

对各项税收的征收和职责,华北人民政府也作出具体规定:①农业税和工商业战勤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征收,并按规定上解华北人民政府或分别留交行署、市、县人民政府。②交易税、工商税、屠宰税、货物出厂税、工资所得税和印花税,由税务局或财政部门征收,按规定留用比例上解华北人民政府或留交行署、市、县人民政府。③烟酒税、进出口税和盐税均由税务部门征

---

<sup>①</sup> 见《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的决定》(1948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档案1948—1949年第647号案卷。



收,解交华北人民政府。④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and 税务局不得违反法令规定自行增加税目,不得私自更改税率或加派税款<sup>①</sup>。

以华北、华东、西北三个地区为前奏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财政经济工作制度各异、地区封锁、关税壁垒和自成体系的状况,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并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时期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发展的形势下进行的,新解放区又在迅速扩大,而人民政权只能相继建立和巩固,因此这种统一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进军过程中,国家财政负担空前增加,市场物价剧烈动荡,加以敌人的干扰破坏和严重自然灾害,使得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面临极其复杂和相当困难的局面。

(1)财政经济工作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

在贸易方面,相互限制和互相封锁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如1949年2月16日天津市工商局发出的《关于掌握开发商民购销货物证明书》的通知中规定:除军火、电讯、交通、五金、机器(农具除外)、印刷器材及金、银、外币外,一般物资,可允许商民前赴友区及其他军管城市购销,发给证明书,每证只准使用一次。购运货物回到本市后,需将运来的货物种类和数量转报工商局。又如东北地区提出的《东北与华北两区金融贸易往来暂行办法草案》中规定:东北地区各级国营企业机关不得单独径赴华北地区进行贸易,必须统一由东北商业部指定的代理机关或代理人,与华北工商部贸易总公司交涉办理;华北地区各级企业机构亦不得单独径赴

---

<sup>①</sup> 见《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统一财务行政工作的决定》(1948年10月),华北财经委员会档案1948年第6号案卷。



东北地区进行贸易,亦必须由华北工商部贸易总公司统一向东北商业部办理。再如1949年5月22日徐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凡外地商人来本市购买粮食、棉纱、油类、机器零件、交通器材和五金电料等,必须具有当地政府发给的购运证,并经本市工商局批准并发给货物运销证方准出境。无证出境者经查获后,以走私论处。本市商民在本市采购上述物资外运销售的,亦需向工商局呈请批准发给货物运销证。无证出境者,也以走私论处。

在税收方面更是“五花八门”。天津解放初期,仍然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办法收税,采用旧税率(去掉一些苛捐杂税)<sup>①</sup>。各解放区实行的货物税则、税目、税率极不统一。如下表所示:

	东 北	山 东	西 北	、 华 中
税种名称	货物产销税	货物统税	进产货物税	货物产销税
税 目	9	14	6	10
税率(%)	3—100	5—100	3—30	5—25

即使在一个大区内,税率也有不同。如华北地区老区煤税税率为2~5%,而新区(如北平)则为13%<sup>②</sup>。

在汇兑方面也很不便。1949年,关内各解放区的主要城市之间的银行汇兑业务已逐步开展,但关内与东北的汇兑业务仍未直接开放。当时华北与东北两区在山海关联合设立的办事处,因兑换资金力量有限,加以人民币的不断贬值,兑换差额亏损增加,因而限制每人每次只准兑换一万元人民币的东北币,商人去东北购货颇感不便。

① 刘少奇:《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5日)。

② 见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档案1948~1949年第2号案卷。

(2)国家财政负担极重,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

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军事开支和脱产人员供给负担也随之大量增加。据当时各地上报数字,1949年末,全国脱产人员达到942万人。按照财政概算每人平均4000斤米计算,942万脱产人员就需376.8亿斤米,这些都需要国家供给。在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进行,财政经济状况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

为了保证解放全中国的需要,在当时情况下的财政工作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加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但在人民生活已相当困苦和负担也很沉重的情况下,再行增加税收是有限度的;二是采取赤字财政,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据当时的粗略计算,1949年,全国财政赤字多达264亿斤粮食(六个大区的财政收支都是赤字),占当年财政支出的46.5%。详见下表:

计算单位:粮食亿斤

	全国	东北	华东	华北	中南	西北	西南
财政收入	303	172	71	28	22	8	2
财政支出	567	182	192	78	77	31	7
赤字	264	10	121	50	55	23	5
赤字占支出(%)	46.5	5.5	63.0	64.1	71.4	74.2	71.4

巨额的财政赤字不能不带来货币的过量发行,以弥补财政支出的不足。据统计,1948年12月底累计发行货币105亿元,1949年12月底增加到30473亿元,1950年2月底又增加到55159亿

元<sup>①</sup>。也就是说,在14个月期间,货币发行量增加了525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解放区地域急剧扩大而需要增发货币,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巨额财政赤字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缺乏相应物资保证情况下的货币过量投放,必然引起物价的上涨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它的实质是推行一种涉及范围最为广泛的“货币税”。据当时估算,1949年货币过多增发的结果,等于叫老百姓多缴纳165亿斤小米的税,并且主要又是压在长江以北两亿人民身上。这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 (3) 物价暴涨,市场混乱。

在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和货币过多发行的同时,投机商人又乘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和城市供应严重不足之机,大肆进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使物价出现多次暴涨,市场秩序一片混乱。1949年这一年就出现1月、5月、7月、11月4次涨价风,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总指数分别比同年上一个月上升了53%、72.4%、80.2%和146.7%。如果以1948年12月为基期,1950年2月的物价指数比1948年12月上升了150倍。物价如此持续暴涨,破坏了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运行,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活,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

在全国逐步走向统一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必然冲击极为广阔的领域,这对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1949年秋。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北平(京)市人民政府准备了很多物资,以为这样就可稳定北平(京)市的物价。由于全国正在走向统一,这种地域性的稳定物价的措施很难奏效。它说明在新的形势下,解决国民经济全局性的问题,只靠一个地区的

---

<sup>①</sup> 见中央财政部主计处1949年71号案卷和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档案科1951年第276号案卷。

努力是远远不行的，必须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

(4)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压榨掠夺和连续 12 年战争的摧残破坏，带来生产凋敝、交通梗阻、贸易滞塞、物价暴涨和生活困苦，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1949 年与抗战前 1936 年相比，农业生产降低了两成以上，工业生产降低了一半。其中钢产量由 96 万吨降低到 16 万吨，即减少了 4/5 以上。这一年，按全国人口平均占有国民收入只有 66 元，广大劳动人民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饥寒交迫的生活。例如，1949 年 5 月人民政府接管上海市时，食米只够半个月，用煤只够 5~7 天，市民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

面对这种极其严峻而复杂的局面，需要采取新的重大决策，力求尽快挽救处于崩溃状态的国民经济。

## 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财政经济工作统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是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和挽救处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这个历史重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所涉及范围的广泛、问题的复杂和实施的难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财政经济工作统一是不可比拟的。因此，中共中央采取了稳步实施的方针。经过缜密的准备，然后在全国贯彻实施，保证了统一财经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上海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揭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序幕**

为了克服当时面临的财政经济严重困难，争取 1950 年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并且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步伐，1949 年 8



月，由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北五个地区领导干部参加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这是建国前夕召开的一次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经过20天的讨论，会议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1. 为了保证棉花收购和供应计划的实现，并保证棉纱、棉布的顺利生产和推销，会议议定成立全国统一的花纱布公司，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负责调配棉花和推销棉纱、棉布。

2. 为了掌握出口物资，克服当时出口困难，并且统一出口步调，会议议定成立全国统一的土产公司，以组织桐油、丝、茶等重要土产出口。

3. 各个解放区之间，各省、区、县之间实行贸易自由，废除一切关卡封锁和证件管理等妨碍贸易自由的措施。各种物资，除有特别规定者外，全国各解放区均可自由流通。立即取消限制粮食出境的措施。

4. 制定全国统一的货物税税目、税率。货物税只由产地税务局征收一次，各地区验照放行，不得重征。

5. 为了支持解放战争，促进物资交流，关内各解放区大中城市应畅通汇兑，以调节金融。一般应采取低汇率和多汇兑的方针，汇兑额不加限制。东北和关内汇兑办法另定。

6. 各地区之间财经调度和大宗物资调拨，要通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sup>①</sup>。

## **(二)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财政经济工作要实行统一管理**

上海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对贯彻会议

---

<sup>①</sup> 参见《上海财经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共同意见》和陈云：《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1949年8月15日）。

决定提出若干问题和意见,建议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时,应实行中央与地方分工的财政体制;以便责任分明,并发挥地方理财的积极性。否则,全部实行统筹统支,问题太多,可能导致下面只是伸手向上面要,而对增加收入不关心。

对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复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电报中答复如下:

1. 目前许多地区是新解放区,实行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部门管理的统一,在工作进程上是带跃进性的,一定有许多困难。但从客观情况看来,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为害之烈更大。因此,应该克服财政经济统一中可能出现的小困难,避免由于不统一而产生的大困难。

2. 实行财政经济基本统一管理时,下级同志可能产生一时不关心收入,只伸手向上要的情况。只要我们反复说明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并保证下级的必要开支,预防和克服下级那种消极情绪是可能的。

3. 对于华东与所属地方的财政关系,公粮不宜实行比例提成,地方税也不采取分成办法。

4. 大项目的投资(如铁路、工业、水利等)属于中央各部直接掌握者,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属于大行政区掌握者,由大行政区管理<sup>①</sup>。

### (三)全国首届税务会议制定税政统一实施要则

为了改变各地在税收行政、税法、税目、税率及征收手续等方面极不一致的状况,1949年11月召开的全国首届税务会议,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政实施要则,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重

---

<sup>①</sup> 见《陈云文稿选编》中《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一文(1949年12月28日)。

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内容是:

1. 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
2. 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适当平衡城乡的负担。
3. 整顿各地不一致的税政、税种、税目、税率,在短期内做到全国税收统一。
4. 规定货物税、工商税、盐税、关税等 14 种税为中央和地方的税收。
5. 全国性的税收立法权属于中央<sup>①</sup>。

#### (四)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步骤

鉴于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准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严重而复杂的经济局面又要求尽快实现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为此,1950年2月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向中央提出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管理的步骤的报告,主要内容是:

1. 为了使各部门、各机关的高级干部对当前财政经济困难状况和解决办法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拟每旬、半月或一月通报一次财政经济要闻,使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员知道全国财政经济状况,以便统一思想认识,共同克服困难。

2. 人民币大量发行以来,在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 165 亿斤小米。为时只有一年人民即损失这么多,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需要采取措施尽快解决。

3. 去年秋冬以来,解放战争迅速进展,军政人员大量增加,但征粮时间未到,新解放区税款又收得少而慢,这种状况必然增加财政支出和货币发行。长此下去,金融物价必将发生大乱。为此,必须提早实行粮、税及财政基本统筹,各地务必于 2 月底以前建

---

<sup>①</sup> 参见《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和3月号。

立国库,以后逐日或三五日内将税款解交国库,使中央能够集中统一管理必要的财力,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4. 现在财政问题的中心是,多收税少发钞票。通过反复研究认为,在可能限度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少。这样做,工商业负担虽然稍重,但可保持物价平稳,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对正当的工商业有好处。

5. 掌握足够的粮食、棉纱和棉布,并搞好调运,以稳定市场物价。这就是,掌握粮食以稳定城市,掌握棉纱棉布以稳定农村。

6. 除西南外,各大城市必须于2月16日前将公债在各业各户派完,争取2月下旬将公债款收起一部分,3月基本收齐。以减少财政赤字,并保证国家财政支出<sup>①</sup>。

#### **(五)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讨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问题**

在思想认识和工作准备都有相当进展,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仍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创造条件,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实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为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0年2月13日至25日召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财政赤字大量增加,货币过量发行,物价大幅度上涨,国家财政经济存在很多困难的财政经济形势,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军费和行政费用负担沉重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不统一,财经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主要表现在财政预决算制度和收支系统不统一,各地自收自用的现象普遍存在,现金管理和物资管理制度还未建立,使得有限的财力、物力得不到有效的使用。为了迅速克服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会议着重讨论了统一财政经济、紧缩编制、现金管理

---

<sup>①</sup> 陈云:《财经旬报二则》(1950年2月1日),见《陈云文稿选编》。



和三大平衡问题。

一是实行六个统一。具体来说就是：(1)财政收支统一。凡是重大的收入和开支，都应由中央统一。(2)公粮统一。全国公粮除5~15%作为地方附加外，其余均由中央统一掌握。根据各部门、各地区的人员、马匹数目分配后，剩余部分全部交由贸易公司调拨，改变过去公粮分散在地方的状况。(3)税收统一。关税、盐税、货物税和工商税，统一集中到中央，并及时结算解缴国库。(4)编制统一。根据定员定额的原则重新审定编制，改变编制庞大、人浮于事的状况。编外人员数目自本年三月起须报中央由中央集中商度。(5)贸易统一。各地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和商品调拨，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地方不能干预。这样可以促进财政的统一，并减少浪费。(6)银行统一。统一现金收支，现金的高度统一归国家银行。以上几点，成为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二是实行财政收支、现金收支和物资供应的三大平衡。具体来说就是：(1)财政收支平衡。通过整顿税收、节省开支、集中国营企业利润和清理仓库等措施，保证财政收支平衡。(2)现金收支平衡。从增加收入、控制支出、及时解库和不搞透支等方面着手，实现现金收支平衡。(3)物资平衡。通过对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统一调度等措施，以及稳定市场物价等对策，实现物资平衡。

三是确定1950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集中国家财力和物力做当前最必须做的事。首先满足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保证900万脱产人员的生活开支，第三运粮救灾，第四重点恢复经济<sup>①</sup>。

#### **(六) 政务院颁布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

根据几个月来所进行的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各项准备

---

<sup>①</sup> 参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宋劭文《关于全国财经会议的传达报告》(1950年3月21日)。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档案科1949~1950年第129号案卷。

情况,根据全国财政经济会议的讨论情况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1950年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分析了当时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后指出,上述的财政收支不平衡与收支机关脱节现象,如不速求克服,则不但1950年的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而且由此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将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困难。政务院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为此,特作如下决定:

1. 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统一全国编制,规定统一的供给标准。各大行政区、省、大市也都要建立编制委员会,制定和颁布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编制,规定供给标准,不准虚报冒领。各机关不经批准不得自行增加人员,编外和编余人员由全国和各地编制委员会统一调配。从而做到编制有定员,供给有标准,经费有定额,大大缩减行政费用。

2. 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统一全国的物资管理。各大行政区、省、市、县、各后勤部、各国营工商企业,均设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进行全面清仓查库工作。所有库存物资,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从而大大减少财政支出,也减少由国外进口。

3. 统一全国公粮的征收和调度。全国各地所收公粮,除地方附加粮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各省、市、县、区人民政府,没有粮食局的支付命令,不得支取公粮。除人马口粮、集中的残废军人优待、救济、婴儿保育粮外,不经批准,各地不得以公粮发作经费。

4. 统一全国税收。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收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全国公粮征收额,包括地方附加公粮征收额在内的税则、

税目、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提交政务院决定实施,各地人民政府不得增减和变动。

5. 统一内外贸易管理。各地国营贸易机关业务范围的规定与物资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非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批准,各地贸易机关不得改变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业务计划。一切部队机关不得经营商业。

6. 一切国营工厂企业及合作社,均须按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规定按时纳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的所有工厂企业,均须将折旧基金和利润的一部分按规定、按期解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

7. 统一现金调度和管理。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牌价与外汇调度均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私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行庄。银行对现金收支按期编制平衡计划,以节省现金使用并有计划地调节现金流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不但避免了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集中使用的现金。

8.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必须保证军队和地方人民政府的开支,必须保证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为此,必须严格管理税款、公粮支拨、公粮实物变款、公债收入、国营企业上缴利润和折旧基金等,并保证这些收入按时入库。

9. 对上述各项规定必须严格地完全地执行。凡不实行或不遵守上述各项规定者,将给予必要的制裁,以保障上述各项规定的严格执行。

### **(七)政务院关于统一财政管理和统一粮食管理的决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加强财政统一管理,1950年3月24日,政务院第25次政务会议



又通过了《政务院关于统一管理 1950 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对统一国家财政管理和统一国家公粮管理，作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有力地保障了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

#### **(八)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的贯彻和实施**

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同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采用一切办法来保证政务院决定的全部实施。中共中央的通知指出，过去各解放区被分割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全国在地域、交通及物资交流与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作统一的管理和有计划的使用，非但不利于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而且将严重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因此，必须实行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中共中央的通知又指出，从旧的分散的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的方法转变为统一的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各地在财政和物资的征收、调度与支领等方面，发生一些困难是难免的。因此，各级党委要在军政、财经各部门工作的人员中作好解释工作，教育他们准备承受一个时期的困难，并保证政务院决定的迅速全部实现。中共中央的通知还指出，必须切实加强税收工作，千方百计地保证完成 1950 年的税收计划。为此，要下决心加强和充实各级税收机关。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工作的通知》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根据中央的决定迅速作出贯彻实施的具体部署。

1950 年 3 月 17 日至 25 日，河北省召开了各级经济部门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并据此安排了 1950 年河北省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一致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政务院决定的颁布“有历史意义，正合时宜，有政治与物质基



基础,有信心贯彻实现。”会议检查了过去那种“收入总怨上级要的多,开支总嫌上级给的少”的片面思想以及税收方面的“仁政”观点。会议根据政务院的决定,除了在财政、地方工业、物资交流、合作社和组织领导等方面作出具体决定外,并强调指出:中央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与搞好城市经济建设的一致性,而不是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地方财政经济工作要有新的转变,即从过去那种着重“自己建设”转变为“统一建设”,从过去那种着重“向上级要东西”转变为“给上级送东西”<sup>①</sup>。

为了迅速地全面地贯彻中央财政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对贯彻执行中央决定提出10项具体要求,并对省、专、县、区党、政、群组织机构编制人数和粮食调拨任务也做出具体的规定<sup>②</sup>。

1950年3月12日至20日,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了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并议定了贯彻执行这个决定的各项具体措施。在整顿收入方面,会议通过了关于保证完成税收任务和公粮任务的两项决定,以及粮食入库、保管和调拨的具体方案。在节约支出方面,会议按照中央确定的编制方针,审慎地核实人数,重新拟定了西南地区各级政府和军队的编制计划,对原定编制计划作了大量压缩。在清理资材方面,会议决定先清理重要的珍贵的物资,后清理一般的物资;先清理露天的物资,后清理仓库内的物资;做到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第一卷(1950年4月7日)。

<sup>②</sup> 见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财委关于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编《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五卷。

一面清理，一面整理。凡各部门现存物资，均按统一规定和名称查点清楚，造具表册，逐级上报。在清理后所有物资即告冻结，仓库则仍由原单位负责保管，由中央统一调配。

1950年3月18日至25日，在西安召开了西北地区财政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和要求，总结了过去财政和工商等工作的经验，具体部署了1950年西北各地的税收、公粮、公债工厂企业折旧、利润等项收入的任务，并本着“缩减开支，重点使用”的原则，制定了各项事业经费分配使用的方案。同时，对于整编机构、核实人马、统一供给标准和清理仓库等问题，亦提出了初步的实施办法。

1950年3月9日，中共西北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发出《关于保证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通知》指出，在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所属各部队中，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指示，主要问题是厉行节约，减少支出，建立严格的财经制度，同时保证完成1950年的生产任务，弥补国家财政赤字。为此，首先是在团以上各级机关都要成立整编委员会，负责点验与核实部队人员、马匹及车辆的确定数目，从而建立部队精确的统计制度，做到合理使用人力和物力，消除浪费现象。第二是成立各级物资清理委员会，彻底清查在解放战争中接收的敌伪资财、工厂产品、原料及各部队现存的一切物资，以便统一调度，物尽其用。第三是搞好生产节约。1950年每人必须保证完成生产节约3市石小米的任务。除供给标准外，一切制度以外的开支均需经上级批准，凡超过一亿元（旧币）以上（合小米5万斤）的开支必须经前委批准<sup>①</sup>。

1950年2月21日至3月10日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

---

<sup>①</sup> 中共中央西北局《党内通讯》第45期。

定了 1950 年银行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实行现金管理，大力组织存款，建立国家金库灵活调拨资金，掌握外汇，控制游资，建立制度，树立统一集中的有计划的稳定金融和扶持生产的方针。由于到会人员多是抱着增拨资金、扩大放款和扶持地方生产的要求而来的，对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上述金融工作方针缺乏思想准备，尤其是对于各地将把存款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一点，更是没有预见到的。因此，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有的对中央的决定和上述方针将信将疑；有的对存款集中使用，在思想上有抵触情绪。经过讨论，与会人员思想认识有了显著的提高，大家决心按照全国财政经济会议的要求，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并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为了大量吸收存款，集中更多的现金，除报请中央颁布现金管理办法以集中国家的现金外，还要扩大折实存款，并引导与调节金融市场利率逐渐下降到合理的程度。同时，全面开展汇兑业务，贯彻廉价多汇的方针，逐步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中等以上城市普遍通汇，以促进金融和贸易的流通。为了集中管理和使用资金，各级银行吸收的存款中，60%交人民银行总行集中统一使用，20%准备提存，地方运用部分不超过 20%。

2. 普遍建立金库和县支行。

3. 为了灵活调拨资金，拟增设发行库 119 处，并制定资金调拨制度，以利于金库、汇兑和资金的调拨。

4. 搞好贷款工作。首先保证中央所确定的人民银行总行贷款任务的完成，其次是各级银行根据需与可能，发放适量的贷款。

5. 外汇汇率与外汇调拨统一由人民银行总行掌握。汇率确定应以扶持出口和奖励侨汇为原则。

政务院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通知下发之后，全国各地立即认真贯彻执行。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即到 1950 年 6 月，就统一



了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范围之广，进度之快，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既表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表明了人民政府高度的工作效率和受到人民的热诚拥护，还表明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是符合经济发展要求和人民利益的。

### 三、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成效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巨大胜利，使国家掌握了财政、金融、市场、物价的主动权，初步建立起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秩序，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建设战线上取得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财政工作方面，集中表现在保证了军政费用和重点恢复经济费用的支出，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具体来说就是：(1)财政收入增加。同1949年12月确定的1950年财政收支概算相比，财政实际收入比概算超过了31.7%，其中城市的税收超过概算62.9%。而财政实际支出只超过概算14%，其中国防费用超过预算21.8%，占超支总额的43.3%，主要是由于抗美援朝而增加的军费支出。(2)基本上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由于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并采取增加收入和控制支出，以及采取发行公债和向苏联贷款来弥补一部分赤字等措施，使1950年的财政赤字只占财政总支出的4.3%，比1949年的46.5%减少了42.2个百分点。全年财政赤字80%以上又是发生在没有实现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第一季度和正在实施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第二季度。(3)各地上解中央财政数额增加，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数额减少。1950年第1季度，各地上解中央财政数额只占这一年全年上解总额的7.9%，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数额却占这一年全年补助总



额的43%。在实现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的1950年第4季度,各地上解中央财政数额占这一年全年上解总额数为39.8%,而同期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数额占全年补助额则为14.7%。从而使中央财政集中程度加强,财政机动能力加大。这样,国家可以分别轻重缓急,集中力量支援前线,重点恢复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并能拿出60亿斤公粮来调节城市供应,以10亿斤公粮(不包括现金)救济灾荒和城市失业工人。(4)减轻了人民负担。根据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后,国家财政情况有所好转的新情况,并考虑了人民负担过重而不利经济恢复和发展等问题,1950年8月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召开的秋征会议决定,把农民的负担由17%减少到13%。嗣后又决定把食盐税税率减少一半,工商税和其他税收也适当减轻。

在金融工作方面,由于实行现金统一管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而不需向银行透支,金融工作逐步趋于稳定。主要表现在:(1)货币发行受到控制,基本上做到按照经济发展需要而有计划地投放。据统计,1949年7月上海财政经济会议前夕至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前夕的7个月期间,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2.7倍,其中当然有解放区扩大相应需要增发货币这个重要因素,但财政赤字过大和物价暴涨则是货币超经济大量投放的更重要原因。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决定至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7个月期间,货币发行量只增加了0.36倍。其中4月、5月和7月,货币还是回笼的。(2)银行存贷款和其它业务迅速增加。1950年6月底,人民银行全行存款达到12万亿元(当时币值,下同),比2月底增加4倍以上;贷款10万亿元,比2月底增加10倍;汇兑业务平均每日汇出4500亿元,比2月底增加4倍以上;外汇积存15000万美元,比2月底增加2倍。(3)银行资金集中程度加强,有利于资

金的合理调动和使用。1950年3月以来,在实行现金统一管理的过程中,人民银行全行资金由总行集中运用的数额和比重不断扩大,到6月底已达15万亿元,比2月底增加90倍。资金的统一管理和集中调用,减少了货币的发行,有利于金融的稳定,而金融的统一调度和合理使用又有利于市场物价的稳定。

在仓库物资清理方面,通过9个月的清理工作,到1950年底,各大区和中央各部已清理出物资折合116亿斤米(不包括军事系统)。其中可抵作1950年财政收入的为32亿斤米,可抵作1951年财政收入的为34亿斤米(仅华东即有19亿斤米)。在清理的物资中,工矿产品器材至少有35亿斤米,1950年上半年已用于工业生产的达5亿斤米以上。通过这次物资清理,既可使国家掌握大批物资,有利于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国家财政开支,有利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还可树立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优良作风,有利于克服铺张浪费和贪污腐化的倾向<sup>①</sup>。

在稳定市场物价方面,由于国家财政收支逐渐趋于平衡,财政赤字逐季减少,消除了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同时,货币发行由过去那种主要用于财政支出开始走向有计划地为恢复和发展城乡经济服务。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和货币不搞超经济发行,为扭转通货膨胀提供了条件。加以物资的统一管理和调配,使国家掌握了经济实力,有力地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从而使市场物价平衡下来。据有关方面估算,1948年12月至1950年2月期间,批发物价上涨了150倍,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极端紊乱。这对国

---

<sup>①</sup> 参见中央财经通报创刊号登载的《全国仓库物资清理委员会关于全国清库工作的初步总结》(1950年7月28日)和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处档案1951年7号案卷中《中财委关于1950年仓库清理调配工作向中央的总结报告》(1951年3月19日)。

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极大的困难,对人民生活也造成极大的痛苦。1950年3月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以来,物价出现了稳中有降的趋向。以1950年2月为基期,批发物价指数分月变化情况是:3月为87.3%,4月为70.9%,5月为68.2%,6月为73.3%。1950年6月以后,由于发生朝鲜战争影响到我国安全,使备战军需大量增加,故物价有所波动,但整个市场物价的大局是基本稳定的。以批发物价指数计算,1950年12月比1950年6月只上升了16.9%,但比1950年2月降低了14.3%。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平衡财政收支和稳定金融物价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刘少奇曾经指出的:“这是除开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上的胜利以外,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为人民所做一件最大的工作。”他又指出:“中国的财政经济,在历史上是没有统一过的。国家财政收支,在过去数十年中也没有平衡过,反动政府每年必须发行巨额的钞票和举借巨额的内外债才能过日子。中国的金融物价也是12年来没有稳定过的,人民必须在通货膨胀的损失中付出巨额的资金。但是人民政府在战争尚未结束与发生灾荒及帝国主义封锁等情况之下,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实现了这些重大的措施,并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是任何反动政府都不能做到的,只有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做到。”<sup>①</sup>

应该看到,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实质上是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的改组,即将我国经济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上转移到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主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个极其复杂而又急剧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出现

---

<sup>①</sup> 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1950年4月29日)。载于《新华月报》1950年5月号。

某些困难和痛苦，“刹车”过急和经验不足，也加剧了这些方面的矛盾，从而导致工商业萧条，发生了一些企业停工、歇业和工人失业的现象。对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工商业，加以解决。人民政府不但帮助工商业克服了种种困难，而且开始逐步把私人工商业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恢复、改造和发展中继续前进。1950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增长17.8%，工业增长36.4%。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结出了丰硕之果。



# 建国初期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概述

于武真

## 一、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完全恢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宣布要为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国完全独立而奋斗。1949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

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sup>①</sup>七届二中全会据此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论述和《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在其诞生过程中和诞生以后,采取了逐步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的方针与措施。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被一一取消,驻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军事基地被全部收回,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协定、合同及换文随全部失效。全国解放时,尚留存在北京、天津、上海的原供帝国主义国家驻军用的兵营及其房地产,新中国予以收回和征用。1949年天津解放后,英国和美国兵营即由学校、医院进住使用。1950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布告,宣布收回美国、法国和荷兰兵营的地产权,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4月,北京市军管会又征用英国兵营。6月,天津市军管会征用法国兵营。1951年7月,上海市军管会收回法国兵营。至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驻军权被彻底肃清。在这一过程中也是有斗争的。收回和征用北京美国、法国、荷兰兵营时,三国前领事曾借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进行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4页。

抗拒。新中国坚持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严正立场，法国、荷兰才按期于1950年1月14日交还兵营地产及其建筑。美国国务院则声称北京市军管会的决定“违反了1901年给予美国的、并在1943年中美条约中加以重申的、久已存在的权利”，并硬说中国收回的是“美国领事馆的办公地址和产业”，还威胁说因此要“撤退所有美国官方人员”。新中国对此严加驳斥，最后美国不得不于1950年1月16日交还兵营。1月1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明白宣布，要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不管它们是“久已存在”的也好，是“1943年重申过”的也好，北京市军管会有义务执行《共同纲领》，但决无义务执行这些不平等条约；在北京的一切外侨，包括外国驻京前领事在内，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而不应当妄想保持旧日的特权，否则就是违背中国政府的命令，侵犯中国的主权；北京市军管会所收回的不是任何领事馆的“办公地点和产业”，而是某些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中的所谓“驻军权”而占据的中国地产，军管会所要征用的只是此项地产上的兵营，而且因此项地产收回所产生的房屋问题，中国人民政府还要另定办法解决。评论还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保卫自己祖国的主权的立场上，是从不考虑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意志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制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特权，必须废除；帝国主义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嚣也好，威胁也好，对中国人民的这个严正立场丝毫没有影响。

新中国一概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关和外交人员、领事机关和领事人员的合法地位，他们不得代表其政府在中国进行活动。1949年春，毛泽东主席就提出要“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尚留在中国的外

国前驻华外交人员和领事，只把他们作为外国普通侨民对待。对于从事间谍活动者，如美国前驻沈阳和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领事，则驱逐出境。对外国侨民进行登记，加强管理。外国侨民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凡守法者，予以保护，有不法行为者，依法处理。对外国侨民持有的武器、电台，要求他们予以登记和封存。关于外国人入出境和在中国居留、旅行，新中国制定了管理办法。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犯中国的司法权。这样，帝国主义在中国残余的领事裁判权被彻底清除。

新中国立即收回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自由航行权和引水权。1949年1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于国家主权侵害最大者，例如内河航行权，要发出立即禁止的命令。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等，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外国轮船和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即告结束。各港埠解放后，其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都发布了外籍轮船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明文禁止外国轮船在中国内河航行。1950年4月，交通部颁布了《关于外籍轮船进出口管理暂行办法》和《进出口船的船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规定：外国轮船进出中国港口、停泊及移泊地点，须事先经批准和查验，不得任意移动，更不得停靠军事禁区；外轮抵港后，不得使用船舶电台、雷达和武器等；取缔外国侵犯中国领水的引水权，引水员一律由中国人担任，将过去的自由引水改为强制引水；在中国领水内发生海事事件时，按照中国公布的《海事处理暂行办法》处理。1950年7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建立统一航运管理机构，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法规进行统一管理，限制并逐步接管外国在中国的轮船公司。嗣后，外轮一般不许驶入中国内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并经政府批准，才能驶入



长江,但它们必须悬挂中国国旗,在指定码头停泊,遵守中国一切法令并封闭其武器和电讯、摄影、测绘等设备。至此,丧失了一百多年的中国领水主权全部恢复。

新中国取消了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海关的管理权,撤销税务司并接管各地海关。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正式成立。1950年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在收回关税自主权和海关独立主权的基础上,指出国家海关工作在恢复与发展经济中应起重要作用,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和国内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1951年4月18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对中国海关的组织、任务和职权,进出国境货运、过境和转运货物的监管,进出口货物的报验、征税、保管和放行,国际邮递物品的监管、报验、征税和放行,进出国境人员及其行李物品的放行,走私和违章案件及其处理等,都作了规定。这是自1859年中国海关落入帝国主义者手中以来,中国人民自己制定的第一部独立自主的海关法。5月16日,又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从此,中国海关有史以来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了。

与此同时,由国家经营和管制对外贸易,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1949年初,中共中央指示:要在严格保持国家主权独立、由政府进行管制等项原则和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对外贸易;立即设立对外贸易局,由国家统一管理对外贸易;目前国家尚不能经营的某些对外贸易以及由私人经营无受害者,应在国家管制之下,允许其继续经营,但须事先报告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并照章报关纳税。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从此,取消了一百余年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外贸的垄断。

新中国还颁布了《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实行外汇管制,清除

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中国外汇管理和金融财政的特权。此外，收回全国解放时仍被帝国主义占用的前租界公产，彻底取消了其在前租界保留的各种特权。

## 二、清理外国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就决定：除了废除卖国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要没收官僚资本归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可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全国胜利以后，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并曾设想独立后的新中国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接受外国投资。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决策，对外国凭借不平等条约和特权而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等经济事业，采取了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个别处理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予以清理。

在解放战争胜利进行中，中共中央于1948年2月7日发出指示：目前对于外侨所办的经济、文化等机关，一般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政策，只要他们遵守中国法令，容许其继续存在，进行正当业务活动，并受中国民主政府的保护；外国银行或代办所，一般先停止营业，审查其业务情况，如确有需要，许其重新营业。在大城市相继解放后，起初，对外国人所办企业只进行监督和管制，要求他们依法正常开业，对某些暂时无法替代的企业还给予协助。

1949年,在全国刚解放和急需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对外资公用事业和开滦煤矿,首先派驻了军事特派员或联络员,会同政府主管部门和工会,监督和帮助其正常生产,严禁怠工和破坏。对从事中国进出口业的外商加以登记,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后,允其按照中国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依法进行贸易。外国轮船公司经批准后,可进行航运主要是远洋航运业务。对外国银行予以登记,并规定其业务范围,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定若干外国银行代理外汇业务。关于外侨为维持其生活而开办的私人小型工商业,允其守法经营,如其申请歇业,只要无未了事项,予以批准,倘申请新开业,则从严掌握。停止外商对商品检验和衡量两项公证业务,收归国家统一经营。同时,公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外侨及其所经营之企业,必须遵守法令,照章纳税。”

1950年6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了《关于外人教会和外国人在华房地产的处理原则》。根据上述法规,1950年开始处理外国私人、团体或政府在中国拥有的房地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有土地所有权,不准许他们买卖或继承土地。对外国人占有的农田和农村空地予以没收或征收,对有建筑物的基地随同处理建筑物予以收回,土地不计入外国人的资产。对外国政府占有的租界地产、兵营地产明令收回。对外国团体拥有的俱乐部、跑马场、赛狗场等房地产和一些外国政府占有的房产予以代管、占用或收回。外人教会拥有的房地产,大部分随着宗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由教徒捐献而转归中国教会所有,其余由各地人民政府收归国有。对美国根据1946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让售战时剩余物资协定》而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沈阳、汉口、青岛、重庆、昆明等11个城市取得的98处房地产,一概不予承认,确定收回。关于外



侨拥有的私人房产，暂维持现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但用武力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把战火引向中朝边境，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地区，炮击和盘查中国商船，中国的安全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被迫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美国对中国不但在军事上进行侵犯，而且在政治上进行孤立、在经济上进行封锁。这促使中国加速清理外国首先是美国在华企业。1950年11月5日，外交部向全国各地发出《关于外资企业处理办法的初步意见》：（一）区别外资企业所属国家，首先应以美国在华企业为主要对象，对英资及其他外资企业亦得加强管理使之适应中国的需要。（二）凡与中国国防有关及对中国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而处理后对中国有利无害或利多害少者，首先予以处理；尚对中国经济有利或利多害少者，可较缓处理，但也应加强管理。（三）对首先处理的外资企业，视情况按军事管制、全面接管及没收之程序加以处理。对公用事业首先实行军事管制；对码头、仓库等根据需要实行统一管理制度，必要时可分别征用；对石油业之存油应立即尽量征购，以便疏散保管；根据形势发展和中国之需要，必要时对美石油业及其他企业设备实行接管。（四）银行、保险、进出口业及轮船业，可较缓处理。（五）处理外资企业应有公开的法律依据。

1950年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自当日午夜以后对运往中国的一切货物实行许可证管制办法，从而将1949年就开始实行的对战略物资的许可证管制办法推广适用于一切商品，以便在美国政府认为有对中国实行绝对禁运的必要的时候，可提供实施这种禁运的手段。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辖区的一切资产并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在此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采取对策。12月28日，周恩来



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命令说：“鉴于美国政府这种对我国日益加剧的侵略和敌视行动，为了防止其在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和危害我国家人民的利益起见，特采取如下措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央直属省、市报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之）。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其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持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需的费用，亦须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其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经经济委员会另行规定。以上命令，于公布之日起立即施行。”同时，发出内部指示：不停止美资工厂的生产、商店的营业；除要美商报告其资产外，不要到其商店或私人家里去清查财产；对上海美国电力、电话公司进一步实行军事管制；对美侨个人存款不超过三千元、企业存款不超过五万元者，动支时不予限制；不要把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医院、教会等视为美国所有而冻结其存款等。各地人民政府立即执行了政务院的命令和指示。上海市于12月30日对德士古石油公司、上海电力公司等115家美国企业实行管制。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在总结全国管制、清查美国资产之经验的基础上发出通报，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企业中凡有关中国主权及同中国国计民生关系较大者，可予征用；关系较小或性质上未便征用者，可予代管；认为有需要者，可予征购；对一般企业可加强管制，促其自行结束。按此原则，上海市于7月11日征用了美孚、德士古和中美三家石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油料。到1952年底，共处理美国企业171家，加上在1950年底

前已歇业的 60 几家,总计 240 家,占美国企业总资产的 94.5%。至此,对美国企业大体清理完毕。

对英国在华企业的处理办法,也同当时英国对新中国所采取的不友好态度密切相关。1950 年 5 月 10 日,英国非法扣押中国留在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全部飞机资财。5 月 17 日,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英国政府解除扣押。但英国置若罔闻。朝鲜战争期间,英国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1 年 4 月 7 日,香港英国当局非法征用刚在香港修理完毕正待驶返的中国永灏油轮,并把它移交给英国海军,为其帮助美国进行侵朝战争服务。4 月 18 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4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征用英国在中国各地的亚细亚火油公司除其总公司和分支机构之办公处及推销处外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1952 年 7 月 28 日,英国枢密院竟然宣布将中国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 40 架飞机及其他资财“判给”美国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中国政府于 8 月 2 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于 8 月 15 日征用上海英国英联船厂和马勒机器造船厂的全部财产。10 月 8 日,香港英国高等法院公然又将中国航空公司 31 架飞机及其他资财“判给”美国陈纳德的上述公司。中国政府于 10 月 28 日再度提出严重抗议,并于 11 月 20 日征用上海英国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以及在上海、天津和武汉的英国隆茂洋行的全部财产。

英国政府自 1950 年即已在贸易方面对中国采取管制措施,1951 年又开始跟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并于 6 月 19 日宣布把运往中国及香港的一切货物置于特许管制之下,致使英国在华工商业遭受重大困难,而不得不提出结束业务。英国政府乘机暗中策动在华英商“集体撤退”,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华英商将转移、

或托管、或结束，一些重要英国公司则拟成立永久性的商务代表团。1952年5月7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已难以维持生产的英资开滦煤矿的请求，下令由燃料工业部将其代管。7月5日，外交部发表声明，只要在中国境内的英国各公司厂商遵守中国法令，仍当予以保护；如果自愿结束业务，则不论采取何种方式结束，都可向当地人民政府分别进行申请，由各地主管机关据情依法处理；英国的任何公司和厂商或其在中国境内的公司和厂商以及他们联合组织的团体，只要不怀垄断企图且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贸易，都可以随时同中国的公私贸易机构进行接洽。颐中烟草公司及其在中国各地的分公司和卷烟厂曾请求准其解雇职工、停工或由中国政府租用、收购等，中国主管部门对这些不合适的要求未予同意，其遂陆续实行了对价转让。同时，全国各地根据个别处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条件成熟的英国大公司、大工厂加速清查，对他们集体搞托管、出售或出租等要求予以拒绝，对资产不多又无未了事项者准其从速歇业，对尚可利用的则主动安排一些业务。到1952年底，共清理英国企业236家，占其在华企业总资产的63%。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快了对外国企业和房地产的清理工作。1953年6月，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在总结几年来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如下基本方针：（一）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处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产业，而与其开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二）按照国籍、系统、行业等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个别处理，稳步前进。（三）密切结合国内外形势与政策、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国内建设的需要与可能以及外资产业本身的具体情况与意愿，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采取多种处理方式。实际使用最多的方式有四种：军事管制、征用、代管和对价转让。此外还有接



管、没收、征购、收购、扣押、定期代管逾期收回、自行歇业等方式。对价转让是由外国企业同中国国营企业订立契约，写明前者自愿将资产转让给后者，而后者承担前者的债务和对职工的义务。这种方式对双方有利，政治上平和，也不留未了事项，因此后期多采用此种方式。

从 1953 年至 1956 年，除对美国企业全部清理完毕外，主要是继续清理英国企业，同时清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

对英国在中国的垄断组织怡和、太古、信昌三家洋行，以对价转让方式予以结束。对汇丰、麦加利、有利三家英国银行，根据清理其全部在华资产、承担合理的本币债务、不接受外币债务等原则，也实行了对价转让，除汇丰、麦加利两家上海分行由中国政府指定经营外汇业务外，三家银行及其在中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先后全部结束。这一期间，共清理英资企业 228 家。到 1956 年底，英国在华企业总资产的 93.1% 清理完毕。

对法国企业也大多是在这一时期进行清理的，且以代管、对价转让、自行歇业为主。1953 年 11 月 2 日，中国政府将事关上海人民生活的法资上海电力、电灯两家公司收归国营，代管其全部财产。对法国天津电力公司、上海万国储蓄会、东方汇理银行、东方修焊公司、中法求新造船厂等企业，陆续进行了处理。到 1956 年底，共处理法国企业 90 家，占全部在华法资的 98.9%。

对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产业以及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已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的企业，中国政府认为，只要它们遵守中国法令，不危害国计民生，可继续经营。但由于美国力图纠集一些国家对中国搞封锁禁运，中国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国家的企业也就逐渐收缩或转让了。中国遂对这些外国企业以收购、代管、接管、对价转让、自行歇业等方式进行了清理。到 1956 年底，共处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



企业 387 家,占其在华企业总资产的 55.4%。

处理外国私人或团体在华房地产,也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对隐匿的敌产、逆产、美产予以没收。对外国人在中国城市占有的空地,则根据市政建设需要个别或分批收回。对大量出租或经营房地产的外国房地产商、个人或企业,不承认其合法,明令停止出租,而以对价转让、代管、收回、没收等方式予以个别解决。对外国教会所办学校、医院、救济机关等房地产,将其土地收归国有,其房产及设备归接管或接办单位所有。对外国团体房地产,收回土地,以征用、代管、对价转让等方式处理其房产。对外侨私人房产,允其自用、继承、转让、自动放弃及出售给当地政府机关或中国公民,但不得用以抵押、出租或赠送给其他外国人,出售或转让时应在有关契约或法律文件上写明“土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到 1956 年底,共处理地产面积的 98.9%,房产近 90%。

此后,经过扫尾工作,原靠不平等条约和特权而在中国兴办的外国企业已不到 10 家。清理外国在华产业的任务基本完成。

### 三、清除帝国主义精神侵略方面的影响

帝国主义一向注重对中国进行文化和精神侵略,影响很深。它们利用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为了侵略的需要,在中国经办各种文化、教育、宗教及所谓慈善机关,向中国人民灌输其价值观念和进行其他损害中国的活动。毛泽东主席在 1949 年 8 月就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而为新华社写的五篇评论中,深刻指出:为了侵略,帝国主义需要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

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处心积虑地在中国经营了105年。现在美国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警惕他们在暗地里进行阴谋活动。周恩来于1949年4月17日指出: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例如协和医院,我们的人生了病还去那里就医。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后来,周恩来1952年4月30日在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我们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先把“屋子”打扫一下。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关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事业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解决”的决策,新中国采取了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清理外国在华文化、教育、卫生、宗教和所谓慈善事业的方针,以肃清帝国主义在文化和精神侵略方面的影响。

在解放战争进行中,随着大城市陆续被解放,各地军管会就已首先开始清理帝国主义国家在旧中国建立的官方或半官方新

闻宣传机构。从1949年2月27日北平(北京)市军管会发布有关通令起,至同年10月,全国各地相继停止“美国新闻处”的一切活动;对“英国文化委员会”设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机构,或停止其活动,或限制其在会址外活动;不许外侨在中国兴办报纸和杂志,并停止了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和外国记者的活动。在此短时间内,完成了取消帝国主义在华宣传机构的任务。嗣后,对外国记者和外国宣传品的输入,由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相应规定,进行管理。

外国教会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之一。从城市到乡村,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教会的操纵和影响,并往往接受它们的津贴,有的甚至成为它们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掩蔽所。新中国不允许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必须予以清理。《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并保持正常的宗教活动。全国大陆刚解放时,新中国要求各宗教团体恪守法令,许其暂时接受外国津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教徒掀起反帝爱国运动。1950年8月,中共中央指示,要割断教会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9月23日,中国基督教知名爱国人士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努力途径》之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割断与帝国主义者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方针。绝大多数中国基督教领袖和教徒签名拥护。11月30日,中国天主教四川省爱国教徒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全国各地天主教徒纷纷响应,形成中国天主教自立革新爱国运动。12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指示,重申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明确提出“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应逐步使之变为由中国人办理的、掌握在反帝爱国教徒手中的机关,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1954年和1957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这两个全国性机构先



后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一直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反对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干预中国的宗教事务。

对于外国人经办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教、卫生、救济机构,中共中央在全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形势下提出:外国人办的学校,暂许其维持现状,但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学校经费的来源必须报告,课程必须照其他学校的规章同一办理;外国人办的医院,已办者许其继续,但须受中国监督检查,新办者未得批准不许开业;外国人办的救济机关,属于国际合作团体者,须视其有无损害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团体的独立自主,方能决定接受其援助和救济与否,尤其是对美英等国的团体和个人救济更须识别其背景,有反动阴谋者拒之,有进步作用者欢迎之。建国之初,中国政府要求接受外国(主要是美国)津贴的文教机关恪守中国法令,允许它们暂时接受这种津贴。但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这些机构后来大都表示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于1950年11月28日在安理会发表诬蔑中国人民的演说,他把一百余年来美国为侵略中国而兴办的宗教、文化和所谓慈善事业统统说成是对中国的“友谊”,并扬言中国人民要生存必须仰赖美国的“救济”。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公愤,要求将这些机构改由政府接办或改为中国人民自办。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一)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二)对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之事业。完全自办而经费确有困难者,由政府予以适当补助。学校由国家接办,宗教学校可由中国教徒自办。(三)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



民救济总会予以接办。(四)宗教团体改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他们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12月30日,政务院又发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根据上述规定和条例,1951年1月,教育部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的会议,决定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接办。华北、中南、西南等一些大行政区也分别召开了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中等学校的会议,决定由各地人民政府接办或交由中国人民团体经办。同时,对接受外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也均作了相应的处理。这样,中央的决策全部付诸实施。

新中国废除了旧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又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处理了外国政府、团体或个人凭借不平等条约与特权而在中国兴办的企业和房地产业以及经办或津贴的各种文化、教育、卫生、救济机构和宗教团体,实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决策,维护和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并为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开辟了崭新的道路。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所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并不主张“排外”和“闭关自守”。在这一点上,这一时期我们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强调:我们首先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

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方面,我们都要学,但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目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建国初期党关于就业问题的政策

武 力

建国前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和长期战争的破坏,使得失业问题成为当时新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经济问题之一。然而,中国共产党较好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保证了建国初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今天,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对于了解国情、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一、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 “吃饭”问题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政权执政党的形势下,针对旧中国民不聊生、失业问题严重以及政权更替导致的新失业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在农村开展彻底的土地改革,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对城市的失业问题,则认为必须通过恢复和发展生产来解决。为了缓解城市失业问题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在尽力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采取了两项具体政策,一是实行“劳资两利”政策,限制私营企业解雇职工;二是对原国民党及其政策遗留下来的公职人员(包括官僚资本企业的职工),实行“包下来”的办法,不使其“生活无着”。关于土地改革和“劳资两利”的思想和政策已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

述,只谈一下“包下来”的思想和政策。

随着大中城市的不断解放,如何对待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公职人员,就成为解放战争后期我党城市接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48年8月7日,较早进入接管城市阶段的东北局根据两年来的经验,提出:对于接收过来企业中的旧职员,除“不愿为人民服务,或因作恶过多为工人痛恨不能留用者外,其余凡愿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者,都应给以工作。”<sup>①</sup>

同年11月沈阳解放后,在接管过程中,对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开始实行暂时“包下来”的政策。11月3日,沈阳市军管会向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颁布如下六项规定:(1)原职照常上班;(2)保护原所负责的一切;(3)造册上报军管会接收系统;(4)呈报手续由该机关主管人员办理,限三日内呈报完毕;(5)有功者奖,违抗或不当者罚;(6)到职人员发生活维持费。东北局成功地接管沈阳以后,将上述经验上报中央,并提出对于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而又不适宜继续留用的旧军政人员也不宜过早遣散。12月14日,中共中央将此报告转发各地参照执行。

平津解放以后,中共中央对原国民党政府及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提出了如下处理意见:区别国民党政治机关与企业机构,对企业机构的旧职员,在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后即进行必要的改革,设法清除那些坚决反动的分子、劣迹昭著为大多数群众反对的分子、没有能力倚仗权势在企业中领取干薪的分子,其余人员则根据实际能力安排相应工作,工人亦按此原则处理。对于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除少数市政方面的公用、卫

---

<sup>①</sup> 《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252页。



生等机关外,我们一般不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更不依靠原来的机构,而要加以打乱,因此可采取更急进的办法。对这些旧职员,除少数必须留用者外,原则上应集中训练。训练后除必要者可回本机关工作外,一般可用人员亦不应回到原来机关工作,而应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分派其他机关工作或其他地方工作;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令他们候差,等候任用,在候差期间发给必需的生活费;对反动分子、劣迹昭著及其他无能的不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sup>①</sup>。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军管会遣散了傅作义旧部军官 1.8 万人回绥远(每人发 3 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南京、上海、杭州解放后,当地军管会也裁减了 2.7 万余旧人员。前者对后来绥远的和平解放产生不利影响,后者则引起社会波动。上述两件事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7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裁员减薪问题给北平市委的指示》中指出:一般性的裁员,则必须事先对被裁减人员拟有妥善的安置计划,以免他们被裁后流离失所,别生事端。9 月 16 日,毛泽东又在其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公开提出:“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以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sup>②</sup>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提出如下政策:(1)在旧人员中,除少数战犯、特务及劣迹昭著的分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对北平各机关旧职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1949 年 3 月 22 日)。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512 页。

子以外，一般均将其希望寄托于我们，其基本要求是吃饭。京、沪、杭解放后，把旧人员裁去了 2.7 万余人，引起很大波动，北平和平解放后，遣散傅旧部军官 1.7 万人均逃至绥远，怨天恨地，现在仍须由我负担解决，所有这些经验，说明旧人员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须给工作和生活的出路。(2)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准备在全国解放后，在一定期间内，包括新旧军政人员在内，总共养活九百万到一千万人，这在财政上必然有很大困难，但是可以解决，而在政治上有十分必要。(3)对留用的旧人员，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向他们说明困难，适当降低待遇。(4)一切人民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均须改变国民党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作风，精简机构，但对精简下来的人，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训练班，受训期间的工资照减薪后的六折至七折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

11 月 2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电再次强调：“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sup>①</sup>

在建国前后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党和人民政府对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 900 余万公职人员（包括官僚资本企业的职工）采取了“包下来”政策，进行了妥善安置。党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从社会安定角度和人民根本利益来考虑问题的，因为当时经过长期战乱，社会贫困，失业严重，遣散旧政府遗留下来的不适用人员，

---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16 页。

如果这些人衣食无着，国家也得救济，而且所需费用也与“包下来”差不多，而且还导致这些人绝望，增加社会混乱。“包下来”政策表面上看增加了财政负担，但实际上不仅有利于新生政权巩固，而且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包下来”政策是最好的选择。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sup>①</sup>

## 二、安置与救济并重的对待失业政策

建国之初，由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和解放后政治经济改组导致的新失业，使得城市失业问题非常严重。1950年7月，已登记的失业工人即达166.4万，占当时城市职工总数的21%，此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知识分子。刚刚解放尚处于贫困线上的人民，失业即意味着饿饭，在一些大城市里，因就业无望生活无着而自杀的事时有发生。

对于严重的失业问题，中共中央没有象对旧公职人员那样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由政府养起来，而是采取扩大就业和实行社会救济的办法，帮助城市失业者度过难关。

1950年3月统一财经以后，通货膨胀和市场得到控制，党和政府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同时，统一财经以后，由于市场暂时疲软和经济改组，也使得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和严重。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举行全国救济失业工人运动和筹措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办法的指示》，提出在“五一”前后开展一场全社会捐助救济失业工人运动，要求各地作好准备。4月19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上海市委和华

---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74页。



东局,4月20日又致电中南局并各中央局,说明中央正在制定救济失业工人的统一办法,要求在中央的统一办法颁布实施前,各地可先行采取临时救济办法。4月30日,刘少奇在首都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提出:“既然某些经济事业的缩小、停工和转业是不可避免的,在各大城市中,在可能范围内,救济失业工人就是完全必要的。”“从来中国的政府是不救济失业工人的,而人民政府虽然今天还处在困难之中,对于失业工人就要规定并实施确实救济的办法。”<sup>①</sup>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提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sup>②</sup>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将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列为当前八项任务之一。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中共中央于6月17日发出《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该文件指出: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是当前主要任务之一。同日,政务院也颁发《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7月2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救济失业教师和处理学生失业问题的指示》。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5个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又发出《关于救济失业工人问题的总结及指示》,政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补充指示》,进一步完善了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

在救济失业人员方面,党和政府采取了政府拨款与社会捐助

---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7页。



相结合、解决燃眉之急与帮助提高就业转业能力相结合的办法。

从失业救济基金看,其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1)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2)由政府向社会征收的救济金。政务院规定:凡是举办失业救济的城市,其所有国营和私营的工厂、作坊、商店的行政方面或资方,均须按月交纳所付实际工资总额的1%,上述各种企业及码头运输等事业在业工人和职员,亦应按月交纳所得实际工资总额的1%,作为失业救济基金。(3)社会各界的自愿捐助。如1950年“五一”节前后,全国总工会号召每个在业工人捐献一天工资;人民解放军号召每个指战员捐献1斤米;国家机关号召每个工作人员捐献12斤米。1950年和1951年失业救济基金来源构成如下:

基金来源	1950年	1951年
上年结转		36.28%
中央政府拨款	36.1%	
地方政府拨款	9.74%	0.44%
征收救济基金	34.86%	40.17%
各界自愿捐助	6.62%	0.18%
其他收入	12.7%	22.94%
总计	100%	100%

(注:(1)其他收入包括:存款利息、工会拨款。救济粮变价收入、修建工程收入、救济实物变价收入、生产自救贷款收回、追回贪污款等。(2)1950年统计不含广东、湖北两省。)

从救济方式来看,在缓解失业人员生活困难的同时,注重提高其就业或转业的能力。救济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以工代

赈。即失业人员在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下通过参加劳动获取赈济。国家规定,来自救济基金的工程费,80%以上必须用于工资。以工代赈工作,主要是一些市政建设和修筑堤坝公路、铁路路基等简单体力劳动;(2)生产自救。即对一些具有专门技能而处于失业或歇业的工人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资金或其他帮助,使其得以继续从事生产经营,维持生活。(3)转业训练。即由政府有关部门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吸收失业人员参加训练,提高就业能力。培训期间发给生活费。(4)还乡生产。对离乡不久或有条件返回农村从事生产的失业人员,提供旅费和一些安家费,帮助其还乡从事农业生产。(5)发放失业救济金。即对没有机会和能力获得以上办法而生活又确实困难的失业人员,政府发给一定数量的救济金。1950年和1951年失业救济基金按使用方式支出情况如下:

使用方式	1950年	1951年
以工代赈	53.62%	37.48%
转业训练	4.1%	12.99%
生产自救	2.75%	5.3%
还乡生产	12.24%	1.05%
发放救济金	14.03%	9.2%
机关经费	1.2%	4.5%
其他支出	12.06%	29.47%
总计	100%	100%

(注:(1)其他支出包括:折损、粮食变价支出、工人福利费、粮种变换损失、医药补助费、丧葬费、粮食搬运费等。(2)1950年的统计不含广东、湖北两省。)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50年7月至1953年底,以工代赈达280余万人次,生产自救者达15万余人,参加转业训练的15万人,还乡生产者14万余人,领取失业救济金者460余万人次。

在就业方面,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劳资两利的前提下,采取了统一介绍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努力扩大就业,减少失业人口。

在建国初期,国营企事业单位基本上不存在因生产或效益变化而解雇固定职工的现象。对于数量众多的私营企业,党和政府则在劳资两利的前提下,限制企业主随意解雇职工。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规定,凡企业因生产经营变化而导致人员多余时,应先从改善经营或减薪等方面想办法。“五反”运动期间,不少地方甚至规定私营企业主不得解雇职工。

为了更好地安置失业人员、调剂地区间劳动力的余缺,人民政府的劳动部门自1950年5月开始办理失业人员登记及为其介绍工作事宜。1950年5月至6月,政务院及中央劳动部先后颁布了《市劳动介绍所组织通则》、《省、市劳动局暂行组织通则》、《失业技术员工登记介绍办法》等法规办法,要求凡国营企事业单位和私营企业招工,应先通过当地劳动介绍所,从失业登记人员中挑选,只有在无合适人选时,方可自行招雇,并须到当地劳动部门备案。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一方面救济失业人员、积极介绍其重新就业,另一方面,由于私营和个体经济在城市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实际上也鼓励失业人员自找门路、自行就业。1950年的调整工商业,1952年“五反”后调整劳资关系、师徒关系、商业等,都与缓解城市失业问题有直接关系。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和政府实施了扩大就业政策,城市失业率迅速下降。到1951年底,失业工人重新就

业者已达 120 余万人，其中国营企业吸收约 60 万人；失业知识分子经过各种训练、招聘以及个别安置参加工作约 100 万人；凡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失业人员大多数都解决了就业问题。

### 三、1952 年劳动就业问题会议的 决策及其调整

1952 年初，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导致了市场暂时萧条和部分私营企业歇业关门，由此造成 1952 年上半年城市失业人数骤增，据估计，1952 年 4 月全国失业人口比 1951 年底增加 1.5 倍，达到 150 万人，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失业高峰。

在上述情况下，许多失业人员直接给中央或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并要求解决就业问题。从 1952 年 1 月至 4 月，仅毛泽东就收到 800 封这方面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在阅读了中办秘书室关于上述来信的报告后，感到失业问题严重，于是委托周恩来专门召开一次讨论解决失业问题的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解决办法。6 月 25 日，毛泽东又将失业旧军官费帖的来信批转周恩来，希望会议注意旧军官的失业问题。

1952 年 7 月 2 日至 19 日，政务院召开了劳动就业问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有关部门以及人民团体代表 131 人。会议在听取了各大区、各大城市代表关于失业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汇报后，即分为失业工人问题、失业知识分子问题、失业旧军官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社会救济问题 5 个小组进行研究讨论，提出解决办法。会议期间，周恩来、李富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关于就业问题，会议提出了由国家统筹安排的“统一介绍”方



针,并针对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以及农村劳动力大量富余和涌向城市的问题,还提出应逐步实现对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会议认为:“应从努力发展生产,发展各种建设事业,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积极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必须改变在人民政府成立初期对失业人员不得不采用的偏重救济的方针及某些企业和机关过去用人标准过高的偏向,特别是必须认真切实地解决现有失业人员在绝大多数并不合乎当前需要标准的矛盾,而对于各种失业人员均应采取广泛吸收,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他们施以各种训练,加强对于他们的政治思想改造,提高其业务能力,然后统一分配就业,使一切潜在的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sup>①</sup>

根据上述就业方针,会议起草了《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7月25日政务院146次政务会议通过)。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为:对城市中的失业无业人员全部进行登记,并对其进行有计划的就业训练和转业训练,然后由国家统一调配,分期分批地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决定》还指出: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应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就地解决,设法不使其流向城市。这次会议由于对解决失业问题估计过于乐观,因而从思想上改变了过去三年里实行的政府劳动部门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扩大就业与社会救济相结合的方针,以为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政府可以几年内消灭失业,因此决定由政府劳动部门对全国城市失业无业人员实行统一登记,然后进行有计划的培训或介绍工作。

1952年8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和《关

---

<sup>①</sup> 安子文:《关于召开劳动就业问题会议情况的报告》(1952年7月25日)。

于失业人员统一登记办法》，失业无业人员欢欣鼓舞，踊跃报名登记。从9月开始登记到年底，仅3个多月的时间，全面登记工作即基本结束。根据就业登记统计，全国登记总人数为162.2万余人，其中失业工人77.98万人，占登记总数的48.87%；家庭妇女、失学青年43.8万人，占登记总数的27%；小商业主、行商、摊贩等10.9万人，占6.72%；失业知识分子10.4万人，占6.46%；城市贫民、妓女、乞丐等15万人，僧尼道士0.57万人，共占9.64%；旧军官、旧官吏3.4万人占2.11%。上述登记就业的人，大部分无专业无一技之长，就业能力较差。这给政府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工作造成困难。除非国营修理事业单位不惜人浮于事、降低招雇标准，以牺牲效益来接纳这些人。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and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城市不断产生新的失业待业人员。

由于登记就业的人员大部分就业能力较低，因此“统一介绍就业”就与国营企事业单位及私营企业的用人标准和灵活性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大多仍是自行招雇，而政府劳动部门与国营企事业单位相互之间则意见很大，前者怨后者用人标准过高，后者则怪前者不能满足其要求。另外，“统一介绍就业”也使失业无业人员对政府期望值过高，存在依赖心理，反过来又对不能很快就业产生怨言，上述这些问题搞得地方政府很被动。

对于上述问题，陈云、薄一波在12月5日给上海市委的复信中曾提出：“失业问题与经济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目前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即不能用经济建设去迁就解决失业问题。”<sup>①</sup>

1953年5月，针对劳动就业工作中的上述问题，政务院劳动

---

<sup>①</sup>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176页。

就业委员会、劳动部、内务部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议提出：城市就业问题不要由国家包下来，应该实行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失业无业人员自找职业、自谋生活出路。8月5日，上述三个部门联名将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报告中央。报告提出：劳动力调配工作，是为生产服务，介绍就业应服从生产利益，不应将不适合条件的失业人员介绍到工厂企业中。为保障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统一调配，是必要的。但在目前情况下，实行无所不包的统一调配办法是过早的，在实际上限制了公私企业机关用人的方便，缩小了自行就业的门路。因此，为了使失业无业人员获得更多的自行就业机会，应适当缩小统一调配的范围。8月中旬，中共中央批转上述报告，要求各地改行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失业无业人员自找门路，自行就业，并对上述就业方针的变化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于是从8月份起，各地开始贯彻新的就业方针，并取得较好效果。例如南京市自贯彻新方针后，8月份至10月份自谋职业者即占同期就业人数的60%左右；广州市1953年7至9三个月自行就业的失业人员达3000多人，与同期经政府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的人数相等，天津市1954年第一季度失业工人就业者为6000多人，其中自行就业者约占一半。1954年1月，全国自行就业者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3%，政府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者约67%。据1953年至1954年初各地反映，新就业政策不仅扩大了就业，也受到政府劳动部门、用人单位、失业无业人员三个方面的一致拥护。1954年4月，全国失业救济工作会议肯定并要求继续贯彻这个就业方针。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就劳动就业工作中的上述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加上半失业的人数



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sup>①</sup>

另外，1953年4月，政务院及其下属有关部门发出一系列劝止及处理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在8月份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应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来就地解决，不要流向城市。

#### 四、几点启示

建国初期党关于就业和失业救济方面的决策，总得来说是正确的，实施也是成功的。党的上述方针政策，不仅当时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今天解放就业问题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1、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失业现象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因此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失业救济问题。

2、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对职工实行“包下来”的办法，只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暂时办法，它既不是党的基本经济政策，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效率原则。

3、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应长期坚持的基本就业方针。为此，应大力培育劳动力市场，并加强政府对劳

---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48页。



动力市场及劳动中介机构的管理。

4、失业救济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大事，应动员和鼓励全体人民关心和参与此事。

#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传略

谢 敏

**编者按：**为纪念新疆三区革命 50 周年。现特发表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两人的传略，以志纪念。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1914 年 4 月 14 日出生在新疆伊宁县一个维吾尔族小手工业者家里。其父纳迪尔·麻合木提以做皮靴、木匠等活路养家。虽生计艰难、生活困苦，但性格豁达乐观，常用都达尔弹唱人间的不平和忧愁。1921 年冬，纳迪尔到绥定（今霍城县）弹唱时，被地主差使的恶棍打死。不久，阿合买提江的姐姐也因病无钱医治而早亡。于是，阿合买提江和母亲不得不去投靠在霍尔果斯小学当教员的舅舅，并在这所小学就读。过了几年，他随舅舅迁往苏联叶尔肯特城，改随舅舅的姓，进入孤儿学校求学，小学毕业后，考入阿拉木图的一所中等学校。阿合买提江努力学习，勤奋钻研，成绩优异。

1932 年，阿合买提江毕业后，在准备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求学时，舅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流放。为此，他不但未能升学，而且失业两年。在此期间，他靠打零工维持生活。1934 年，经人介绍，他到纳曼干市一所小学当教员。1 年后，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得到学校信任，被推荐到高等学院学习。1936 年夏，他考入莫斯科东

方社会主义者劳动大学。在这期间,他受到马列主义思想教育,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到工厂、农庄参观实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给了他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2年6月,阿合买提江返回祖国,经塔城回到伊宁,住在叔叔纳斯尔·麻合木提家。初时,在城里做玻璃工、搬运工、木匠活,他常常向周围的劳苦群众讲述苏联十月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鼓励人民为推翻黑暗统治,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

阿合买提江宣传革命的行动,引起了伊宁警察局的注意,并派人跟踪。1943年12月他被捕入狱,在伊宁监狱关押了3个月后,押解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第二监狱。

在窄小、潮湿、阴暗的牢房里,他只能吃到发霉的高粱馍,还不断受到审讯、拷打,但是,他没有退缩和屈服,并抓紧机会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汉语。直到1944年10月12日才被释放。

1944年9月,巩哈县(今尼勒克县)广大农牧民不堪忍受当局征收大批军马的沉重负担,在法提赫、艾克拜尔、艾尼等人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成立了游击队,举行武装暴动。消息传开,伊犁地区各县人民深受鼓舞,群起响应,纷纷参加游击队,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斗争烈火越烧越旺。阿合买提江出狱回到伊宁,就参加了游击队,投入解放伊宁的战斗。

11月7日晨,游击队由法提赫、艾尼等人率领,分西南、东南、北面3路向伊宁进发,在城内阿巴索夫率领的游击队配合下,攻克警察局、伊犁行署专员公署,攻占了国民党军政指挥部。经过23天的激战,于1945年1月31日解放伊宁,控制了伊犁地区的通道。2月23日,伊犁地区除精河外的12个县,全被游击队占领。

伊宁起义的第5天,即1944年11月12日,“东土耳其斯坦

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以下简称“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伊始,革命的部分领导权掌握在一些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手中。在临时政府中,虽然也有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代表,但力量薄弱,无法左右局势,尽管如此,阿合买提江还是坚决反对混淆国民党统治阶级与普通汉族百姓的界线及不分敌我地打击和枪杀自己的朋友的错误行为。在他后期的著作中,曾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个错误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当时阿合买提江等革命者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要尽力限制起义阵营内部封建宗教上层力量破坏性的影响。

为了加强思想教育,使各族人民群众明确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阿合买提江主动抓了宣传工作。他和阿巴索夫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一起,整顿报社、出版报纸,并积极撰写文章,以阿·伊犁勒克的笔名发表。他在文章中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号召人民群众更高地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英勇斗争,奋勇前进。随后,阿合买提江担任临时政府办公室秘书,负责处理政府内部的事务工作。1945年1月7日成立了军事局,1月12日任命阿合买提江为军事科长,负责军事动员和后勤保障工作。1945年4月8日,游击队举行了隆重仪式,宣告民族军成立。1945年6月,阿合买提江被选为临时政府委员,参与政府的领导工作。9月,授予上校军衔职务。同年10月,临时政府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阿合买提江又担任了由5人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接着,临时政府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平谈判,阿合买提江担任了谈判代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三区终于形成了以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等为主的领导核心,使三区革命逐步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抗战胜利后,三区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伊犁、塔



城、阿山三区已全部解放。9月，民族军中线部队直抵玛纳斯河西岸。国民党守军烧毁了玛纳斯河大桥，形成与民族军隔河对峙的局面。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新疆省主席吴忠信面对失败的形势迭电重庆求援，疾呼蒋介石派大员解决新疆问题。

在国内外和平舆论的压力和民族军的强大军事攻势下，蒋介石发表了广播讲话，同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并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来迪化和三区代表谈判。

三区方面为了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委派赖希木江·沙比里、阿不都哈衣尔·吐热、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组成谈判代表团。

根据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总领事萨维列夫出面调停，双方于10月17日开始谈判。历时8月的谈判，经过反复磋商，签订“十一项和平条款”及两个附件。

“十一项和平条款”的签订是三区革命的重大成果，也是以阿合买提江为代表的民族民主力量在政治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它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了各族人民的政治、民主、自主、平等等项权利；成立了有三区和七区代表参加的省联合政府；按条款规定，各县要实行人民普选；释放了“政治犯”；暂时停止了双方的武装冲突，打通了三区与七区人民之间政治与经济上的往来，扩大了三区革命在全疆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和平条款签订之后，阿合买提江立即返回伊宁，召集政府、军队、各族各界代表开会，汇报谈判的情况，传达“条款”的主要精神，动员大家拥护条款，实施条款。

1946年6月8日，他召集政府成员和机关领导人，对执行和平条款作了专门布置，他特别强调要落实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整编部队,对超编的作退役处理,并发给安家费。(2)恢复交通运输,玛纳斯河以西的公路、桥梁如有损坏,由工兵部队尽快修复。(3)6月10日—26日双方开释犯人,遣送俘虏。(4)卫生厅和军队医院的药品应尽快移交药房。(5)各机关应尽快制订有关组织工作手册。(6)财政厅尽快完成遣送难民回籍的工作。安排完上述工作后,阿合买提江鼓励“全体工作人员要再接再厉,更加巩固相互间的团结,为取得辉煌成绩而作出努力。”

6月27日,临时政府作出第324号决议,正式取消“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成立了伊犁、塔城、阿山专署,调整了政府机构。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名义出版的报纸也从6月28日起改为专署机关报。

同时,新疆省政府也遵照条款的精神进行了改组。张治中兼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作为三区代表担任省政府副主席,包尔汉作为七区代表担任省政府副主席。

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省府委员同时宣誓就职,国民党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由南京飞到迪化监誓。久经战乱的新疆人民,对于这个新的省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这天,上万人聚集在迪化市广场上,热烈庆祝新疆全境实现和平和省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阿合买提江先后讲话。他们强调新疆的400万各族民众的团结,号召军民一致努力保障全省和平,增进中苏亲善,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

随着和平条款的签订和省联合政府的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已不复存在。但是,还有人在散布分裂、独立的谬论。阿合买提江挺身而出,一一予以驳斥。8月22日,在省府召开的座谈会上,阿合买提江说:“东土耳其斯坦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不能严肃地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作政治活动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

8月28日,张治中在迪化市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民政厅厅长王曾善等人的陪同下抵达伊宁,受到先行到达伊宁的阿合买提江及伊犁地区各界领导人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热忱欢迎和盛情款待。9月3日,阿合买提江陪同张治中、屈武及刘泽荣一同乘汽车巡视新二台及霍尔果斯。一路上相互交谈,无拘无束。阿合买提江讲述了他痛苦的童年及后来求学的坎坷经历。每到发生过武装暴动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介绍当时的情况以及他和阿巴索夫等,冒着危险保护汉族群众的情景,给张治中、刘泽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合买提江真诚地希望实施和平条款,给各族人民带来福音。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执行和平条款、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上,为宣传、执行和平条款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检查条款执行的情况,会见各地的来访者。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新疆产生18名代表,三区占7名。11月11日上午10时许,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及工作人员等40余人乘飞机离开迪化,经上海于16日抵达南京。会议期间,蒋介石亲自接见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人,还特意让蒋经国陪同参观游览以示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的重视、怀柔;但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不为所动。

1946年下半年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命令”,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挑起大规模内战。新疆国民党当局与之遥相呼应,违背各族人民要求和平的意愿,破坏和平条款的实施。

1947年1月中旬,阿合买提江一行从南京返回迪化。国民党方面破坏和平条款的行为接连发生,严重影响了新疆刚刚安定的局面。阿合买提江得知这些情况后十分愤慨,向省政府提出严重



抗议,要求结束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并给他们应有的制裁,但是却毫无结果。张治中当时虽然努力于新疆的和平,但他却无法制止国民党中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民主选举遭到粗暴的践踏,激起全疆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迪化、伊犁以及南疆各地,不断有群众游行示威,抗议破坏和平条款的罪行。

1947年8月初,阿合买提江安排阿巴索夫、赛福鼎、安尼瓦尔·汗巴巴等先行返回伊宁。与此同时,南疆广大地区的革命青年和迪化的许多进步人士、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到伊宁市。特别是李泰玉、陈锡华、何锐、范印中等一批汉族青年知识分子奔赴伊宁参加三区革命的举动,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迪化的维吾尔、塔塔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各族文化促进会会长,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报的部分编辑也都先后到了伊宁。肉孜节前夕,阿合买提江和夫人玛依努尔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到伊宁。

阿合买提江回到伊宁后,仍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指导三区工作。为了商讨建设三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1947年10月初,他主持了高级干部会议。确定:要整顿军队,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以实现巩固三区革命根据地,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伟大目标;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达到自给自足,改善人民生活;继续清除泛伊斯兰主义的流毒,调整革命力量诸方面的关系,彻底纠正民族关系上所发生的错误,加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阿合买提江热爱各族人民,关心他们的疾苦,致力于三区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三区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连续几年的武装斗争,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经济十分困难。阿合买提江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亲自过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他主持成立了财经委员会,在各级经济部门中都配备了有能力、忠于民主制度的干部,并严格要求他们厉行节约,坚持财务制度,办事公道,为政清廉;整顿金融,建立预决算制度;取消不合理的捐税,减轻人民负担;给农民发放贷款、蚕种、粮种,调整农产品价格,鼓励发展农业;禁止宰杀母畜,预防绵羊蠕虫病,培育良种,促进牧业发展;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重点扶持由于乌斯满匪帮的掠夺,财政十分困难的阿山地区;恢复同苏联的通商贸易等等。

阿合买提江和他的战友,带领全体三区人民,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农牧业生产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财政完成了各项预算指标,收入增加,达到了自给自足,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为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利建设、邮电通讯等事业提供了资金。

1948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巨大转变,极大地鼓舞了三区人民。在此形势下,为了维护新疆局势的稳定,团结各族进步民主人士,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独裁统治,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

1948年8月1日,在阿合买提江的主持下,一部分进步人士、民主知识分子、科学界、教育界和革命青年团的领导人在伊宁市隆重集会,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新盟”),推选中央委员35人,候补委员5人,并组成中央组织委员会。阿合买提江担任“新盟”主席,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成为“新盟”的领导核心。

阿合买提江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新盟”领导成员组成了中心学习小组,定期进行学习。他要求三区干部学习和深刻理解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真正的革命还在前面,疾风知劲草的

时刻就要到来了，你们要作好准备。要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在革命运动中，只有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战士才能完成前线的战斗任务。他反对政府机关中，有的人吃喝玩乐，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倡干部要成为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公仆。1949年7月6日，阿合买提江在伊宁的负责人员会议上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出4条要求：(1)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工作效率；(2)反对贪污，提倡清廉；(3)法院要独立，依法办事；(4)注意民族问题，树立正确的马列主义民族观。

三区革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新疆解放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走上领导岗位，一大批人成为各项事业的骨干力量，为新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合买提江在《我们的民族解放革命与同盟》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文章说：“民族主义绝不能组织各民族力量，它只能点燃各民族之间仇恨的火焰。”“那种认为除民主道路之外，还有其它道路可以发展民族解放革命胜利的人，决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朋友。”“民族主义同民主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或者为了本民族的解放，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斗争，或者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同帝国主义站在一条战线上，为了维护殖民主义，保住套在本民族颈上的锁链而斗争。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可行。如果我们的同盟要领导全省的民族解放革命，就必须同民族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他满怀激情地号召“新盟”成员“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忠实而勇敢地拨开历代笼罩在我省上空的乌云，拯救被统治的人民，砸碎奴隶的锁链，建立平等、幸福的生活。”这些见解充分表明阿合买提江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and 正确的民族观。

这个时期，阿合买提江除了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外，还常在各种形式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的许多发言、报告多次谈到民族问题，教育干部和群众贯彻执行“新盟”制定的民族政策。他每天除了收听新华社的消息，还收听苏联广播，阅读《真理报》，关心世界各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结合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形势以及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广泛地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斗争策略以及取得胜利的伟大意义，鼓励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获得彻底解放而斗争。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都捷报频传，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新疆各族人民获得彻底解放已为期不远，这个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着阿合买提江。

1949年1月初，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赴苏联莫斯科同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商谈国事，邓力群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

当时，英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正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企图策划“五马”<sup>①</sup>势力撤至新疆，利用宗教旗帜搞回教国。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决定加快解放新疆的步伐，遂派邓力群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到新疆伊犁进行联络。

8月10日，邓力群带3名工作人员并携带电台从莫斯科出发，取道阿拉木图，于14日到达伊宁。经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介绍，与三区领导人会晤。8月17日，邓力群第一次会见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和阿巴索夫，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依照指示，说明此行的任务是和这里的领导取得联系，把新疆的政治、经济、

---

<sup>①</sup> “五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



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情况，系统地报告中央，请他们给予帮助。阿合买提江和伊斯哈克伯克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心地处边疆的新疆各族人民，派人来联络，非常高兴，表示要尽力协助邓力群完成任务。随即，在伊斯哈克伯克家里设立了“力群电台”，与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

同日，党中央给邓力群发来电报，要他以中共中央名义，邀请新疆派遣5名代表出席9月10日左右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希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均有人来，并有一位汉人同来作翻译。当晚邓力群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阿合买提江，并连夜共同研究了代表人选、动身日期、行走路线、经过苏联境内的供给等问题。代表团确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和迪化“战斗社”负责人、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的罗志组成。由于当时新疆与北平之间还隔着国民党马家军阀和胡宗南部队的控制区，所以决定乘汽车由霍尔果斯出境抵阿拉木图，转乘苏联飞机从黑龙江省的边境城市满洲里入境，再乘火车前往北平。

这时，阿合买提江积极安排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还布置将准备向党中央汇报的有关材料翻译成汉文。

8月18日，邓力群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阿合买提江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

阿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



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主任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北平

阿合买提江看了毛主席的信激动得夜不能寐,连夜召请他的亲密战友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赛福鼎、艾斯海提、赛甫拉也夫等人共同分享胜利的欢乐,他们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阿合买提江说:“黎明已经开始,曙光很快就要照临天山南北,我们为之奋斗多年的宏伟理想就要实现了!”

他们连夜给毛主席写了电稿,同意派代表去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阿合买提江给毛主席的复电如下:

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来信已悉。蒙您向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很久以来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感谢和振奋,并派代

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

谨此电达

特区人民代表 阿合买提江

8月20日 伊犁

复电发出后,阿合买提江一边交代安排政府的工作,一边抓紧时间 and 邓力群同志谈话,向他汇报三区革命的发展、初期的错误、领导核心的政治态度、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还谈了他本人的思想认识,希望得到党中央的帮助和指导。

阿合买提江谈到三区初期的错误时,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他说:“我们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环境中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还不能同时向外部的国民党和内部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我们只有把国民党与人民的斗争放在主要地位,把内部人民和封建势力的斗争放在次要地位,才能应付这个艰难的局面。当我们面前站着强大的敌人时,我们不应当脱离我们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为了反对当前强大的敌人,反而应当更密切我们和同盟者的关系,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在人民中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服从这个口号,我们只有遵守这个口号,才能动员最大多数的人们来和国民党做斗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忆过去的历史时,容易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初期运动的缺点。”

邓力群性格豪放,平易近人,阿合买提江畅所欲言,一片真诚,两人谈得十分投机。邓力群通过电报,向中央汇报了阿合买提江反映的情况。

阿合买提江向中共中央代表倾吐了肺腑之言,心情格外愉快,按照民族风俗为中央准备了许多礼品。1949年8月22日下

午，他带着警卫员乌斯曼江乘汽车到伊宁西部的巴彦岱民族军军官学校，同其他代表汇合，下午7时，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代表团在浓浓的夜色中分乘几辆汽车，怀着胜利的喜悦，带着炽热的希望出发了。

代表团临行之前，经研究决定三区政治方面由赛福鼎负责。赛福鼎一边繁忙地处理公务，一边急切地盼望北平的好消息，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传来的却是噩耗。

9月3日，苏联领事馆打电话请赛福鼎去一趟，说有要事相告。赛福鼎到领事馆后，领事免去往常的寒暄，拿起一份电报，语气沉痛地说：“我们收到莫斯科一份急电。”接着，他用俄语开始宣读电文：“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为首的代表团所搭乘的飞机，途经伊尔库次克市，飞抵外贝加尔山附近时，由于气候恶劣，不幸撞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除阿合买提江等5位代表外，代表团工作人员艾尼·克里莫夫、阿不都热西提·伊敏诺夫、乌斯曼江·纳斯尔也同机遇难，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听到这个噩耗，赛福鼎失去控制地跃然而起，从领事手里几乎夺过了那份电文，飞快地默读。他看完电报强忍悲痛，急忙离开领事馆，驱车来到邓力群下榻处，报告这个噩耗。邓力群听到突如其来的消息沉痛地说：“不幸的消息，真是太不幸了！”

邓力群随即向中央报告了这个消息，等候中央的指示。

当晚，收到中央的回电。回电对阿合买提江等同志的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要求立即组成新的3人代表团，赶赴北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经过研究，由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3人组成代表团，出席新政协会议。

代表团到北平的第三天（即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接见了他们，当时在座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他们共同为牺牲的烈士致哀。毛泽东主席说：“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

新疆代表团全体成员，不幸牺牲，不仅是新疆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sup>①</sup>

1950年初，赛福鼎随同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苏联政府通知，烈士们的遗体已经从山区运出并作了整形处理。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运回新疆去，他们的遗体应在新疆安葬。要为他们修建陵墓。要让新疆人民永远怀念为他们而牺牲的英雄！”3月15日，他们的遗体从苏联运回伊宁安葬。

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他们的光辉业绩永垂青史。人民永远怀念他们，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每逢他们殉难的忌日，自治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1959年，在他们殉难10周年的时候，自治区成立了纪念阿合买提江等革命烈士逝世10周年筹委会，筹备有关纪念事宜。自治区党委和省人民委员会还决定在伊宁市修建永久性的坟墓和纪念碑。新陵园座落在环境优美、游人众多的人民公园，烈士墓前高9米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毛主席的题词“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

<sup>①</sup> 赛福鼎：《为了光明的明天》（《人民日报》1984年8月27日）。



#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传略

孟宪典 谢 敏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维吾尔族，祖籍新疆阿图什。从祖父起，全家侨居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城。1921年9月，阿巴索夫就出生在那里。父亲阿西木，在那里担任侨总，负责当地的华侨事务。他常常往来于新疆和前苏联中亚一带，做一些侨务工作和从事商贸活动。1927年春，阿巴索夫和弟弟阿不力米提一起，随母亲哈西汗回国定居。初时，住在绥定（今霍城）县龙努斯琼舅舅的家里。1928年，父兄相继归国，定居乌什县。阿巴索夫和母亲留下来，阿巴索夫在伊宁县玉赛音小学就读。由于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小学学业。

阿巴索夫少年有志。他远不满足于自己所受的初级教育。1935年小学毕业后，前往南疆乌什县看望久别的亲人。在乌什居住的短短的几个月中，他多次向父亲提出，要到当时文化比较发达的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去读中学。他的父亲在侨居苏联期间，曾受到苏联革命思想的影响，也希望儿子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阿巴索夫的愿望得到父亲的支持。

1936年8月上旬，阿巴索夫到达迪化，在省立二中（俄罗斯中学）就读。四五个月后，转入省立一中民族二班，他学习非常勤奋，他的寄宿处距离学校2公里多路，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1935年以后,联共党员王寿成(即俞秀松)任省立一中校长(兼新疆学院院长、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省立一中实行了新的办学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结合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教唱抗战歌曲,联络新疆学院、迪化女中等学校,共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文艺活动。一方面教育各族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激发老师和青少年的爱国抗日热情。”阿巴索夫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他活泼善良的性格,聪慧敏捷的天赋得到了发展。

1938年夏,阿巴索夫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在省立一中的学习生活,考入新疆学院附属民族高中班。这个时期,正是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走亲苏联共道路,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的进步时期。1937年5月以后,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继而又邀请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到新疆工作。文化教育战线也派去了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干部。1938年9月阿巴索夫考入新疆学院高中班时,新疆学院院长是孟一鸣(中共党员,原名徐梦秋,后在盛世才狱中叛变),教务长是林基路(中共党员)。一批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如祁天民、杨梅生、许亮、郭慎先、李志梁(1938年4月8日任省立一中校长)等均在该院任教。1939年1月杜重远担任院长后,又从内地聘请了茅盾、张仲实、史枚、高韬、涂治等一批爱国进步学者、教授在学校任教。他们运用延安的办学方针,进行彻底的教学改革,使学校出现了蓬勃的革命活力。“团结、紧张、质朴、活泼”八字校训,书写在学校洁白的墙壁上。林基路等不少共产党人、进步学者,都亲自登台讲课,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大义,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政治经济学》、《新哲学》、《中国近代史》、《世界革命史》等课程。辅导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引导学生大

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革命新话剧，让学生走上街头，走上社会，作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年轻的阿巴索夫，在人生的黄金时代，沐浴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思想的阳光雨露，在社会政治潮流的推动下，逐渐成长起来。

有一次林基路教务长讲完政治课要离开教室之前，阿巴索夫贸然地起立大声问道：“林老师，我有个问题！”林基路抬头认真地问：“是个什么问题？”阿巴索夫急切地说：“林教务长，‘六大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共产主义吗？也是消灭阶级吗？”负责授课翻译的阿不都拜克用汉语译过以后，林基路沉思片刻，和善地对阿巴索夫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已经下课了，今天晚上自习时我在办公室等你，我尽量回答你的问题。”

这天晚上，阿巴索夫和翻译如约而至，林基路不仅解答了阿巴索夫提出的许多问题，而且给他讲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民族学说、国家学说以及什么是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等问题。谈话结束后，林基路还给他推荐了几本马列著作让他阅读。从此以后，阿巴索夫不仅常找林老师求教、借书、学习汉语，而且把他视为大哥，无话不谈，经常探讨和辩论各方面的问题。在学院的这段时间，他接触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初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学习了革命理论。特别是林基路等共产党人为革命、为新疆人民忘我工作的优秀品质、博大的胸怀、渊博的知识，都铭刻在阿巴索夫的心里。1939年初，他参加了由共产党人参与领导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成为一名反帝爱国战士。阿巴索夫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动员人民募捐，演出革命话剧，教唱救亡歌曲，还在扫盲识字班当教员，在各族群众中曾产生过一些影响。

这一时期盛世才一方面伪善地实行进步的“六大政策”；另一

方面，又对爱国进步思想和进步势力进行多方面的限制和打击，不断制造“阴谋暴动案”和“间谍案”，无故杀戮，遍地冤狱。处在这种复杂政治风云中的阿巴索夫，有些迷惘。就在这时，南疆发生了麻木提、马虎山之乱。叛乱平息以后，盛世才借此制造假案，铲除政敌。阿巴索夫的父亲阿西木也被捕入狱，不久死于狱中。这对阿巴索夫是一次沉痛打击。

1939年5月，阿巴索夫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以“叛逆子女”，被流放到沙湾县。

沙湾县距迪化西北180公里，是准噶尔盆地南缘的一片绿洲。和阿巴索夫同时被流放的，有新疆学院本科生、预科生，还有一部分中学生和师范学生。有汉族，也有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

阿巴索夫被安置在沙湾县一所小学当教员。学校只有三十四名学生，农忙时又是半日制，这对于精力旺盛的阿巴索夫来说，教学只占用他一部分精力。于是，他就利用剩余的时间，刻苦地学习汉族语言文字。由于在迪化上学时，汉语、汉文就有了一些基础，经过近一年的刻苦学习，他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且能够用汉文书写信件，阅读书籍。

掌握汉语汉文之后，他还自学了俄语。在那寒冷的冬夜和炎夏，他在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克服困难，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理论。在这两年多的光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革命著作。主要有：《联共（布）党史》、《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列宁主义问题》，还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列宁传》、《斯大林传》等。这些书籍充实了他的知识和理论，使他成为一名有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的青年。

1942年初，阿巴索夫结束了两年多的流放生活，来到北疆经济文化发达的伊宁。先后在伊犁行政公署任教育局督学、翻译，兼



任伊宁女子中学的教员。在这段时间,阿巴索夫利用自己优越的工作条件,广泛接触社会和各个阶层的人民,深入进行社会调查,对盛世才“六大政策”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盛世才横征暴敛、残酷统治各族人民的罪行,有了较深的体验。1943年以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新疆,伊犁地区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一天比一天激化。阿巴索夫的思想已经开始孕育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决心把这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开始谨慎地物色先进分子,联络志同道合之士。1943年初,他在伊宁女中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小组有阿巴索夫、杨凤仪等人,他们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丰富革命理论,讨论中国革命之现状,探讨新疆革命之前途,寻求新疆革命的方略。

1942年,国内外形势急剧恶化,盛世才公开背叛“六大政策”,投靠了蒋介石。1943年1月,国民党在新疆建立省党部,派驻大批军队,逐渐控制了新疆的军政大权;美英帝国主义势力也入侵新疆,在迪化等地设立了领事馆。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经济上增加苛捐杂税,使各族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随着阿巴索夫等人和其他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以及他们在伊犁各地的宣传和影响,伊犁地区的民主进步势力日渐发展,反对国民党的呼声日益高涨。加上苏联对新疆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支持,使新疆人民,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热情更加高涨起来。

1944年4月9日,阿巴索夫参与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解放社(后通称解放组织),其成员共12人,阿巴索夫为成员之一。

解放组织成立以后,以阿巴索夫为首的一批革命骨干,进行了大量的秘密的暴动准备工作。伊宁、巩哈(今尼勒克)等县的各族农牧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情绪日益高涨。政府当局察觉到

了民族矛盾的激化,为防患于未然,强化了伊犁地区的保安体制,派省警务处少将刘秉德坐镇伊宁。一时,伊宁政治气氛十分紧张。革命组织内部,在坚持斗争还是暂时隐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这种形势下,阿巴索夫毫不畏惧,力主加紧发动群众,尽快举行暴动。但是,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的政治主张一时还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阿巴索夫等人仍然继续坚持斗争。这时国民党军警加紧搜捕革命群众,阿巴索夫也处于反动当局的监视之中。

1944年10月4日,阿巴索夫匆匆告别母亲,给未婚妻杨凤仪留了一封短信,乘着夜幕,渡过霍尔果斯河,进入苏联境内。

1944年9月,伊犁地区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的农牧民,为了反抗盛世才和新疆当局掠夺性的“献马运动”,举行了武装暴动。暴动的领导人是法提赫、艾克拜尔、艾尼等,游击队逐步扩大到1000多人,急风暴雨式的武装斗争开始了。在法提赫、艾克拜尔等人的领导下,游击队很快攻克了巩哈县城。

10月中旬,阿巴索夫率领33名全副武装的人员,驮马20余匹,携带武器弹药从霍城边境莫格尔地区入境,驻扎在霍尔果斯县城西北的大西沟山村。阿巴索夫一入国境,立即派人与巩哈游击队联络,10月中旬阿巴索夫与伊宁解放组织取得了联系。

11月6日,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了军事指挥部,并研究部署了攻取伊宁的作战计划。会议确定:11月7日为攻取伊宁的时间,届时各路游击队将从东、南、西3个方向,向伊宁的国民党驻军发起总攻。

11月7日拂晓,由巩哈游击队组成的3个大队,从伊宁西南、东南、北面3路逼近伊宁。游击队第二大队首先发起进攻;城内,由阿巴索夫指挥的起义者立即配合行动,先占领了行政专员公署西侧的女子中学高楼,控制了专员公署、区警察局、实业公司。

11月12日,伊宁大部解放,解放组织在伊宁维哈柯俱乐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人,只有极少数被列入政府委员。阿巴索夫任政府委员兼内政部长、宣传部长。领导权主要掌握在一些封建、宗教上层人士手中。由于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的分裂主义倾向,参加暴动的农牧民一时分不清汉族中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界线,以致战乱中一些汉族群众遭到了杀害。对于分裂祖国统一和民族问题上的错误,阿巴索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暴动初期他就指出过:“民族问题,应是我们暴动者严重注意的问题。汉族统治阶级和汉族人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我们的敌人,一个是我们的朋友!”

在革命斗争中,阿巴索夫始终如一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他不仅在内部以理斗争,勇敢捍卫汉族百姓的利益,还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为防止部下不听约束,乱中出事,他提议把汉族群众居住较集中的伊宁、霍尔果斯、清水河、芦草沟等地的汉族群众集中起来加以保护,给每个成年汉族居民发了盖有内务部公章、写明“不准伤害”字样的袖章,待社会秩序恢复后即予遣散。他自己还亲自出面,保护了许多汉族百姓。攻克伊宁之后他亲自到柴恒森家,将其全家4口接到自己家中暂避;第二天又把杨风仪一家4口接到家里,加上原先接来的姜盈喜等人,在他家暂避的不下一二十人,所有的屋都已住满。大家同住一室,同吃一锅饭。阿巴索夫沉重地说:“我虽有力挽狂澜之心,但无挽狂澜之力,我不能原谅自己对这种错误的无能为力。不过,请放心吧,这种错误会很快得到纠正的。”

1944年12月,在伊宁县城发生了一起两名游击队基层干部强奸一名汉族姑娘,并抢去其财物的事件。阿巴索夫动用内务部的权力,立即将两人逮捕,未向临时政府报告即召开了公判大会,



下达了执行枪决的命令。阿巴索夫的此举,立即在政府内部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提出罢免他在政府内的全部职务。但是由于阿巴索夫在暴动部队,特别是在青年军人中有很高威望,反动分子也不敢把事情做绝,只撤销了他内务部长职务,保留了宣传部长的职务。但是阿巴索夫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斗争,仍然利用其政府委员的职权,在政府委员会上正式提出了“必须明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动议。他尖锐地指出:“要么我们就干脆称我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解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锡伯族、俄罗斯族人民将作何处理?要么我们就明白不误地阐明,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推翻反动统治,解放各族被压迫人民。但是我要声明,如果谁主张我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解放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我将坚决反对,并且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反对!”在阿巴索夫为首的一些进步委员的坚持下,作出了进一步保护汉族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二个政府决定。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伊宁公开残害汉族百姓的事件大大减少,社会秩序有了好转。

1945年4月8日民族军成立后,阿巴索夫担任政治部主任。7月18日,民族军指挥部命令阿巴索夫和哈斯木江、坎拜尔率部去南线作战。8月8日,南线作战部队不顾连日急行军的疲劳,出奇制胜,迅速向驻守黑英山之国民党部队发起突袭。敌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这些民族军部队消灭了。接着部队向西挺进,于8月16日包围了拜城县。次日,向该县一个连的敌军发起进攻。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敌人除一个排投诚外,余均被歼。阿巴索夫利用战斗间隙,召开干部会议,布置建立革命政权。在他的积极组织下,次日,拜城县革命政权宣布成立。

这时,民族军指挥部命令阿巴索夫率部西进,夺取伊犁至阿克苏的交通要道库尔干山口,解放阿克苏县。阿巴索夫遂率部沿



天山南坡西进。8月21日到达库尔干。占领库尔干,就等于扼住了南北疆交通的大门,对于全疆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部队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当夜向守敌发起进攻。

8月24日凌晨,阿巴索夫率队从库尔干山口西面的阿克恰卡峰向城堡发起进攻。战斗进行激烈,两军相持不下。8月25日,传来库车、阿克苏方面的敌援军再度逼近山口的消息,形势十分紧迫。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勇猛攻击,很快占领了山口制高点。城堡里的机枪疯狂扫射,死死封锁了通道,部队无法前进一步。阿巴索夫身先士卒,夺过一个战士手中的机枪,对准敌人火力点猛射。趁此,部队一冲而上,占领了库尔干城堡,扼守住了这道南北疆交通的大门。

10月11日,阿巴索夫接到指挥部命令:临时政府将与国民党中央代表谈判,游击队撤回伊犁。

阿巴索夫从南线回师伊宁后,更看清了封建宗教上层对革命的危害。为巩固革命成果,他认真地抓了革命队伍的思想教育工作。先后在《自由的东土耳其斯坦报》上发表了《革命者在革命中应抱什么样的态度》、《怎样争取在解放战争中的优势》等3篇署名文章。

1945年11月15日,阿巴索夫在同一些进步青年商量后,决定在三区范围内成立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组织——革命青年团。阿巴索夫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制定了革命青年团组织暂行章程,共5章54条。该组织还出版了《战斗》杂志。组织的宗旨在于宣传马列主义,发动进步青年,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口号是:学习、团结、进步。这个组织的主席是阿巴索夫。青年团中央委员有阿巴索夫、赛福鼎、安尼瓦尔·汗巴巴、扎克洛夫、买买提明·伊敏诺夫、依里克其布哈拉等人。后来赛甫拉也夫出任主席。这是临时政府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设有中央委员

会,专区和县设有工作委员会,区设有支部。青年团组织成立不到1年,成员就达1万多人,其中不少是青年妇女。这对于封建宗教上层来说,是一次勇敢的冲击。因为少数封建、宗教人士曾顽固坚持禁止妇女参加社会活动。青年团组织的“学习”口号,大大激发了各族青年追求知识的欲望。“团结”口号,对于消除民族隔阂起了很大作用。在该组织中,汉族青年和其他民族青年一样,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一起活动,一起学习,一起娱乐。“进步”口号,则鼓舞青年人勇敢地冲击旧的礼教、习俗。而青年团组织的蓬勃发展,对这一组织的成员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在一次会议上,他们酝酿成立一个比青年团组织更严密,具有更高理想和奋斗纲领的革命组织——人民革命党。1945年12月,人民革命党秘密成立,会议选举产生了以阿巴索夫为首的7人中央委员会,阿巴索夫宣读了人民革命党的纲领和章程。通过党章党纲后,中央委员会一致推选阿巴索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研究确定了每个中央委员的工作职责。最后,为了安全和便于开展工作,给每个中央委员都取了化名。阿巴索夫的化名是芮提非。7名中央委员化名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便是LENINQI,译音为“列宁奇”。意为列宁主义者。伊、塔、阿3个专区和各县都设有人民革命党的地方委员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迪化市和其它的7个专区该组织也积极开展工作,建立组织、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展开斗争。

1949年6月6日,临时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达成妥协,完成了最后一批文件的签字。经双方协商,7月1日,新疆联合政府成员在迪化市宣誓就职。张治中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至此,伊、塔、阿三区人民艰苦的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新疆出现了暂时的和平民主局面。三区临时政府随着联合政府的成立宣告结束。

在宣誓就职的日期问题上,张治中先生最先征求阿巴索夫的

意见。阿巴索夫说：“太仓促了恐怕不行，太推迟了也不行，7月1日比较好，不早不迟。”张治中先生很敏感，他当即大为赞同，并拿来作为自己的首倡意见，向伊犁方面正式提了出来，自然得到了阿合买提江等人的同意。事后张治中在接见新闻记者张紫葛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从这件事，窥探到了阿巴索夫这个人的内心秘密——他对中共有感情；换言之，他对华夏有祖国观点；他之所以讨汉族夫人，之所以在暴动中不主张民族仇杀，实有其思想之认识的根源。”当记者感到疑惑不解时，张治中先生单刀直入，一语道破：“你是个什么新闻记者？怎么这个也不知道？7月1日嘛，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嘛！”张治中先生接着说：“这就说明，阿巴索夫心里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中国这个祖国之概念！”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违背“双十协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新疆代表团18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均为代表团成员。

三区革命，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它在革命初期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纠正。下一步该如何发展革命形势，配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这关键时刻，取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将对新疆人民民主革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在迪化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革命组织“新疆共产主义同盟”和在伊宁的地下革命组织“人民革命党”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阿巴索夫决计要去南京开会，借机寻找中国共产党，争取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他们到南京后不久，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宴请阿巴索夫等新疆代表。于先生暗中帮助阿巴索夫找到了八路军的南京办事处。12月5日，阿巴索夫到了梅园新村，走进一座大门，办事处秘书董小鹏同志正等待在那里。他把阿巴索夫领进一间屋子。



这是一个里外屋，外屋是会客室，里屋是办公室兼卧室。阿巴索夫看到，外屋正站着一个人，留着稀疏的长胡须，天庭宽大，印堂发亮，两眼炯炯有神。见阿巴索夫进来，他满面笑容，快步向前和阿巴索夫握手，口里一连说着：“欢迎，欢迎！”童小鹏同志向阿巴索夫介绍说：“这是董必武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会驻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热情地让座。阿巴索夫双手握着董必武同志的大手，激动得热泪盈眶，停了好大会才说出话来：“我终于找到了党中央啦！”董必武同志非常关心新疆的革命情况，询问了伊犁革命的规模、政治、军事斗争现状及三区革命领导成员的情况，还问了张治中赴新谈判的情况等，阿巴索夫一一作了回答。接着阿巴索夫向董必武同志转达了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问候和敬意，转达了人民革命党坚决要求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议，和要求接纳组织领导人入党、派工作人员领导新疆革命，并建立长期联络等建议。末了又代表“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转呈了该盟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件。阿巴索夫激动地说：“能见到您，我感到非常高兴。”并说：“为了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我们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甚至追述到1938年林基路老师对他的教育。董必武同志一直亲切地看着阿巴索夫，注意地倾听他的每一句话。他与阿巴索夫一见如故，态度谦和诚恳，这使阿巴索夫深为感动。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董必武同志强调说：“你谈的情况很重要，对我们了解新疆的现状很有帮助。谢谢你们在新疆的艰苦工作和为新疆革命所做的贡献。”他接着说：“你提出的3条要求都是重大问题。需要向中央报告，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再正式答复你。”

董必武同志非常重视阿巴索夫的这次拜访，12月6日即致电延安向党中央报告。电报简要介绍了阿巴索夫和新疆革命组织的情况，转达了他们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承认和领导他



们的组织、派工作人员到新疆工作等问题。电报最后还介绍说，阿巴索夫曾是林基路的学生，从新疆返回延安的同志中有人知道他。

延安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非常重视董必武同志汇报的情况。收到电报的当日，即由周恩来同志亲笔拟定了复电，经刘少奇同志签发。电文说：

电悉，望向阿同志询明：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他们组织之具体主张；阿同志能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如可以，可派一同志去。

电报最后要求将毛主席著作、党章、少奇报告及其它印发文件交阿巴索夫，并希望阿巴索夫带回新疆译成维吾尔、哈萨克两种文字出版。

1946年12月11日晚，董老在梅园新村再次接见了阿巴索夫，并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电文精神。

董必武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对你所反映的新疆革命情况非常重视，对你们所进行的革命非常关心，已经来电答复。”他说：“第一步和你们人民革命党建立友谊关系，以后视情况再定。你们党应成为领导中心，团结一切进步组织和人民群众，继续你们的斗争。能合并的组织，经过协商合并起来，这样有利于形成力量，更好地斗争。但在组织名称上，考虑到新疆情况的复杂，群众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不宜过早地打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和口号。”“要求中央派代表去新疆，可以考虑，去后其任务只是起个联络员和观察员的作用。”“至于派工作人员去新疆帮助你们工作的问题，目前尚有困难。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比较缺，一时难以派出，等以后根据新疆的政治情况和交通情况再说。”“你们党的11位领导同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我们表示欢迎，具体手续等我们的联络代表去新疆后再请示中央定。”董必武同志接

着说：“至于你提出要一位报务员和电台的问题，中央完全同意，要我和你商量，看你这次能不能有办法把人和电台带去。如能带去，我们就把人和电台交给你。”

阿巴索夫听完董必武同志的话，非常激动，立即表示可以把人和电台带回去。

董必武同志听了很高兴，说：“好。去的同志我们已定，待会你和他见见面。”接着，董必武同志向阿巴索夫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我党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阐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

离开办事处时，已近深夜。童小鹏同志为阿巴索夫引见了将随他带电台去新疆的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干部彭国安（化名王南迪，中共党员）。阿巴索夫紧紧握住彭国安的手说：“欢迎你！咱们将同生死，共患难，一起战斗。”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保护彭国安同志的安全，他们精心研究了彭国安去新疆的方案。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彭国安先住进一家旅馆，临上飞机的那天由阿巴索夫去接，直接拉到机场。在机场的飞机舷梯前，阿巴索夫才向国民党官员和新疆代表介绍说：“这是我妻子的亲戚王南迪。”彭国安和他们一一握手，登上了飞机。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一行于1947年1月14日从南京飞抵迪化，当时阿巴索夫一家住在安尼瓦尔·汗巴巴家院子里，为了安全，他们把彭国安安排在自己卧室里面的一间房子里居住。3月中旬，彭国安赴伊宁。由于伊宁离延安万水千山，路途遥远，电台功率太小，无法同党中央建立起正常联系。1948年“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成立后，阿巴索夫把彭国安安插到“新盟”新闻处工作，彭国安一直在伊宁坚持工作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曾任新疆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阿巴索夫从南京返回迪化后，觉得心胸前所未有的豁亮，信

念更加坚定,工作的方向也更加明确。1月中旬,他将中共中央对新疆问题的答复、对新疆革命的指示、董必武同志两次接见时的讲话,全部向“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作了传达。并把他带回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央有关的报告、文件转赠给大家。1947年2月21日,阿巴索夫在他的住所召集会议,和“同盟”领导人李泰玉、于江志、罗志、陈锡华等共同协商,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伊宁的“人民革命党”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新党。不久,他们召开会议,一个根据我国现阶段民主革命性质而合并组建的新党——民主革命党在迪化成立。它参照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制定出新疆民主革命党章程。会上选出阿巴索夫为民主革命党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为副主席,赛福鼎、伊敏诺夫、赛甫拉也夫、扎克洛夫、安尼瓦尔·汗巴巴、陈锡华、罗志等为委员。并决定从即日起,“同盟”和人民革命党成员一律转为民主革命党党员,秘密开展革命斗争。

阿巴索夫回伊宁后,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和条件要求自己,建设自己所领导的组织——民主革命党,使这个组织更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和先进的思想,为迎接人民解放战争高潮和全国解放的早日到来,做好组织和思想准备。

1947年4月30日,由阿巴索夫亲自主持讨论并拟定的《民主革命党党员应该具备的特点》,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实行。内中规定,民主革命党党员必须做到:一、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二、革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党的秘密;四、坚决遵守和执行党的决议;五、必须联系群众,并在群众中成为模范和先锋队;六、必须学习、再学习。这一文件的实行,对于民主革命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更有力地发挥宣传舆论的战斗作用,阿巴索夫还利用自己在政府内的职务,积极整顿了报纸和新闻宣传机构。明令“禁止



损坏人民革命宗旨和民族团结大局的一切言论在报纸上出现”，要求各报纸要真正成为“体现革命意志的代言人”。在报社工作的彭国安，把从南京带来的电台经过改装后用来收听新闻电讯，主要是收听新华通讯社的电讯稿。他们第一次收记的新闻，是新华通讯社发布的有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以及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新闻和长篇通讯。这些电讯稿，对于远在西北边疆，坚持革命斗争的阿巴索夫来说，真是莫大的喜讯。他们立即在《民主报》上全文发表，这对三区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阿巴索夫更利用各种会议和公开的群众场合，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等，并不遗余力地强调民族团结。他说，三区革命的任务，并非只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要在革命成功后，“将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陷于贫穷、文化上陷于落后的新疆，建设成为政治平等、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省份。”

1948年11月，阿巴索夫和曹达诺夫一起到民族军中线部队视察并宣传全国的革命形势、民族问题和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安集海、乌拉乌苏、石河子、独山子、乌苏等民族军驻地，阿巴索夫挂起了全国地图，在已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土地上，插上了小红旗，向指战员兴奋地讲解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指日可待的大好形势。他说：“全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以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从根本上根除民族压迫，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的。确实，只有人民解放运动取得胜利，中国的民族问题才能彻底的正确的得到解决。民族压迫也将与中国的各种压迫一起而被消灭。”阿巴索夫还指示将《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译成维文。他除亲自讲授外，还在部队开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这本小册子就成了训练班的基本教材。阿巴索夫的讲话简洁明了，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对于三区的干部、军队了解中国共产党，看清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的形势,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宣告成立。阿合买提江任主席,阿巴索夫任中央委员兼新闻处长。在“新盟”积极分子大会上,阿巴索夫以《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题,作了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在帝国主义极端疯狂时期爆发的,它只有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能很快地取得彻底胜利。”“新疆的本地民族,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帮助下,才能很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新疆人民才能得到解放,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正确的解决。”在谈到三区革命的任务和目的时,他明确提出了“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将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陷于贫困,文化上陷于落后的新疆,建设成为政治平等、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省份”。在总结和反思过去的革命斗争时,他说:“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顾及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所以产生了一种将国民党反动派与整个汉族看成一体的错误。”

1949年8月,为了早日解放新疆,中共中央派邓力群同志为联络员,携电台一部从苏联来到伊宁,直接与三区革命领导人联系并指导工作。8月17日,邓力群同志与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和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首次见面,阿巴索夫担任翻译。邓力群同志说明了此行的任务,并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他们出席将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区革命领导人对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维护祖国的统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8月27日,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罗志等5位同志,代表全疆各族人民,为新中国的成立

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幸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山区上空失事，全部殉难。阿巴索夫年仅 28 岁。毛泽东主席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发来了唁电：“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永远纪念。”

阿巴索夫是在中国共产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疆少数民族革命者的杰出的代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追随者。他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闪烁着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光芒的一生。

阿巴索夫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各族人民学习和纪念。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发展大事记(之二)

编写组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具轮廓

(1982.9—1987.10)

### 概述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全面展开。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实践在呼唤伟大理论的指导。而这一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也促使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命运的重大现实课题,积极进行理论上的深刻探索,并且取得了两大突出进展。其一是: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过程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又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其二是:1987年10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政治报告,以我国社会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

立论的根据,着重从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角度,首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概括,将其概括为十二条理论观点,分别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十三大报告并认为这十二条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十三大报告还明确地概括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在六十多年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还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概念。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方面,这一阶段的重大举措是:1984年,我国宣布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上述地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初步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与此同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也由点及面陆续铺开。

## 政 治

### 1982年

**9月12至13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9月13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邓小平在会上就顾问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讲话



指出：“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化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9月24日** 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谈到中国收回香港主权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来解决。这是“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构想的首次公开提出。

**11月24日至12月1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表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11月26日至12月10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听取了彭真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赵紫阳代表国务院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等，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不但彻底纠正了1978年宪法中的缺点，而且内容更加完备，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新内容。叶剑英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大会通过的宪法，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的公布和实施，一定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会议还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和根据这个五年计划制定的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

**12月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省、市、自治区党政

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将于明年展开。明年上半年在省、市、自治区一级和地、市进行，酝酿成熟的地区也可以今年动手，宜早不宜迟，明年下半年进行县以下各级的改革，明冬或1984年春完成。各地要积极准备，统筹安排，提出适合本地区情况的改革方案，报中央、国务院批准。

**12月20日至30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并同代表们亲切交谈。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祝词。王兆国代表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团结全国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程进军》的工作报告。胡耀邦讲话时指出，共青团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全国青年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

## 1983年

**1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指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即：根据十二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围绕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农村工作的中心思想，力争用三五年左右的时间，使广大农民对十二大文件精神 and 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敢于劳动治富，做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基层干部和党员经过整风学习，面貌一新，党风、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

**2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党的十二大制订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纲领，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是我党建党以来最好的一部党章，是新时期党

的建设的纲领。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这两个纲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党员教育的主要内容。《通知》强调,加强党员教育,是提高党员素质、提高党组织战斗力和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重要一环,是全党的一件大事,要党委负责、全党动手。

**2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进行地、市机构改革时,指导思想必须明确,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中心,以广大农村为基础,逐步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城乡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主要办法是:实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还可采用扩大大中城市郊区,让它多带几个县;把新兴工矿区或城镇改为市,管辖一部分农村;县、市(镇)合并,以及其他适当办法。

**3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大会,隆重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胡耀邦向大会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报告,他指出,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向马克思请教,认真学习他的著作,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掌握了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并使它同工人运动牢固地结合起来。他指出,推翻旧世界,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建设新世界,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全党应进一步清除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干部队伍的“四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4月21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全部调整完毕并获中共中央批准。这次省级领导班子调整具有以下特点:1.领导班子年轻化;2.



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干部的比重增加；3. 领导成员人数减少，机构精简。

**4月29日** 邓小平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范畴。

**5月3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和《关于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该会议于2月22日至3月2日在北京举行)。《决定》明确指出，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用党的方针政策和必要的现代科学知识、业务知识武装党的干部，为党培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党性强、作风好，又有现代化建设知识的领导骨干。《决定》提出，争取从“七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做到：凡是担任省、地两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校培训；地市县级党委所管主要领导干部也必须经过地市县委党校的培训。

**6月6日至21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是我国从政治上经济上克服困难走上健康发展的五年。在这期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



本好转,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并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6月26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当双方谈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问题时,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中国的主张作了系统表述。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他还表示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指出“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可以不需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说,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以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7月1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中共中央于7月12日就学习《邓小平文选》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这个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保证,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

成果。

**7月2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出《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意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意见》要求做好以下10个方面的宣传：1. 宣传祖国新貌和建设成就；2. 宣传英雄人物、先进集体的模范事迹；3. 宣传成功的建设经验；4. 宣传祖国壮丽的河山、名胜古迹；5. 宣传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的历史人物；6. 宣传历代杰出的艺术家及其作品；7. 宣传历代杰出的科学家及其贡献；8. 宣传历代文物；9. 宣传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历史贡献；10. 宣传侨居国外的爱国者和世界各国的著名爱国者。《意见》还强调，要把爱国主义的觉悟和感情，变成奋发图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实际行动。能不能在行动上坚决地积极地去实现党中央提出的80年代、90年代的三大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衡量每个政党，每个团体和每个人是否具有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强弱的标志。

**7月29日至8月2日**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常委和书记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指示，讨论解决社会治安的方针和行动部署问题。8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用几年时间，按照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到11月6日为止，全国共收容审查、劳教、拘留、逮捕了一大批罪犯，摧毁了大批的流氓团伙，收缴了大批犯罪凶器，查获了大量淫书、淫画和淫秽录相、录音带，取得了初战的胜利。社会治安情况开始明显好转。

**8月1日** 《朱德选集》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朱德选集》收

入了朱德从 1931 年至 1962 年间的 65 篇著作。

**9 月 2 日** 中共中央在向全党批发中央组织部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7 月 16 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开)上的工作报告时发出通知指出,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总目标来进行,努力促进和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否则就没有主心骨,就会迷失方向,就可能使我们的事业因缺少组织保证而失败。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搞好干部队伍,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是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路线的核心,也是组织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

**10 月 11 至 12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体现了十二大精神,分析了党内状况,阐明了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整党的基本方针、任务、政策和方法。明确整党的基本任务为: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了保证整党工作的日常领导,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任指导委员会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任副主任。邓小平、陈云在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集中讲了整党要防止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加强思想路线领导的问题。陈云着重讲了清理“三种人”和共产党员不能以权谋私等问题。

**10 月 12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通知》指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显得很不适应。宪法已明确规定在农村建立乡政府,政社必须相应分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同时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通知》要求各地要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好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争取在 1984 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



作,尽快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

**10月18日至29日** 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章程》规定,新时期工会工作的方针是,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为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职工队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会议选举产生了全总新的领导机构,倪志福当选为全总主席、第一书记。

**10月21日至26日** 中共中央邀请270多位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传达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就整党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希望他们帮助共产党搞好整党。彭真代表中共中央讲话指出:这次整党只能解决共产党内的问题,决不整民主党派,不整党外人士。

**11月8日至12月30日** 中共中央领导人分别出席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同盟等8个民主党派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致词祝贺,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经济文化建设和统一战线中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努力参加发展文化教育等工作,在开展科学技术咨询服务、智力支边和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绩和经验。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支持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各种工作和活动。

**12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县级党政机关机构



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县委和县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置,要根据党政合理分工的精神和精简的原则,大力简化和紧缩,重叠的一律撤销,业务相近的坚决合并,工作量不大、能够合署办公的就合署办公,分工不清、互相扯皮的加以调整,条件确已具备改为经济组织和事业单位的就不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政企要分开,不搞行政性公司,不搞政、企、事不分的一个单位两块牌子的机构。

**12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转中央组织部、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调整省、地两级领导班子的工作报告〉的通知》。报告指出,省一级领导机构的调整,从1982年10月开始,到1983年3月底已基本完成。省属部、委、厅局领导班子的调整,也基本完成。省级领导班子、省委常委、正副省长由原来的698人减为463人,减少了34%;平均年龄由原来的62岁下降到55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20%增加到43%。新提拔的省级领导干部204人,占新班子成员的44%,其中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145人,占71%。地、市和省属部、委、厅、局的领导班子,省委常委、正副专员和正副厅长、局长人数,由调整前的16658人减少到10603人,减少36%;平均年龄由58岁降为50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14%提高到44%。

## 1984年

**1月24日** 彭真在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委员座谈时指出,从革命战争到建设时期,从主要依靠政策到健全法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不管什么单位,不论什么人,干部、群众,党内、党外,都要依法办事。他还强调: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是国务院,不是“三权鼎立”。国家的权力放在人大比较可靠。人大是集体负责制,要通过不利于人民的决定,就

不那么容易,这对于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利益是很重要的。

**2月15日** 《陈云文选》(1926—1949年)在全国各地发行。  
7月15日《陈云文选》(1949—1956年)也向全国各地发行。

**2月22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就“一国两制”明确解释说:“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4月11至16日** 第三次全国归国华侨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材料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侨务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几年来共安置27万印度支那难民和难侨;归侨、侨眷的冤、假、错案绝大部分得到了平反纠正;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和400多个地、市、县成立了侨联组织,其他各项政策也在逐步落实。

**4月19日** 中共中央印发彭真《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委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中央同时通知说,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建设,是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环节,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具有重要的作用。还强调,凡是宪法和法律规定须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的事项,必须提请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中央决定,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如果不是党委常委委员,应该列席党委常委会的会议,以便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及时取得党委的领导和支持。

**4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理的通知》,《通知》说,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中央认为有必要

指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各级党委审查同意，须由各级人大选举产生或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的人选，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提出不同意见。对这些意见，有关的党委应该认真加以考虑。如果意见有道理，应该重新考虑人选；如果认为人选不宜改变，或者认为提的意见不全面或与事实有出入，应该耐心说服、解释；如果多数代表或委员不同意，不要勉强要求保证通过。

**4月26日至5月1日**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4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里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重大问题举行了会谈。4月28日，邓小平会见里根并在会见时说：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希望美国领导人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邓小平还指出，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作了最大的努力，就是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他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中国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情。里根则重申：美国政府将信守中美两国发表的三项公报，无意干涉中国内政。

**5月15至31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后在经济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农村改革，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发展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继续改善农业结构，支持农民积极扩大商品生产；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要从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入手，把适合于当前情况的各项改革措施初步配起套来，同步进行。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工作报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兵役法等，并决定建立海南行政区。

**5月25日** 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委员时说，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他强



调,我国恢复对香港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我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6月22至23日**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时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9月12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情况报告》。《报告》说,目前,除西藏外,全国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已基本结束。调整后的县委常委和正副县长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10.8%提高到45%,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15.4%;除北京、上海外,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下;班子人数减少18%。

**9月26日** 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时将香港交还给中国。联合声明还宣布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管理外,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生活方式不变;保持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这些方针政策将由全国人大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双方在将于正式签署时交换的备忘录上签了字。附件1就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说明。附件2就中英两国成立关于香港问题的联



合联络小组事宜作了规定。附件3就中英两国将成立土地委员会处理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作了规定。

**10月20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系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亟需普遍铺开的形势和客观需要而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它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围绕这一基本立足点,《决定》系统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增加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决定》还强调,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庞大队伍;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全会还决定于1985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全会闭幕之后,在全会所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全方位经济体制改革自1985年秋起全面展开。

**10月22至23日**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党中央是成熟的,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他专门就对外开放问题特别强调,没有对外开放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对

外开放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些东西,但不难克服。还指出,对外开放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占主体;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关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评价说,这是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只要党中央有秩序地、很好地工作,精心加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就有大希望。他并认为《决定》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

**11月1日** 公安部消息,全国给最后一批 79504 名“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工作已经顺利结束。至此,民主革命胜利以来,对 2000 余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11月4日** 胡耀邦在徐州召开的苏、豫、皖三省负责人座谈会上说,总结近几年的经验,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两条:一条是思想不停滞。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思想特别不能僵化,要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前进。另一条是办事靠大家。不是个人说了算,也不靠少数人办,而是群策群力,调动各种人的积极性。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他还说 1983 年以来各地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已由星星点点扩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活动。这是一个重大新事物,它的意义不亚于实行对外开放,也更有利于对外开放。这种横向联系还可以扩展到各地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上的互相观摩。

**11月12至19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提出,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队伍中走在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最前头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大量发展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知识分子入党,改变党员队伍的结构,使党内具有千千万万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各方面专门人才,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座谈会还提出当前主要是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宗派情绪，又要反对不讲标准搞突击发展。

**11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300多人参加的会议，经过酝酿提名和3次投票，民主推选出省委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对这次推选十分关心，给予了指导。中指委也派驻陕联络员到会予以协助。中共中央根据这次投票推选的意见，随即批准原来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白纪年任陕西省委书记。《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改革干部制度的大胆尝试》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陕西省采用民主推选的办法，荐举省委书记，是干部制度的一次成功尝试，值得重视和推广。

**11月22日**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十号通知，要求各整党单位在基本上完成整改阶段的任务后，即可转入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阶段。并指出，认真进行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是全面完成这次整党任务，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的一个重要步骤。

**12月5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列举了在改革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有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钻改革的空子，以权谋私、经商办企业、买空卖空、弄虚作假、突击提干提职等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种种新的不正之风，指出它极大地危害着党的事业，妨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要求各地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必须坚决纠正，严肃查处。

**12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培训工作的报告》指出大规模地培训在职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是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根本途径之一。为了加强对干部培养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 1985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文件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将全面展开,城乡之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将会出现。广大农村正面临着加速发展商品生产的有利时机。鉴此,文件认为,在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后,还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同日** 邓小平同志所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在全国发行。该书收入邓小平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到1984年11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22篇。

**3月4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对当前国际形势作出了深刻分析。他指出,当前世界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即东西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叫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他强调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即:“经济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不可能建筑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的基础之上。”他还认为,战争危险是存在的,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第三世界,特别是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重要因素。邓小平的分析再次明确了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世界局势的根本看法,对我国外交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3月27日至4月10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在走上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新路子。我



国的经济形势很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报告并部署了1985年的改革工作,指出:指导改革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会议以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议题,充分发扬民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的工作报告,批准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议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订暂行的规定或条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

**4月15日** 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兼桑给巴尔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邓小平在会见中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我们要坚持,一直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过去闹革命的最大目标和理想。关键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说是搞社会主义。他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也是人民的要求。对外开放就是改革。城市的改革很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确定了一条原则: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步子要稳,发现问题就赶快改。他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中国几千年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经过三年五载就能判断改革的成败,但我们相信会成功的。

**5月20日** 邓小平在同陈鼓应教授谈话时指出,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

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6月4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9.2万余个乡(含民族自治乡)、镇人民政府。与此同时,建立村民委员会82万余个。这项工作的完成,初步改变了农村党政不分的状况,有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8月29日** 邓小平会见由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田边诚率领的该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邓小平说,中国政策的连续性不是靠哪一个人来保证的,而是首先靠政策本身的正确,再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保证我们的政策的继承。他还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搞的四化,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有人担心我们的改革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肯定不会的。只要我们坚持两条,就可保证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一是要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占绝对主导地位;二是每走一步都要注意不使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要走全国各地区、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有些人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9月16日**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顾委和中纪委委员列席了会议。全会决定9月18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将它提请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全会讨论并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全会分别收到一批老同志要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的请求,表示同意并予以高度评价,决定向代表会议报告。

**9月18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胡耀邦致题为《团结奋斗、再展宏图》的开幕词;赵紫阳就中央关于

“七五”计划的建议(草案)作了说明;邓小平、陈云发表了重要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赵紫阳在说明中阐述了关于“七五”计划建议(草案)的有关问题,强调指出,“七五”期间,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争取在今后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批准了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增选了一批新成员进入中央三个委员会。

**9月24日**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委员,同意习仲勋、谷牧、姚依林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请求,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书记处书记。全会还批准了中顾委第五次会议增选的中顾委常委和副主任人选以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增选的中纪委常委和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人选。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对于确保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巩固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月15日** 《刘少奇选集》下卷出版发行。《选集》收入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重要著作38篇,共30余万字。

**12月29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答该社记者问时指出,1985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活动比往年更加广泛和活跃,并且更有成效,有30多位友好政党的主要领导人访问了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世界上近200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胡启立强调,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其它政党发展党际联系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政党之间深入地交换意见。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 1986年

**1月17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纪、国法都是法。只有一手不行。四个坚持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2月21日至3月4日**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部署了1986年的政法工作,强调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情况的稳定好转,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6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

**3月25日至4月12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赵紫阳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原则批准国务院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大会还审议通过了其它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法规。

**5月3日**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号波音747货机在自曼谷经香港飞往台北途中,由机长王锡爵驾驶突然转航大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王锡爵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中国民用航空局3日和11日两次致电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邀请尽快派人来商谈并办理接回飞机、货物及机组其他人员的具体交接事宜。17日,中国民航代表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代表在香港开始商谈。20日,双方就交接事宜达成协议,并签署会谈纪要。23日,双方在



香港启德机场顺利完成交接。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是海峡两岸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

**6月10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把权力下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6月15日** 《陈云文选》第3卷(1956至198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至此《陈云文选》已按原定的编选计划全部出齐。

**7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认真贯彻落实“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思想,全党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法制的约束,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7月16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长期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新时期,继续加强我国的多党派合作,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对于巩固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大统一,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重大意义。全党必须提高对统战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

**9月2日** 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指出,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

上能有所作为。凡是炎黄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对台湾人民没有损失。中国共同致富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正确,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

**9月3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9月9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在全国发行。该书编入毛泽东自1921至1965年期间的著作68篇。

**9月13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11月9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理出头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朝着3个目标进行: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要克服官僚主义和提高工作效率;要调动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组织人力,调查和研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准备提出改革的设想。

**9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党、政、企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有些地方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地方乡政府还没有完全起到一级政权的作用。《通知》要求各地在当前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的情况下,进一步理顺农村党组织、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政社分开以后,乡党委要按照

党章的规定和实行党政分工的要求,集中精力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乡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职权,支持乡长大胆地开展工作。乡政府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为发展商品生产服务,要支持乡经济组织行使其自主权。

**9月28日**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回顾和讨论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要求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全会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还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他指出,这种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11月1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领导班子年轻化几个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几个问题的通知》。前一个文件强调干部“四化”条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后一个文件提出,坚决实行干部职务能上能下、能下能上,逐步从制度上保证德才兼备、具有开创精神的干部能够脱颖而出,激励广大干部为实现新时期的宏伟目标而奋发向上、勇于竞争的精神,使整个干部队伍始终保持朝气和活力,这是深入改革干部制度的重要一环。



**11月30日**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宣布：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政府决定再增加192个市县为对外国人开放地区。在此之前，中国已有244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

**12月30日** 邓小平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就北京、上海等地出现的学潮问题进行了谈话，他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强调，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他还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自由化，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10亿人民就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

## 1987年

**1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的通知。中共中央认为：邓小平这个讲话要点正确分析了当前我国的政治形势，指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坚持改革和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正确阐明了中央当前处理学生闹事的方针，希望各级党、团组织坚决贯彻执行。1月15日，中共中央又决定，将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传达到全党。

**1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规定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始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绝大多数的方针，采取正确的方法，不搞政治运动。《通知》特别强调：全党同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正是为了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是贯彻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重要步骤。

**2月18日** 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时说：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是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

**3月19日** 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出版发行。增订本由原书的22篇文稿增加到44篇。全部文稿都经作者本人审定。新增文稿大大充实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改革开放等方面的内容，有着极强

的针对性。

**3月26日** 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还宣布了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将对澳门实行的12项基本政策。4月12日,中葡两国总理分别代表各自政府正式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是继中国与英国解决香港问题之后,中国人民在祖国统一大业中迈出的又一重大步伐。

**4月13至17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京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旗、区徽图案的征集和审定方法》。4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进一步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他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不懂得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

**4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国策,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实际,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相互学习、共同致富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另据报告中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新建了两个自治州,41个自治县,还恢复和建立了2944个民族乡。

**5月26至30日**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召开全国

整党工作总结会议。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对这次整党总的估价是：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比整党以前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已经有了改变，同时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些都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但是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基本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以致影响和损害了整党工作在群众中的声誉。根据整党工作的经验和党面临的新任务，薄一波提出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意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切实搞好党政分开；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努力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抓紧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不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开展包括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内的各项建设工作，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

**6月12日** 邓小平在会见南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一行时，向客人介绍了中国改革的由来、进程和目的。他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过去搬弄外国的模式，再加上我们的一些错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思想上的僵化，并且妨碍了人民和基层发挥积极性。中国党的错误，从1957年起主要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使中国在将近20年间处于停滞状态。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把发展生产力，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新的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

**6月29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政治体制改



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三权分立、普选(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肯定是动乱局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10月14日** 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采取这一措施对两岸人民的交往是有利的,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我们将尽力提供方便、给予照顾。他还说,两岸同胞探亲应当有来有往,允许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也应当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对来往探亲的同胞,不应有不合情理的限制,希望台湾当局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10月20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1987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十三大的报告。全会确认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请求的决定和同意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

**10月25日至1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936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赵紫阳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从50年



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根据,在理论上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了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并明确地概括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明确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在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报告还回顾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在60多年中发生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需要有新的大发展的客观趋势,并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还初步概括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认识过程中总结出来的12条理论观点,即:1.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2.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3. 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4.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5. 关于社会主义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6. 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7.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8.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9. 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10. 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11. 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

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12.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十三大报告认为:以上这些观点就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它们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和邓小平同志的设计,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则是党的十三大的另一大突出贡献。从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出发,十三大提出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中心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部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大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三大还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为此,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大会并分别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和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改的决议。

## 经 济

1982年

9月16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报告》提出,要改变把小商品价格按大商品价格管理的状况。这是物价管理体制改革的步骤,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国务院批示指出:有计划地逐步放开

小商品价格,是促进小商品生产,搞活小商品流通,满足市场需要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省、市、自治区要抓紧贯彻执行。

**10月20日至11月10日** 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新时期商业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城乡经济,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纪要》总结了1979年中央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即:在吸收外资上初步打开了局面;以首先搞好基础设施为重点展开了基本建设;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较快地发展了工农业生产。《纪要》还强调,特区要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加速经济立法工作等。

## 1983年

**1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通知各地作为草案试行。文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发展的道路已经开通;要按照我国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文件并围绕上述任务,规定了当前农村政策。即:稳定和完善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实现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商业经济形式并存;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政社分设;继续进行农业技术改造,使我国农村经济在日益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不断进步的技术基础上取



得更快的发展。

**2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报告,决定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主要内容为:在不改变省辖市行政关系的条件下,给重庆市以相当于省一级的管理经济的权力,计划单列,由市里直接承担完成国家计划和上缴财政的任务;市里有权统筹安排全市的生产、建设、流通和分配;省属在渝的工业、商业、交通、建筑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全部下放市管;中央各部在渝企业,除军工、能源、交通和其他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外,也下放给市管,全面实行利改税。四川省对重庆市在财政上实行定额上交,增收分成,从1984年起划分中央、省和市的财政收入,实行分级管理。重庆是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至1990年底,全国已有15个计划单列城市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对《中国农民报》编辑部人员的讲话,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了六个方面的深刻变革:1. 贯彻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真正解决了吃大锅饭中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成果的问题;2. 实行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制度,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3. 走综合发展的道路,不但搞农业,而且搞林、牧、副、渔业以及工商业;4. 实行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5. 在发展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了专业分工和社会联合;6. 出现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

**3月3日**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联合发出《通知》,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包干经济责任制试行办法》。《通知》指出,实行建设项目包干经济责任制,是基本建设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改变多年来敞口花钱,吃“大锅饭”弊端的有效途径。

**3月21日至4月1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会



议,强调当前主要是对国营企业推行以税代利的改革,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加快改革步伐,促进企业的整顿和调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试行办法》共19条,自1983年1月1日起实行,征税工作自1983年6月1日办理。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是在充分酝酿和经过试点后实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对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完善企业经营管理责任制,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等,都有重要意义。

**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的通知》,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以较多的自主权。

**6月25至29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这是中共十二大以后召开的关于经济工作的一次战略性会议,为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7月29日** 规模宏大的引滦河水入天津的工程,经过广大军民一年多的努力,全线竣工。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供水工程,全线长234公里,每年向天津市供水10亿吨。8月15日,引滦入津工程全线试通水。9月11日正式通水。

**9月17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银行体制实行这项重大改革,主要是为了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

**9月20日** 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条例》对涉及前外国投资者和合资企业的一系

列重要政策,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到税收,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在国内市场购买物资的价格,中方税后利润的缴税,扩大自主权,外商汇出合法收入,仲裁以及简化审批手续等方面。

**9月29日**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向新华通讯社记者发表谈话说,经过4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已趋于协调。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可以以主要精力推进经济改革。

**11月28日至12月1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认为,1984年党在农村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完善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以鼓励农民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生产效益。会议肯定,发展商品生产是农村富裕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整个农村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经济纲领的必要条件。万里向会议发表讲话指出:联产承包制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我国农村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生产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阶段。县委书记不仅是当“农业书记”、“粮食书记”,还要学会运用价值规律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12月底** 据统计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的工业企业共有28110家,占全国盈利工业企业总户数的88.6%。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业留利水平,1983年比1982年增长25.8%,高于1982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生产增长9.6%,实现利润增长14.1%和上缴税利增长8%的幅度。

## 1984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提出本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并提出了指导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政策措施。16日至26日，农牧渔业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讨论落实《通知》精神，提出要用大胆探索、勇于改革的精神，巩固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把主要精力转到抓好商品生产上来。

**1月24至29日** 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2月9日，邓小平又到厦门经济特区视察，他为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2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又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沿海特区搞好了，收入就可以高一点，可以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

**2月10至23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提出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的重大问题；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并取得成效，是衡量各级经济部门和企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

**3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绿化祖国是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第一位工作，是关系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重大战略问题；并提出到本世纪末，力争把全国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12%提高到20%；种草面积达到5亿亩，使退化、沙化的草场逐步得到恢复和改良。城市绿化要与城市建设协调发



展,凡是可以绿化的地方都要绿化起来。还强调,放宽政策,建立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是发动群众绿化祖国的关键。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在通知中指出:1. 发展多种经营,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只有不断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妥善安排不断出现的多余劳力,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时间,逐步改变 8 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使农村商品生产得到充分的发展,农村才能富裕起来,也才能逐步积累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2. 乡镇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3. 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各级党委和政府应给予积极引导和扶持。这个报告还建议把社队企业名称今后一律称乡镇企业,并提出了促进乡镇企业更为迅速地发展的若干政策。

**3月26日至4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又一战略决策。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并明确指出,沿海开放城市的建设,主要靠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这些城市的自主权,让它们有充分的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

**4月13日**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汇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完成得比较好,取得了很大成绩。1979年至1983年5年,同1971年至1978年的8年比较,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由2166万人减为1903万人,自然增长率由18.7%下降为13.2%以下。中共中央的批示则强调,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关系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要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政策。

**4月16至25日**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江苏常州市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座谈会提出,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简政放权,层层放权,把一部分权利和责任下放给试点城市;试点城市也要把应该给企业的权利真正下放给企业。会议交流了重庆、常州,沙市3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认为:搞好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对于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还强调,必须加快改革试点的步伐。要坚决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着眼于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及建立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以搞活企业和搞活流通为重点,带动其它各项改革。年内,国务院又陆续批准武汉、沈阳、南京、大连等城市为此项改革的试点城市。

**5月1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制定这一暂行规定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暂行规定》适当扩大国营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置、机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资金、联合经营等10个方面的自主权,对搞活经济、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月1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

搞好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中央书记处最近在听取国营工业企业法调查组汇报时指出，当前我国国营工业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无人负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积极改革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实行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厂长（经理）负责制。《通知》决定在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4市选择一批企业进行试点，其它省、自治区有条件的也可自选少数企业进行试点。随《通知》同时下发的还有《国营工业企业法（草案）》，其中对厂长、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的职责、权限分别作了规定。

**6月22日至7月7日** 全国第二步利改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从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第一步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实践证明利改税较之其他方法具有更多的优越性。会议在总结利改税第一步经验的基础上，对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即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的实施作了研究和部署。9月1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并颁布《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从10月1日起试行。这项改革旨在进一步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为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7月14日**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城市商业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商品流通，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服务质量，方便人民生活。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政企分开，建立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商品流通机制，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商业体系；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高经济效益、高服务质量的企业管理办法；形成城乡畅通、地区交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流通网格，走

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商业路子。国务院在批转这个报告的通知中指出,文明经商,遵守商业道德,这是商业改革成败的关键。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弄虚作假,转嫁负担,保护消费者利益,使商业改革健康发展。

**10月4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根据“大的方面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搞好计划体制的改革工作。这一规定将自1985年起实行。

**10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如果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达到10000亿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至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他又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要实现这个目标,没有这个政策是不可能的。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主要靠自己。他强调,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

## 1985年

**1月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国家负责核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所属企业的全部工资总额及其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的比例。

**1月25至31日** 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认为先将这3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是我国在进一步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新形势下,加速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有着重大的意义。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长江、珠江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要求这3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同时又要加强国内的经济联系,共同开发资源,联合生产名牌优质产品,交流人才和技术,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继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之后,这是中央加快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步伐。至此,我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2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加快,出口创汇能力也更为增强。

**2月5至14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指出,1985年要紧紧围绕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这个中心,搞好城市改革和其它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会议提出了加快推行厂长负责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等搞活大中型企业的10项政策措施,促进企业由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转变。

**2月8日** 国务院批转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强调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使上海成为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上海市要充分利用对内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要在1990年以前尽快走上良性循环,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并提出今后要把上海对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作为评定其工作的主要标准。

**3月28日** 国务院批转《关于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并在批转时的通知里指出:五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形势下,让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使两省的经济建设更快些、更好些,在改革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等方面继续探索和总结经验,不但对两省和全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稳定香港,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有积极意义。据《会议纪要》中统计,五年来广东、福建两省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累计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已达17亿美元,占全国这几年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43.5%。五年中用于基建的投资达205亿元,用于企业更新改造的资金达63亿元,超过了1979年以前10年的总和,而且工期缩短,投产较快,经济效益普遍较好。五年来,两省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速度都达到9%以上。鉴此,会议建议,两省今后五年内(即到1989年)将继续实行这一政策措施。同时,要根据形势发展的新情况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署,增添必要的新内容。

**6月1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情况

及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报告》说,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已陆续出台。本年在价格改革方面,先后放开了生猪收购和销售价格;调整了农村粮食购销和棉花收购价格;适当提高了铁路短途运价,蔬菜等副食品价格也在大中城市全部或部分放开,为进一步改革积累了经验。

**6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这次工资改革的原则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适当体现差别,把工作人员的工资同本人的工作职务、责任和劳绩联系起来,要使工作人员的工资普遍有所增加。”这次工资改革虽然还不尽合理完善,但它为进一步理顺工资关系打下了基础。

**6月29日** 国务院批复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国务院批准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全岛,并在这个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8月2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通知》强调,必须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公司应是从事生产经营或服务性业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是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能承担经济责任的企业。对于党政机关和党政机关干部办的公司,要实行政企分开,并使公司在经济上与党政机关脱钩;党政机关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的要辞去一头。《通知》还对公司必须具备的相应条件,成立公司必须经过批准、登记注册,公司必须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25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了《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9月22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本年开始的农村第二步改革迈出了可喜一步。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已基本上代替了统

购派购制度,长期不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开始了全面调整。

**11月26日** “六五”期间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中国技术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举行投产仪式。宝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生产300万吨钢,一些重要钢材品种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12月5日至2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认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根本方针;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改革中发生的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绝不能倒退。会议还提出了1986年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巩固、消化、补充农村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存利除弊,着重把改革中一些突出问题解决好,让改革发挥出更好的效益;与此同时,认真调查研究,为农村下一步改革再迈出重要的步伐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 1986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署》。文件指出,1986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同时指出,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农村经济改革还远未达到既定的目标。今年重点是围绕已经实行的政策,加强后续工作,把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这是粮食收购制度的重大改革,只能逐步完善,不可动摇。从今年起,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粮食调拨包干,并对调拨价格和财政补助办法作适当调整。包干以外需



要调出、调入的粮食,由各地区自行协商议价购销。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应当进一步完善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文件强调:我们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一定要注意发展合作制度,实行税收调节,做好扶贫工作,发展生产,走向共同富裕。

**1月7日** 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会议提出,我国的经济特区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更上一层楼,朝着建立外向型经济的目标奋力前进,使之确实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进一步发挥向国内外两个扇面辐射的枢纽作用,更好地为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运用经济办法和现代化信息手段管理经济方面,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

**1月8日** 国家验收委员会宣布:中国第二个规模宏大的汽车工业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竣工验收合格。该厂有职工5.7万人,各种设备2万多台,生产线500余条,98%的设备是由国内机械制造行业提供的,能生产2.5吨、3.5吨、5吨3种车型。

**1月11至20日** 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坚持改革,加强企业管理,是现阶段关系到经济工作全局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抓紧抓好。

**1月12日至2月3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鉴于经过一年努力,1985年初提出的改革要初战必胜的要求已经实现,但国家经济生活中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在这种客观形势下,会议认为:在去年改革的基础上,今年主要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同时为明后年改革再迈出重要步伐作好准备。为此会议提出,1986年的改革,主要抓好四件事:第一,改善宏观控制。第二,对已经出台的价格改革、工资改革作一些消化、补充工作,解决突出的遗留问题。第三,进一步把大中型骨干企业和出口企业搞活。



第四,大力促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横向经济联合。

**3月10至16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回顾了几年来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部署了1986年城市改革的任务,着重研究发展和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提出,1986年的城市体制改革必须贯彻“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做好如下工作:1. 消化、补充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巩固与发展改革成果。城市主要是继续搞活和开拓市场,加强和完善市场管理。2. 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3. 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4. 认真做好1986年经济工作,继续搞好改革的试点,为1987年改革再迈出重要一步做好准备。

**3月23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坚持“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是横向经济联合的原则,提倡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的经济联合。《规定》还指出了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4个方面的作用:1. 促进资源的开发和资金的合理利用;2. 促进商品的合理流通和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3. 促进技术进步和人才合理交流;4. 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

**3月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农垦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农垦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着重解决好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关系问题。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规定,把应该下放的权力下放给农垦企业,使其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不吃国家的“大锅饭”。《报告》则提出了农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方针、任务及改革的具体要求。

**4月10日**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中外记者说,1985年是中国对外开放工作成绩最大的一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为58.5

亿美元,比前年增长 120%,新批准建立中外合资企业 1300 多个,为前 5 年的总和。

**5 月 7 日** 全国劳动人事厅局长会议结束。会议提出:“七五”期间我国劳动、工资、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要放在企业的工资制度改革、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做好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有关工作上,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作好机构改革的工作,改革干部任用制度,逐步推行干部聘用制、聘任制、任期制,实行干部交流和合理流动,加强对干部队伍的宏观控制,使其与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相协调。

**5 月 9 日** 中共中央在批转《关于“六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七五”期间工作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七五”期间正值人口生育高峰,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高度重视,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切不可掉以轻心,疏忽大意。人口的增长必须严格控制。

**5 月 26 至 29 日** 被称为中国北方“金项链”的 14 个环渤海的市(地区)在天津举行市长联席会,确定建立环渤海经济区,开展多方面、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这 14 个市(地区)是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惠民、东营、潍坊、烟台、青岛。

**5 月 30 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商业部等单位《关于 1986 年商业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近几年,在商业流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目前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商业流通渠道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必须进一步改革。1986 年要做好巩固、消化、补充和改善工作,积极探索新的流通渠道、新的商业形式、新的管理体制和宏观调节措施。这些措施是:1. 广泛发展商业领域的横向经济联合;2. 进一步搞活国营大中型商业企业;3. 继续开

放国营小商业企业；4. 加强对市场商品流通的宏观调节和管理；5. 进一步简政放权。

**5月31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精神，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进大中型企业与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合作的通知》。为加强宏观指导，三方联合成立经济技术合作协调小组，1986年计划推进100个大中型企业与科学院合作，编制重大技术开发百项合作计划。

**6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由国家《企业破产法(草案)》起草小组、辽宁社会科学院和沈阳市人民政府最近在沈阳联合召开企业破产倒闭理论与实践讨论会。会议肯定了沈阳市集体企业实行破产倒闭制度的试点，认为这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大胆探索，为国家企业破产法的制定、实施，积累和提供了经验。会议指出，过去用关停并转的手段给处于窘境的企业“输血”是保护落后的消极作法，使效益好的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形成鞭打壮牛的不合理局面，不能真正体现优胜劣汰的竞争结果，应予以取而代之。目前实施企业破产法已具备了条件，一是企业已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二是社会具备了较为宽松的就业条件；三是存在倾向改革的社会心理。

**7月12日** 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四项劳动制度改革的暂行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实行。这些暂行规定的实施，将有助于消除现行劳动制度中包得过多、统得过死，能进不能出的弊端，逐步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劳动制度，以利于激励广大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生产积



极性,推动生产的发展。

**9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三个条例的通知》。《通知》指出,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必须保证厂长在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突出厂长在行政指挥中的作用。但是绝不应把实行厂长责任制同加强和改善党对企业的领导、巩固和发扬民主管理对立起来。而是要使企业行政、党组织和工会等群众组织的工作,都紧紧围绕生产经营这个中心,按照分工,加强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3个条例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11月8日至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从各方面看,农村经济的发展显现出若干新的特征,主要是改革由突破转向纵深发展,经济由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性增长。会议指出,整个农村经济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目标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会议对1987年农村工作提出的总的要求是:继续坚持改革,这是首要任务;搞好基层党建,争取粮食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全面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11月16日至22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适应改革形势,积极改革计划体制,做好明年计划安排。会议集中力量讨论和研究了总的指导思想和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1. 大力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工业产品结构;2. 继续控制投资规模,大力调整投资结构,保证重点建设;3. 努力增加出口创汇,改革外汇体制;4. 缩小统配物资范围,扩大生产资料市场;5. 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点,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来。会



议明确了努力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为全面改革创造良好条件,是安排明年计划的总出发点;肯定了国家计委提出的明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8 项重点。

**12月2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闭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该法案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宣告破产。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对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2月5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 认真落实近年来搞活企业的有关政策规定。2. 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3. 加快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4. 进一步增强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5. 改进企业的工资、奖金分配制度。6. 继续缩减为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7. 限期清理、撤销行政性公司。8. 鼓励发展企业集团。

## 1987年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文件在分析几年来农村改革成就和困难的基础上指出,农村改革现在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改革必须坚持下去,并通过艰苦努力,做好充实、巩固、配套、提高工作,促进新体制的成长,争取再以 5 年或稍长一点时间,使新体制充实和完善起来,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文件还就继续改革统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分散经营和

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制,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的方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

**1月22至26日** 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认为,1986年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国民经济发展逐步趋向正常,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贯彻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中取得了新的进展,产品结构有所调整,企业技术进步迈出新步伐。当前,特别是要注意压缩空气,把过去膨胀的预算外投资规模和过高的非生产性开支压下来,进一步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矛盾,为深化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平稳的经济环境。会议提出,1987年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2月6至10日** 1987年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会议分析了经济特区当前的情况,研究了1987年的工作安排。会议指出,经过过去几年的努力,特区已由打基础的初创阶段,进入了建立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会议强调,经济特区要依靠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的领导与支持,兢兢业业,扎扎实实,进一步把各项工作抓上去。争取到1989年即特区创办10周年之际,初步建成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旅游和农牧渔业相应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特区,在上缴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方面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在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和探索改革、开放、搞活的经验上作出更大的成绩,对香港、澳门经济的稳定繁荣和统一祖国大业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

**3月27日** 交通部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方案出台。根据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交通部直属的沿海港口

和工业企业全部下放给地方,交通部行使政府职能,实行行业管理和宏观控制。

**6月10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关于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贯彻落实。《意见》指出,中国式的商品流通模式正在探索之中,已经进行的改革尚不完善,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国营商业企业活力不够,“大锅饭”未真正打破,自我发展能力薄弱,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运行机制不良;政企职责不分,调节手段不够等。深化国营商业体制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区别行业特点和企业规模,实行多种管理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发挥国营商业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

**8月1日** 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烟台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行方案即日起开始试行。烟台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第一个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提租发券(住房券);空转起步(对改革前的旧房,采取“一手发出,一手收回”的空转办法,而改革后的住宅进入实转);减免补助(对实行新办法房租支出较大的家庭,一定时期内予以减免补助);鼓励买房(以经济上的优惠促使职工买房);理顺资金,逐步建立市、企业和个人的住宅基金制度,集中建房资金。

**8月25至29日** 由国家经委、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987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要在1988年底以前完成。其后,各地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截止当年6月底的统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实行厂长



负责制的已达 35232 个,占同类企业总数的 63.9%。这标志着这项改革已经从试点进入全面实行的新阶段。

**9月22至29日** 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两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安排 198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李鹏在宣布大会开幕时指出,国务院决定两个会议同时召开,是因为我国的生产建设同经济体制和改革密不可分,此举将二者进一步结合,促使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会议认真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深入讨论了明年的生产建设体制和改革任务。会议明确 1988 年我国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化,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有成效地发展。

**9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通知》阐明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划出成立海南省,对于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改善海南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和巩固国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强调:海南建省后,各级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确定,要符合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要坚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要小,要多搞经济实体,使海南省成为全国省一级机构全面改革的试点单位。海南的开发建设,必须立足于海南的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同时大力吸引外资,特别要注意引进港澳的资金,逐步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为此,国务院将给海南省以更多的自主权,规定更为优惠的政策,使它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1982年



**11月2日** 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座谈会于10月6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

**12月22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第一台质子直线加速器(1978年8月开始设计研制),最近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成,并于17日首次引出能量为1000万电子伏特的质子束流。

### 1983年

**5月3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并同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逐步执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5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要以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的高度责任感,切实把农村学校教育工作抓紧抓好。并指出,农村教育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办学应当坚持多层次、多种规格和多种形式。

**6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报告》。批示指出:职工读书活动,是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势下,广大职工群众和青年积极向上的表现。它反映了“祖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的历史需要和我们国家在前进、时代在前进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不断总结经验,使这一活动健康发展。到10月中旬,全国参加读书活动的职工已有1000万人,有13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

**7月9日至15日** 教育部、国家计委、劳动人事部在北京召开专门人才规划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全国专门人才的预测和规划工作问题。万里到会讲话指出:在人才规划的时候,首先要大力宣传知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宣传提高干部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重要性,宣传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进一步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人才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引起大家极大的重视。当前必须加快教育工作的调整、改革和发展的步伐,解决培养人才速度和提高人才质量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专门人才规划小组,切实加强领导。

**9月10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关于加强城市、厂矿群众文化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央批示强调,要把开展城市、厂矿的群众文化活动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切实加强领导,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努力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活动去占领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的业余活动阵地。

**12月13日至22日**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继续贯彻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总结前一段的经验,讨论一些政策性措施和必要的体制改革举措;研究如何从战略上、政策上、措施上去保证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兴技术;研究如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继续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1984年的工作安排和讨论地方科委的工作。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了在科技界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6条政策界限:1.应当鼓励科技人员努力学习掌握世界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2.认真了解、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正在不断出现的许多边缘科学。3.在讨论科技方面重大决策和论证技术经济可行性时,鼓励科技人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展开争论。4.在科技政策与管理方

进行国内外经验的比较研究以探索改革路子,不要因为制度不同就拒绝研究和借鉴。5. 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思想要提倡自由讨论。科研工作中要允许有一部分自由选题,管理工作中要进行人才流动和自由组合等试验。不要把这些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6. 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应当在“双百”方针指导下,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开展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中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

**12月21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研制成功的每秒钟向量运算1亿次以上的巨型电子计算机最近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这台计算机命名为“银河”,它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世界上研制巨型计算机国家的行列。

## 1984年

**4月8日** 中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地球同步试验通讯卫星,并于16日定点于东经125°赤道上空。星上仪器设备工作良好,通讯、广播和电视传输等试验正常进行。这表明,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和卫星通讯技术均有重大突破。

**7月17日至21日** 全国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促进科技人才流动的5条措施可以立即付诸实施,即试行科技人才招聘制;成立全国科技与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改革学成回国的大学毕业生和进修生分配的制度;调整使用不当的科技人员。21日,全国科技与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在北京成立。

**7月28日至8月13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运动员共取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金牌总数仅次于美国、罗马尼亚和联邦

德国,居第四位,以优异成绩实现了中国在奥运史上的“零的突破”。

**9月4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指出为了适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在坚决纠正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的同时,对现行的课程设计和教材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增强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10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必须看到,目前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尽快缩小这个差距,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使体育运动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并提出,搞好项目的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项目,大力加强田径、游泳等薄弱环节(田径是各项运动的基础),同时要把那些短期内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抓上去,争取在今后的国际比赛中,夺取更优异的成绩。

## 1985年

**2月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科委党组整改工作汇报提纲》,同时发出通知说:希望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各级科学技术领导部门,把科技体制的改革看成是整个改革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决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加快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步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发展的



道路。3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对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作了规定。并强调,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月2至7日**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向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明确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他指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这样做能使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并强调科技体制改革最关键的还是人才问题。他还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会议对改革科技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根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对现行科技体制在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诸方面进行改革的内容和基本原则。并强调,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技成果能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技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技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4月2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指出,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创作和演出好的作品,培养新的优秀人才,努力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表演团体的新途径、新形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5月15至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强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针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决定》强调要把发展基础教育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原则和措施。《决定》的贯彻，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星火计划”。该计划由国家科委与各有关部委共同倡议，是一项力图以一批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科技项目，为振兴农村经济服务的计划方案。

## 1986年

**1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国职称改革工作会议（1月4至8日在北京召开）所形成的《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并在转发时的通知中指出，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需在总结过去职称评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改革职称评定制度。改革的中心是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并相应地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度。职称评定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实行，是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项基础建设。

**1月25日** 据国务院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材料,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城乡个体经济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全国个体商业网点已达580余万个,城镇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蔬菜、禽蛋、鱼肉等农副产品和日用小商品越来越多地从个体商贩得到供应。个体工商业生产经营领域不断扩大,已从50年代的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发展到今天的小型工矿、建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

**2月1日** 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实用通讯广播卫星。20日,卫星准确定点于东经103°赤道上空。当晚全国数十个卫星地面站同时接收了这颗卫星传送的中央电视台节目。这标志着中国的卫星通讯技术已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

**3月3日** 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芬允、杨嘉墀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这一建议后来被称为“八六三计划”。邓小平在这份建议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

**3月10日** 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教委主任李鹏在会上讲话指出,1986年教育战线的中心任务是继续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抓紧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工作;高等教育要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调整教育结构、布局和提高教育质量上来;继续发展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和改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5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各种形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完全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方针,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要像对待公派留学人员那样关心和爱护自费留学人员。目前在出国留学人员的派遣和管理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派遣计划紧密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不够,学用脱节,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有些留学人员回国后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注意,本着总结经验、引导教育、



兴利除弊的原则,切实加以解决。

**5月15日** 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奖励了荣获首次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1761个项目,荣获1985年国家发明奖的185个项目和荣获“六五”攻关成果奖的115个项目及37个人。在日内瓦、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三个国际发明展览会获奖的科技人员也同时获得表彰。

**5月2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对高等学校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必须进行改革。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经常地、切实地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2.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3.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4.进行品德和纪律教育,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校风;5.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7月8日** 经过两年的努力,我国国内卫星通信网正式建成;北京、拉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的地面站同时举行了开通仪式。这次开通的国内卫星通讯网系租用国际卫星组织的转发器,将北京、拉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和广州5个卫星地面站联结起来,便可以覆盖我国全部版图。

**7月9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要求各地领导为人才合理流动创造条件。在优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大科研项目人才需要的前提下,鼓励科技人员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支援中小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内地到边远地区去工作。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中央的有关部署,逐步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在未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单位,凡使用不当,难发挥作用,又未作调整的科技人员,可以辞退。鼓励企业事业单位通过实行联合和技术协作,以及采用科技人员调动、



借调、兼职等多种形式,调剂技术力量余缺。

**9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关于当前科技工作形势和今后工作若干意见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当前科技工作的形势,指出改革科技体制对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提出,力争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我国的科技体制基本上转上新轨道,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新的经济体制的需要。

**10月29日至11月4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354个重点研究课题。对课题的选择,突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对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并重点考虑了那些与改革、开放和建设实际密切相关的项目。会议还讨论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暂行条例》。

## 1987年

**1月2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促进多层次、多形式的科研生产横向联合,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进一步改革科技人员管理体制,放宽放活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为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各单位要有计划地组织科技人员,或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以调离、停薪留职、辞职等方式,走出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政府机构,到城镇和农村承包、承租全民所有制中小企业,承包或领办集体乡镇企业,兴办经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技术贸易机构,创办各类中小型合资企业、股份公司等,允许那些能带领人民致富的科技人员自己也富裕起来。

**7月1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国家教委、财政部决定,今年在全国本科高等学校新生中普遍实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

**8月10日** 中国在四川省中部预定地区成功回收了一颗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这颗卫星装有法国马特拉公司的两个微重力试验装置。这是中国第一次为外国公司提供卫星搭载服务。

## 军 事

### 1982年

**10月7至16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我国用潜艇在水下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的的发展。

### 1983年

**4月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武警部队系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实行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而成。其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1984年

**11月1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军队工作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大力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他还说,军队大力支援国家建设,争取全国早

日实现翻两番这个大目标,使国民经济充分发展起来。国力大大增强了,搞国防建设就容易了。培养军队和地方适用的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

## 1985年

**5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指战员换着新的制式服装。

**5月23日至6月6日** 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并指出: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中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会议研究制订了落实百万大裁军战略决策的措施和步骤;并确定搞好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是军队今后两年的中心任务。

**9月27日** 《解放军报》报道,人民解放军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班子已经调整完毕,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军队高级领导岗位。调整后的各大单位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64.9岁下降到56.7岁;每个班子中都有40岁左右、50岁左右、60岁左右的干部,基本上形成了梯队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60%的干部具有大专文化程度,75%的干部经过军队院校的培训。

**9月28日至12月1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汇报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报告。英模们那种“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 1986年

**1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工作人员改为地方编制,任务不变,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此举将更有利于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

**1月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在京成立,原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届时结束并入该校。

**3月21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地区部队发言人宣布:为了进一步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部已奉命于1985年停止向台湾和金门、马祖诸岛空飘、海飘宣传品。

**12月11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就是要求我军的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的轨道。会议提供的材料表明,全军精简整编,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到会议召开时,全军已减少41万人,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0多个,师、团级单位4000多个,总部机关人员减少近一半。编制体制的改革也有较大突破,达70余项,原11个大军区经过整编已减为7个。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全军在精兵、合成、提高效能等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军队减少员额100万的工作将按计划顺利完成。

## 1987年

**1月27日** 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



的决定》，并由中共中央于2月15日转发全党。《决定》提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要从八个方面开展军队政治工作：1. 加强以理想、纪律为重点的思想教育。2. 健全和发展部队的民主生活。3. 培育部队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公道正派、谦虚谨慎、团结互助、雷厉风行、英勇顽强的优良作风。4. 注意科学文化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5. 加强军事训练、科学研究和后勤保障中的政治工作。6. 大力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7. 做好基层政治工作。8.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 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

肖 姓

70年前,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诞生了。这所新型的学校是孙中山为培养军队指挥人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于1924年5月创办的。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通过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竭尽全力为军校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 一、参与军校筹建活动

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及其之后历次革命活动失败的教训时认识到:中国革命,从前“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成功。”而开办黄埔军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sup>①</sup> 根据孙中山的这一思想,1923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议决,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

---

<sup>①</sup>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式决定成立陆军军官校，并且由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

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除得到苏俄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大量援助外，中国共产党也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参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学习考察。

为准备创办军官学校以及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孙中山于1923年8月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寻求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产党员张太雷、沈定一（即沈玄庐）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随团在苏俄考察4个月，于12月中旬才返回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参加黄埔军校创建的第一个举动。

第二，选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即正式成立军校筹备处，开始办理招生工作。当时除广东省外，全国各省区多在军阀势力控制之下，招生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国民党一大委托与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或就地考试，或动员青年学生赴广州投考。

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一方面指示各地党、团组织，要求多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如共青团广州地委曾告知各地团组织，“现在国民党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地方拟派三、四同志赴考，来预备将来干军人运动。”<sup>①</sup> 另一方面，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代表回籍后，秘密办理军校第一期学生招考事宜，如何叔衡回湖南后动员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胡公冕被派到浙江招收黄埔一期学生。同时，他还负责招待到上海来的西

---

<sup>①</sup> 《张善铭、沈厚堃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报告（第七号）》，《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6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北、华北等地的第一期学生，并率领这些学生到达广州。<sup>①</sup> 黄埔军校第一期共录取学生 499 人，其中“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sup>②</sup>

第三，参加考生复试工作。

因各地青年报考军校十分踊跃，初试录取的考生总数为 1200 余人，当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的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北各省考生复试工作。毛泽东对前来上海参加复试的湖南考生十分关怀，叮嘱他们说：“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sup>③</sup>

各地学生复试后再到广州参加全国总复试。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规定，1924 年 3 月 27 日至 29 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入学考试。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共产党员张申府一面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执教，一面被党组织派遣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他曾参加军校考生的总复试工作，负责学生的口试以及临考笔试和评阅试卷<sup>④</sup>。

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参与选取新生时的成功工作，以及严格地坚持择优录取，严格把关的原则，有效地保证了黄埔军校学员的质量。

---

① 胡公冕《我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1 期。

②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15—116 页。

③ 郭一予《毛泽东负责上海地区考生复试》，《黄埔军校史料》第 38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 版。

④ 张申府《筹备黄埔军校点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 98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版。1981 年 11 月笔者访问张申府记录。



## 二,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度

孙中山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开办黄埔军校要坚定不移地仿效俄国,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军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制度,以及党代表制度。这是以往任何中国军队所没有的。军队有政治工作,在中国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极为重视,派出大批党员参与此项工作,制定政治工作计划,开展政治教育。可以说,军校的政治工作,完全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sup>①</sup>随后,在中共的努力下又将军校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推广到国民革命军中去。

政治部是军校担负政治教育的唯一机关,其主要职责,对内“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sup>②</sup>。政治部对党代表负责,党代表命令并指导政治部,使部队成为有严格纪律的严密的组织。

黄埔军校政治部于1924年5月25日成立。中共选派优秀干部担任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工作。6月17日,孙中山任命共产党员张崧年(即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sup>③</sup>。因军校最初两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和邵元冲到职时间短,无甚作为,加上政治部组织很简单,人员少,故政治工作显得死气沉沉。后应军校总理孙中山和党代表廖仲恺的邀请,中国共产党决定派遣从欧洲回国不久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45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政治部服务细则》,《黄埔军校史料》第182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07页。

的周恩来于同年 11 月出任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sup>①</sup>。1925 年 2 月,因第一、二期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第三期入伍生入校,军校便设有前方和后方两个政治部,前方主任为周恩来,后方主任由共产党员包惠僧代理。同年 9 月,共产党员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因主任邵力子常住上海,实际部务全部由鲁易负责。1926 年 1 月,共产党员熊雄接替鲁易任政治部副主任,12 月又代理政治部主任。在这一年半期间,政治部机关的许多重要职务,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如鲁易为政治部秘书,黄鳌为秘书股主任,王逸常为指导股主任,杨其纲为编纂股主任(后为宣传科长),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兼组织科长等。

自周恩来任职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才算真正开展起来,军校也才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到职后曾尖锐地指出:“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sup>②</sup>周恩来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工作内容。在他主持下,政治部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外,还编写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导教材,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sup>③</sup>周恩来能和学员们打成一片,亲自参加听课和讨论,并及时回答学员们的问题。他还经常深夜查铺,对学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尤其是他给学员讲政治课,易懂易学,学员们非常喜欢听,“都称

---

① 慕《一年来本校政治部之概况》,《黄埔潮》第 24 期,1926 年 1 月 1 日。

② 王逸常《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长江日报》1980 年 1 月 6 日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 28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赞周老师是最好的老师”<sup>①</sup>。周恩来是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最优秀的代表,是全体师生的典范,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谆谆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sup>②</sup>

从第四期开始,黄埔军校政治部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每期学习的政治科目多达20多种。所有这些课程,都是聘请知名人士和共产党员作政治教官,专门讲授。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富有教学才能的共产党员担任军校政治教官,如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萧楚女、聂荣臻、韩麟符、廖划平、杨其纲、于树德、安体诚、李合林、张秋人等。他们向全校师生讲述国内外大事和革命发展趋势,解答一切党务上、政治上的重要问题,赢得很高的信誉,素为学员们敬仰和爱戴。

由于政治工作的加强,一方面使国内发生的每一次政治事件都及时反映到学校中来;另一方面在广州的任何一次重大政治事件、游行,群众集会等,都必有军校学员参加,成为广州群众社会政治运动的指导力量。所以,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即已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sup>③</sup>实践证明,军校教育的成功,归根到底归功于在“中国共产党及苏俄的帮助下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及政治工作制度。”<sup>④</sup>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增强了黄埔学生军和教导团的战斗力,取得了两次东征、扫平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及统一广东的胜利。而这种政治工作制度尔后又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使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灵魂。

---

① 李奇中《黄埔精神永存》,《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② 宋希濂《参加黄埔军校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59页。

③ [苏]A·N·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第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 邱行湘《回忆在黄埔军校的年代》,《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与建立政治部制度一样,黄埔军校最早实行了党代表制度。根据《服务规则》规定,党代表“有监察校内行政,指导党务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之责。”<sup>①</sup>自1924年11月教导团成立开始,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委派团、营、连等多级党代表,进行切实的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实行后,因人才缺乏,工作难以开展。为解决这一困难,政治部“决定设一政治训练班,从第二期学生队、第三期入伍生、湘军学校、滇军投诚干部学校学生、桂军军官学校学生及学兵连中,选拔一百二十人,分三班教授,一班速成,以一月为期,两班普通,以三月为期。”<sup>②</sup>通过这一举措,专门培养党代表和宣传员人才。

毛泽东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政治工作制度时说:“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sup>③</sup>

### 三、重视政治教育

黄埔军校的教育方针是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并重。军校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军事工作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览,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sup>④</sup>

---

① 《黄埔军校史料》第130—131页。

② 《黄埔军校史料》第187页。

③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④ 《校党代表训令》,《黄埔潮》第7期,1925年10月31日。



中国共产党从建校开始就十分重视政治教育,通过广泛开展多种活动,使政治教育在军校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并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重要手段。政治教育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革命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要内容,着眼于提高政治觉悟,使学生成为既熟练于指挥作战又长于政治工作的全面人才。

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讲授政治课。这是政治教育的最主要手段。军校分学生、官长、士兵3种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全部学生课程中占很大比重,每期总数要在百次以上。从第四期起,军校还特设政治科大队,共500人,学生大部分政治水平较高,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苏联军事顾问和中共党员在参与制定《政治教育大纲》并将其付诸实施过程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根据《政治教育大纲》规定,开设《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军队政治工作》等18门课程;后又增加《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苏俄研究》等,共计20多门。通过讲授政治课,使学生了解到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明确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及其历史职责,这对于“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sup>①</sup>

(二)开设政治训练班。为选拔训练党代表和政治宣传员,以满足军校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从第二期起,选拔120人,特设政治训练班,规定开设《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等8门课程。1925年6月24日设立政治训练班,由高语罕、张太雷和苏联顾问担任训练。

---

<sup>①</sup>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46页

共产党员萧楚女、孙炳文、施存统、李求实等先后为政治训练班作过讲演报告。

**(三)举办政治演讲会和报告会。**每周定期举行一次政治讲演会和两次特别讲演会,邀请许多共产党员来校为官长作政治教育特别演讲,如邓中夏讲《省港罢工之经过》,陈启修讲《最近世界经济状况》,施存统讲《革命运动发生之原质》,罗绮园讲《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概况》,彭湃讲《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恽代英讲《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之经过》等<sup>①</sup>。此外,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吴玉章、张太雷等共产党知名人士,也都应邀来校演讲。每次在军校大花厅讲堂听演讲的人,总是坐无虚席。他们的演讲深入浅出,条理分明,风趣生动,发人深省,大大激发了师生们的反帝爱国热情。

**(四)举行政治讨论会。**政治讨论会,每周举行一次,由学生主持,政治部派人指导,政治教官参加。大家在讨论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引起认真的思考和浓厚的兴趣。

**(五)进行政治问答。**从1926年12月起,学生平日提出许多政治上不清楚的疑难问题或重点问题,由政治教官在校刊《黄埔日刊》上作公开解答,很受学员的欢迎。恽代英、萧楚女、廖划平、张秋人4人将其答案汇集成册,由政治部于1927年1月编辑出版了《政治问答集》一书。全书10余万字,共10编,其中有关于“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系统”,“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政策”,“革命的理论、策略、历史”等。

**(六)组织各种宣传活动。**为贯彻教育方针和配合形势教育,在校内外广泛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第一次东征时,由学生组成一个约20人的宣传队,随处向农民工人宣传,散发传单,外出讲演,

---

<sup>①</sup> 《黄埔日刊》1926年11月19日。

开联欢会,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等,还派人组织农民协会或工会,受到农工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第二次东征时,政治部组织了249人的东征宣传总队,共产党员黄锦辉任宣传总队长,宣传队准备了各种传单、标语、照片共108万张,小画报20万册等宣传品。以第一支队为例,共开联欢会16次,对民众讲演878次,对友军讲演61次<sup>①</sup>。学生们通过宣传队的活动,既宣传了革命主张,又受到实际锻炼和教育。此外,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等还领导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还我自由》、《新时代》、《革命军来了》等不少反帝反封建题材的戏剧,受到校内外好评。1925年4月又成立了军校俱乐部,分政治、经济、美术、戏剧、音乐、体育6个组,活跃了学员的课余生活,陶冶了精神情操。

(七)出版书刊。除公开发行《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马列主义书刊外,还大量出版发行多种书报期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军事政治月刊》、《黄埔日刊》、《黄埔潮》、《中国军人》等。这些刊物在校内外广为传播,有的发行量每期达5万份,影响很大,遍及全国各省。此外,还出版《士兵之友》、《革命之声》、《画报》以及特刊、丛书、文集、讲义等政治宣传读物。仅1926年8月,政治部宣传科就发出书刊1.6万多册。这些书刊对于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有上述政治教育与政治训练,对于团结军校师生员工,提高革命热情,严明纪律,奋勇作战,以及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瓦解敌人,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则起了核心作用。

---

<sup>①</sup> 张其雄《东征时期之政治工作概略》,《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6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工教研室编。

#### 四、军校的中共党组织

军校成立初期,师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对其他进步学生加以团结教育,第二期学生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即陈公培)等,共同倡议组织秘密团体,并效法列宁在1900年创办《火星报》的含义,于1924年冬成立“火星社”,来推行中共的政策,扩大其影响,并为吸收中共党员作必要的准备工作。该组织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从成立到1925年9月自行解散,共发展成员100人左右。该社在1925年1月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竞选中大获全胜,5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4名,即周逸群、吴明、陈作为、罗振声;3名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2名,即王伯苍、黄锦辉<sup>①</sup>。表明该组织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其大多数成员后来相继加入了共产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十分关心军校的党组织建设。1924年秋,黄埔军校成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即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隶属广东区委军事部领导,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sup>②</sup>。第一任书记是蒋先云,第二、第三任书记是杨其纲。从第三期开始,特别支部的日常工作由聂荣臻、鲁易负责。军校的许多优秀学生先后加入共产党,到1926年初共产党员达到150人。如第一期的杨其纲、刘仇西(即刘畴西)、游步瀛、王逸常、徐象谦(即

<sup>①</sup> 《黄埔军校史料》第520页。

<sup>②</sup> 王逸常《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主要成员》,《黄埔军校史料》第116页。



徐向前)、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许继慎、蔡升熙(即蔡申熙)、唐澍、李之龙、李奇中、李鸣珂、曹渊、赵自选、左权、黄锦辉等;第二期的卢德铭、王一飞、周逸群、李劳工等;第三期的朱云卿等;第四期的范树德、伍中豪、彭泽湘、林彪、曾钟圣(曾中生)、刘景桂(即刘志丹)等。其中后来有的成为著名的活动分子;有的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中共广东区委对黄埔军校党组织抓得很紧,每星期由区委军委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一次党小组长以上和积极分子的报告会或演讲会。每次多是由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彭湃、毛泽东、邓中夏、陈延年等作政治形势教育报告。共产党员每次都能积极踊跃参加。此外,各学员队都有党小组,每星期开一次党小组会。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都及时对军校党团员的斗争给予指导与帮助。1925 元旦发出《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指示各级党组织迅速多派党员团员及国民党左派,“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认为“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sup>①</sup>1926 年 3 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事发后,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予以坚决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同年四五月间,周恩来主持了大佛寺政治训练班,亲任班主任,将前被扣押的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和黄埔军校及潮州分校的共产党员集中起来进行了 3 星期的培训。周恩来多次向学员讲话,要求大家在军队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邓中夏、彭湃、苏兆征、阮啸仙、恽代英等,都为政治训练班作过关于工运、农运、青运及国内外形势的政治报告。这个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党团员成为北伐的骨干,对北伐取得

---

<sup>①</sup> 《黄埔军校史料》第 70 页。

胜利起了重大作用。”<sup>①</sup>

为了加强军校党组织的力量,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4月成立了由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5人组成的“党团”领导小组<sup>②</sup>,先后由恽代英、熊雄负责主持。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共清党事变后,军校党组织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暂由杨其纲主持工作。

为了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立即指示军校党组织:“一个都不要向所在单位国民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sup>③</sup> 根据这一指示,军校党组织保存了革命实力,并为尔后安全迅速转移奠定了基础。1926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再次要求各地党组织鼓动国民党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革命青年,“前往投考;使此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勿为右派分子所拿去,造出一般反动的军事人才。”<sup>④</sup>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选派许多党员参加军校各级领导工作,使国共合作期间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如在第一期的4个学员队中,共产党员茅延楨、金佛庄分任第二、第三队队长,严凤仪为第四队副队长;惠东升、郜子举、吴济民、郭俊等7人为区队长。胡公冕为管理部卫兵长,徐成章为特别官佐。1924年11、12月两个教导团成立时,胡公冕、茅延楨为第一团第一、第二营党代表;金佛庄任第三营营长;曹渊、蒋先云、谭其镜、许继慎、

---

① 王逸常《回忆周恩来同志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② 饶来杰《回忆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活动情况》,《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③ 饶来杰《回忆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活动情况》,《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④ 《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二十二号)》,《黄埔军校史料》第79页。

黄鳌、傅维钰、张其雄、杨溥泉、张际春等分任教导团学兵连第一连至第九连的党代表<sup>①</sup>。此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共产党员在军校历届国民党特别党部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1926年12月，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聘请熊雄、萧楚女、张秋人、孙炳文、廖划平等为政治顾问；安体诚、张秋人等为宣传委员<sup>②</sup>。这些情况表明，共产党员在军校各级领导和国民党党部里，都有着自己巩固的阵地。

为了团结革命军人，扩大革命势力，在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1925年2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这是以黄埔军校为中心，包容各军事学校和部队进步青年军人大联合的组织，会员迅速发展到了2000人，蒋先云、王一飞、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许继慎、左权和金佛庄、鲁易、胡公冕等，都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该会通过出版发行《中国军人》、《青年军人》、《兵友必读》等刊物，以及宣传《向导》、《中国青年》、《民主周刊》等革命刊物，向军校内外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后一年半内会员达到2万多人。青军会在团结各军，宣传民众，打击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缪斌、贺衷寒等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等方面，都发挥了先锋作用。

蒋介石为平息军校内青军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党务纠纷，以学校名义于1926年4月7日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青军会在蒋介石的强令下被迫宣布解散。尽管蒋介石随后又发起成立了旨在限制共产党活动的黄埔同学会，但最初仍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如游步瀛为总务科员，刘仇西为组织科员，余洒度为宣传科长，杨其纲、蒋先云为监察委员，实际上“黄埔同学会是

---

<sup>①</sup> 王逸常《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主要成员》，《黄埔军校史料》第117页。

<sup>②</sup> 《黄埔日刊》1926年12月27日。



左派主持，右派势力已打下去。”<sup>①</sup> 当时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sup>②</sup> 中共中央并认为，黄埔军校这块阵地，“不可放弃，当常放在左派手中。”<sup>③</sup> 不久，随后革命形势的不断恶化，黄埔同学会遂成为蒋介石排斥共产党的御用工具，“在实质上却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建立了初步的基础”。<sup>④</sup>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全国实行“清党”。李济深也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共事变，随后派兵在军校“逮捕共产分子，共四百余人。”<sup>⑤</sup> 优秀共产党员熊雄、萧楚女、杨其纲等惨遭杀害。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活动至此才基本停止下来。

以上不难看出，军校的中共党组织，在指导党、团员的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团结左派，孤立打击右派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 五、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黄埔军校当时之所以成为全国有志青年向往的革命中心地，是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在军校各项日常工作中，还是在统一广东的战场上，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始终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少人为国民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尤其是共产党员卓有成效的政治教育工作，保证了军校和

---

① 《瞿秋白由粤来报告》，《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414页。

② 《C同志关于K·M·T·问题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281页。

③ 《颜昌颐报告湘鄂情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311页。

④ 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⑤ 《黄埔军校史料》第447页。



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

黄埔军校在广州政治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是1924年10月平定商团叛乱。以军校学生为主力的工团军在广州郊区农军协助下,率先抗击商团军,共同粉碎了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广东商团叛乱。军校的共产党员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sup>①</sup>。随后,在军校新成立的两个教导团中,连级干部竟有半数是共产党员,营、连级党代表也多由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

在第一次东征中,第一个硬仗是攻打淡水。陈炯明部熊略旅,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工事死守该城,阻碍东征军前进。教导团以10名官长和100名士兵组成敢死队攻城,其中有8名官长是共产党员,如刘仇西、游步瀛、李奇中、张际春等。第一个爬上城墙的是一名手持旗帜的共产党员,在他负伤后,紧接着党代表抓过旗帜,士兵紧随其后,爬上了城墙。淡水之役共牺牲3名排长,均为共产党员。在第二个硬仗棉湖之战中,教导团的连长曹石泉和连党代表曹渊、许继慎,这3位共产党员,打得很出色。当林虎的一个师打到教导二团团部,形势十分危急时,“曹石泉、曹渊带领的一个连突然向敌人猛攻,一下就打垮了林虎的部队,取得了胜利。”<sup>②</sup>此次棉湖之役,东征军以两个教导团的兵力打垮了陈炯明部1万敌军的进攻,担任连长的共产党员郭俊、刘仇西负伤。共产党员勇猛杀敌,冲锋陷阵的果敢行动,被东江人民誉为“为民众而奋斗牺牲之先锋队”<sup>③</sup>。

在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时,陈炯明部师长杨坤如固守城池,气焰十分嚣张。东征军攻城两天,伤亡甚众。在久攻不下的情

---

① [苏]Б·Т·萨坡什尼柯夫《1924—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② 胡允泰《金陵丛谈》第27—2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中国军人》1925年4月2日。

况下,周恩来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第七、八、九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钰和第一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这4位共产党员分别率领由各自所在团之连党代表,组织敢死队攻城。攻城时,蒋先云带头率队爬登城上,虽面颊受伤,仍奋勇前进。经过激战,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革命军,在友军的配合下,终于攻破惠州。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认为,“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sup>①</sup>此外,在第二次东征中,担任营长的共产党员唐同德牺牲;负责宣传队的李劳工在陆丰宣传组织农会时,惨遭反动派杀害。

周恩来在两次东征中都是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与广大官兵同甘共苦,言传身教,成为黄埔军校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周恩来在军校创建周年时,高度赞扬了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军校师生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军校精神“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sup>②</sup>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斗争实践和光辉业绩,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sup>③</sup>,而且锻炼和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和政治指挥人才。他们在后来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屡建殊勋,成长为创建工农红军和进行革命战争的栋梁。

---

①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2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黄埔军校史料》第224页。

③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7页。

# 历史见证者的自述和辩正

——老同志谈陕北建党时间述评

生德 敬东 李林 世平

众所周知,我党长期是在秘密状态下创建和活动的,因条件所限不可能留下完备的档案资料。但有幸的是一大批党的历史的亲历者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自述史料;更可庆幸的是一些当年的老同志依然健在,他们以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对今天的党史工作的征集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我们从事党史工作除了充分占有历史档案等文字和实物史料外,大力挖掘当年历史参与者的各种自述资料,并就有关历史疑难直接请教健在的老同志加以辨析订正,以补充或订正历史档案之不足,这是坚持求实存真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将党史工作置于可靠的史实基石上的重要环节。

我们是榆林地区和绥德县参与中共组织史资料征编的工作人员,自1986年以来先后多次到西安、北京、宁夏、云南、内蒙等省市查阅历史档案,走访老同志,获得大量宝贵的第一手史料。现就我们从征集到的许多老同志的史料中,来仔细地看看这些来自历史的见证者的自述和辩正是怎样说的。我们愿意与一切热心于确切搞清陕北建党时间的同志共同“相与析”。

## 一、与李子洲同在绥师的教员的自述

李子洲于1924年夏到1926年12月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校

长,并着手在四师创建陕北党的组织。在这个时期与李子洲同在四师一起经历了党的组织创建的教员们,他们留下的文字记载无疑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查到韩叔勋、李瑞阳、杨明轩等人的有关材料,且看他们是怎样说的:

韩叔勋(物理教员):1951年8月22日写的《思想总结》中说:“1924年春,李子洲由陕伪教育厅发表为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这年秋我就离开咸林中学,转道赴绥德,这时李子洲已作党的地下活动。后来我因小组决定也成了预备党员了。”

李瑞阳(美术教员):1959年回忆说:“1924年冬,冯玉祥、胡笠僧推倒曹琨、吴佩孚,当时刘天章同志在北京组织学生军,在旧历年底,我和杨晓初同志连夜由陕去京,到京后,我因自己不懂军事,没有到军队里去。1925年春,李子洲约我去绥德师范教书,在当年四五月间,由王懋廷介绍我入党,任党支部组织委员”。

杨明轩(教务主任):在其1951年7月7日给《群众日报》写的《纪念李子洲同志》的文章中说,李子洲“1924年秋到绥德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校校长,一方面以四师为阵地,以师生为核心,批判封建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建立中国共产党绥德特别支部。”在1959年12月的自传中说:“在绥德期间,我深受李子洲、王懋廷同志(他们都是陕北党的创始者)的影响和启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5年暑假后,按照党的指示,我尽量把四师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县。”

以上几人既是四师教员,又先后在四师成为党员,他们是无可争议的陕北党组织创建的亲历者,建国后又都为党工作,杨明轩还是国家领导人。对当初在绥师建立党组织的过程写的分明真切,相互之间述说基本一致。

除了以上几人外,我们还从历史档案中查明1925年在绥师学生中党员就有:白明善、杜嗣尧、乔国桢、邓重庆、马瑞生、马明



方、霍维德、杜振庭、白作宾、杨应举、张肇繁、王士英、李明轩、冯又新、王进峰、崔凤荣等 10 多人，未找到本人自述而有多人证明在这一时期入党的还有马瑞昌、高光祖、王兆卿、赵通儒等。1925 年不仅绥德四师有这么多名党员，榆中也有张肇勤、李登霄、郭洪涛、武开章、刘景象、李含芳、王季明、师俊伟、庄培等，石谦部队中还有阎红彦、李象九、呼延震西、史唯然、雷恩钧。必须指明，这些人在档案材料中对他们加入党团组织的过程并未混淆。他们是在何时何地入团，又怎样入党，介绍人是谁，同期党员又有谁等，一般都有详尽的交代，虽有少数人在个别问题上说法略有出入，但基本史实的述说则是相同的。这些写在个人档案上，又历经组织审查承认的史实。应当成为当时当地党组织存在的重要证明。

## 二、亲历早期革命活动的老同志的见证

在陕北建党时间问题上，除了前述几十人的自传、自述外，另还有 10 多位老同志的回忆和意见。他们有的就是 1925 年入党的，有的虽不是 1925 年入党，但参加了 1925 年前后陕北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已去世但留有文字，有的现在仍然健在。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陕北建党是 1924 年，1925 年成立了党的支部。在出现 1926 年建党之说以后，健在的老同志又多次用谈话、写信等方式表述自己的看法，有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 1926 年 1 月建党的说法不能成立，这些老同志有：马文瑞、刘澜涛、郭洪涛、阎揆要、崔田民、张达志、常黎夫、吴志渊、贺晋年、王兆相、李铁轮、杨和亭、王子宜、乔鼎铭等。

陕北党组织最初是由李子洲、王懋廷二人在四师发展党员建立的，然后才向陕北其他地方发展。榆林中学和石谦部李象九连的党支部，开始都是在四师党组织领导下建立的，因此，榆中和李

象九连 1925 年有党组织和党员,是绥德四师存在党组织的直接证明。

1925 年 10 月在榆中入党的郭洪涛同志 1992 年 4 月 1 日谈陕北建党时间问题时说:“1925 年榆中闹风潮以后,学校留下了三个党员:刘景象、李含久、庄培,他们又都是团员。刘景象、李含芳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绥德四师的党组织建立的时间比榆中早,榆林的党组织是由绥德党组织发展来的”。

马文瑞同志 1992 年 4 月 3 日谈陕北建党时间问题时说:“我是 1926 年冬在周家硷高小念书时由师俊伟介绍入团的。师俊伟是绥德西川师家坪人,1925 年在榆林中学闹学潮时就是共产党员,被学校开除了。……白明善,我 1928 年冬任绥德团县委书记,他任党县委书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就是 1925 年在绥德四师入党的。”

刘澜涛同志 1992 年 4 月 4 日《关于陕北建党问题》中说:“我 1925 年五卅运动时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是王懋廷,他是共产党员。”

不久前逝世的崔田民同志 1989 年 9 月 10 日来榆林听取关于陕北建党时间问题汇报后说:“我村铁茄坪崔凤荣就是 1925 年绥德四师被党组织发展入党的,在五卅惨案前后常回村里宣传革命。”

不久前逝世的阎揆要同志 1992 年 4 月 5 日《我对陕北建党的回忆》中说他到石谦部队工作后,“1926 年,经连长谢子长同志和杨璞介绍我加入共产党,1926 年前,这个部队即有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是绥德党组织。按我初入党时所知道的情况,绥德党组织建立是早的。当时我听说,1924 年绥德就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小组。”

杨和亭同志 1991 年《陕北的回忆》中说:“陕北早期建党,我

1940年前后调查了解过。1939年到1943年我在绥德特委(后为地委)任组织部长,为给李子洲写传、立碑作了很多调查,和20多位知情人士了解。关于绥德师范建党情况,是这样的:1924年夏,李子洲到绥德师范学校任校长,并经李大钊聘请了许多进步教师,当时聘请的有党员教师王懋廷,进步教师李瑞阳、杨明轩、田伯英等。李、田不久即被介绍入党。”

### 三、老同志对冯景翼信件的辩正和质询

对于冯景翼的信,老同志们听说把团的这个信件被称作陕北最早的“建党报告”,据以否定1924年和1925年陕北党组织的存在,普遍感到难以理解,纷纷提出不同的看法。崔田民同志1990年3月13日写的一封信说:“我对冯四天内写的两封署名信,连起来认真读了一遍,从两封信的内容和字里行间,找不到说这是建党报告,丝毫没有说明是绥德四师第一次建党的意思,有人不根据历史事实,只凭主观推测随意断定陕北共产党是1926年1月建立,那是毫无根据的违反历史的说法。”郭洪涛同志1991年6月18日写的一封信说:“确定陕北建党的时间,应当以党的历史文件、报告以及老同志(包括已去世的老同志)的档案、回忆、自传等为依据,建党时间应是1924年冬,在1925年春有所发展,1926年有了较大发展。至于一个团地委书记当时写的报告,只能做为旁证,不能做为主要依据。”马文瑞同志1992年4月3日谈话中谈到他入团介绍人师俊伟1925年在榆中就是共产党员时说:“绥德四师建党比榆中早,肯定不是1926年,只凭冯景翼的信是不可靠的。”

对冯景翼的信,老同志们还提出质询:

郭洪涛同志问:“1925年,陕北有那么多人入党,一个记错



了,那么多人记错了?”(1992年4月1日谈话)

崔田民同志问:“如白明善、乔国桢、马明方、霍维德、阎红彦等,陕北党如果是1926年1月建立的,这些同志已成假党员了,还能算先烈吗?请问怎么办?”(1990年3月31日的信)

贺晋年同志问:“从许多老同志档案看,他们均是1924年至1925年在绥德四师加入党组织,如果按照陕北1926年建党的说法,这部分老同志的党籍何从算起?陕北没有建党又如何发展了党员?写党史要抱着尊重史实、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对党组织负责,要对革命先烈负责,要对后人负责,此事关系到一批陕北老一辈革命家入党时间问题,事关重大!”(1992年4月4日给陕西省委的一封信)

杨和亭同志问:“如果从1926年算起,有几十名党员同志的党龄问题就会差近两年,这些同志中有个别人尚健在,大部分是烈士或已逝世,如果不落实这一问题,这些同志和其亲友会有很大意见”。(1989年9月22日信)

以冯景翼的一两份团的活动的信件,断然否认1924年冬建党和1925年党的组织的存在,必然面临着如何处置在这一时期已经入党的同志的党籍问题。一笔抹煞或重新“订正”,显然都是荒谬和绝不可取的,这就不仅是史实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如果退而承认当时有党团活动,那么能无党、团组织存在吗?当时的党、团活动仅是一群无组织的“散兵游勇”吗?共产党历史上有这样的组织和党员吗?根据1923年6月中共三大章程关于“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小组”的规定,不可能设想已经拥有20多名党员的学校还无任何党的组织存在!建党之始,一个地方先有一两名党员,后有党的基层组织的情况是有的,但是一有了几个党员就按党章规定建立相应的基层组织则为通例,绝无一个单位有20多名党员还无任何党的基层组织的先例。



#### 四、老同志建议开座谈会

由于当初陕北建党时形成的党的历史文献未能留存下来，现有的历史资料在看法上又有如此重大分歧，并由于这种分歧导致包括烈士在内的几十名老同志的党籍问题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为此，听取作为陕北早期党组织活动的身历者和知情者老同志们的意见，并共同研究处理好这一重大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良好方法。

1990年3月31日，崔田民同志建议：“吸收亲自参加陕北第一次大革命的同志座谈研究，把陕北党史写准确。”1991年6月8日，杨和亭同志写信建议：“由省委或省组织史领导小组主持，召开一次座谈会，吸收有关组织和老同志参加，各抒己见，广泛听取意见，达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才能作出既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能达到党内团结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开会地址，北京、西安、延安均可。”1992年4月3日，马文瑞同志谈陕北建党时间问题时又说：“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不像写小说，不能虚构，不要轻易做结论。我建议陕西省召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一些老同志参加，人不一定太多，在北京或在西安都可以，大家共同研究议定。”1992年1月20日，中央负责编纂中共组织史资料工作的领导同志为陕北建党时间上的分歧意见来西安开座谈会时，也建议由陕西省召开老同志座谈会讨论。因为这是历史学术问题，要靠历史资料和知情的老同志才能核准，不能靠下级服从上级来解决。

本文只就老同志们的自述作了如上评述，有关历史档案上的论述就不多提及了。有一点要指出的是老同志们所说的绥德四师于1925年春成立起党的支部等，与党的历史文献提供的佐证也是互相符合的。如1935年1月24日《陕北特委代表的报告》即说

陕北 1925 年春开始有党团组织。我们认为老同志们的上述回忆和辩证,就其出处、记事、述证、辩异等方面都是具有原始性和可靠性的,实属我们认识和研究陕北建党问题的基础性史料,理应成为我们判断陕北建党时间最基本最重要的根据。

## 《烽火忆抗战》征文启事

### 征文宗旨：

199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军手中收复台湾5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在当前形势下，用全国人民团结奋起、挽救危亡、英勇抗战的生动史实，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方针，搞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追念先烈前贤丰功伟绩和中华民族奋起御侮，终克强敌的战斗岁月，以弘扬我民族精神、褒扬我中华精英，特发起《烽火忆抗战》征文活动，诚向当年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将士和海内外对中华民族抗战有所贡献、有所经历的炎黄儿女、侨界人士，以及国际援华助战志愿人员征集回忆录、专文和图(照)片资料。

### 征文注意事项：

1. 应征文稿应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人和事(包括对抗战人物、史迹的采访实记等)，写成真实、具体生动的记述文字。文章

一般以 1000 至 3000 字为宜,最长不超过 5000 字。图(照)片资料请用原件翻印。

2. 应征文稿截止日期为 1995 年 7 月 5 日(以邮寄日期为准)。

3. 应征稿件经征文组委会评选,择优在报刊上发表。凡入选的优秀文稿及图片资料,将由主办单位以纪念专辑形式结集为《烽火忆抗战》大型图书,公开出版,向海内外发行。凡入选的优秀作品作者,均由征文活动组委会发给纪念品和证书,并通过新闻媒介公布评选结果。

4. 应征稿件请寄:中国北京 1924 信箱《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邮编 100091。

#### **征文活动顾问:**

张震、胡绳、马文瑞、肖克、杨成武、叶飞、吕正操、秦基伟、钱伟长、万国权、雷洁琼、杨静仁、程思远、庄炎林。

#### **组织委员会:**

**主任:**李传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副主任:**刘延东(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李 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秘书长)

魏久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刘延东、刘昌亮、李传华、李鉴、李铠、朱悦鹏、汪新、金效琦、欧官成、黄慰慈、寇清平、缪群、魏久明。

**办公室主任:**李鉴(兼);

**副主任:**汪新、金效琦、王海珠

**电 话:**(01)309. 5735

**电传:**(01)309. 7971

**编辑组:**汪新、刘昌亮、陈政域、刘绍荫。

**电 话:**(01)258. 1561 或 258. 1166—579;



**电 传:**(01)258.1532

**征文主办单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编辑部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统一论坛》编辑部

**协办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人民政府

**鸣谢单位:**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上李朗经济发展公司

新华通讯社《中国名牌》杂志社陕西记者站

**《烽火忆抗战》征文活动组织委员会**

1994年12月20日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二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